



# 斯大林 選集

4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斯大林選集(4)

---

1949. 9. 初版 長. 1—5 000

基本定價： 685 元

# 斯大林選集

4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 目 錄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1—76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1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10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17
四 關於與右傾鬭爭問題	73
大轉變的一年	77—93
論蘇聯的土地政策	94—118
一 『平衡』論	96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	98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101
四 城市與鄉村	106
五 論集體農場底性質	109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的政策上的轉變	114
七 結論	11
論消滅富農階級底政策	119—123
勝利衝昏頭腦	124—131
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	113—165
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 報告與結論（報告）	157—295

---

一 日益增長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與蘇聯的國際地位	158
二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展和蘇聯底內部情形	181
三 黨的問題	250
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結論（結論）	282—295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296—307
關於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308—323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詞底一部份

##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是與我們國內及資本主義各國最近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底問題有聯繫。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有偶然的性質。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之所以發生了意見分歧，是由於最近所發生的那些階級變動，那種階級鬭爭尖銳化，這種變動、這種尖銳化造成着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布哈林這一派人的主要錯誤，就在於這派人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本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就不瞭解黨底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就是新反對派特質。

新反對派底領導人，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說話的時候，完全避開了關於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關於階級鬭爭底尖銳化，絲毫也沒有暗示說到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鬭爭底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的事情，也講了哲學，也講了理論，但是，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那些在現時決定着我們黨底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階級變動。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爲他們有健忘病罷。當然不是的！政治家是不會忘記主要的東西的，這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和不瞭解現在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爲他們忽略過去了主要的東西，忽略過去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過去的階級變動。本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一遇到我們黨底新任務就表示張惶失措和空拳無力的樣子。

試回想我們黨內最近發生的那些事變。試回想我們的黨最近因在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了的那些口號。我說的是這樣的口號，如自我批評，加緊與官僚主義鬭爭及清洗蘇維埃機關，組織新的經濟幹部人材及紅色專門家，加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運動，進攻富農，減低成本費及根本改善職工會底實際工作，實行清黨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膽戰心驚和令人頭昏眼花的。然而這些口號顯然是現時黨底最必要的和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重新提出了關於新的

經濟幹部人材問題，由工人裏面造就紅色專門家來代替舊的專門家的問題。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暴露出來的事情是什麼呢？暴露出來了的事情，就是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澈底擊破，它在我們經濟建設上組織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工作，就是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局部地是黨的組織，把我們的階級敵人底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就是，因此需要盡力設法鞏固和改善我們的組織，發展和鞏固這些組織底階級的警惕性。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的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那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及黨的組織，就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底建設和征服資產階級的暗害行爲，而暗害行爲，不僅在煤礦區域內，而且在冶金工業方面，而且在軍事工業方面，而且在人民交通委員會內，在黃金及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方面，都發生過並且還在繼續發生，——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爲有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因爲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的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着重提出了關於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關於進攻富農的問題，關於用壓榨富農豐裕份子的方法來組織糧食採辦的問題。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暴露了什麼事情呢？這些困難所暴露了的，就是富農並不是在那裏睡覺，富農是正在發展着，他們是組織着暗害工作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



我們的黨的機關、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至少是一部份這樣的機關，或者看不見敵人，或者去遷就敵人，而不去與敵人鬭爭。

於是，就更加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審查和改善我們的黨的機關、合作社機關及一般的糧食採辦機關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關於有系統的減低成本費的口號，關於鞏固勞動紀律的口號，關於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口號等等。這些任務曾需要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底全部實際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的份子清洗出去。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關於與職工會及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鬭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認為不先把黨本身磨得銳利而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組織、職工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可以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底骯髒東西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了。官僚主義份子不僅在經濟的和合作社的組織裏，不僅在職工會的和蘇維埃的組織裏生活着，而且還在黨本身底組織裏生活着，這是無可懷疑的。如果黨是所有這一切組織底領導力量，那末，清黨就顯然是這樣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決不能徹底振興和改善工人階級底其他的一切組織。於是就提出了關於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看到它們不是偶然的。這些口號是一條分不開的鍊子上的幾個必要的環節，這條鍊子就是叫做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

這些口號首先是與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時期有聯繫的。而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又是什麼呢？它就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綫上向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着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一個最重大的進展。可是要實行這個改造，首先就必須改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底幹部人材——經濟的、蘇維埃的和職工會的幹部人材以及黨的、合作社的幹部人材，必須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骯髒東西清洗出去，必須提高千百萬工農羣衆底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與國民經濟裏面的資本主義份子對進攻着的社會主義實行反抗的這件事實有聯繫的。決不可以把所謂沙哈廷案件看作偶然的事情，『沙哈廷派』現在正盤踞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裏。其中有許多已被拿獲，可是還遠沒有盡被拿獲。資產階級知識界底暗害行爲，是對於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反抗之一種。況且暗害行爲是與國際資本有聯繫的，因此它更是危險。資產階級的暗害行爲無疑義地指明，資本主義的份子還遠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新發動。至於說到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那末富農反對蘇維埃底價格政策的發動已經繼續到兩年了，這更其不可以看作是偶

然的事情。很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却已經停止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了。可是，這個事實却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在從前，富農還比較軟弱，還沒有可能去認真佈置自己的經濟，還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因此，它曾經不得不把自己糧食出產底全部剩餘或者差不多全部剩餘都拿到市場上去，可是，在現在，在經過了好幾個豐年以後，它已經把自己的經濟佈置周到了，它已經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它就有了在市場上投機的可能，就有了把糧食——這個金幣底金幣——藏起來的可能，作為自己的後備資本，而寧肯把肉類、燕麥、大麥及其他次要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如果希望富農會自願讓我們從它那裏取得糧食，那就可笑了。富農現在對於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反抗，其根源就在這裏。

可是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對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是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勢力底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底目的就是要維持舊關係而反對新關係。不難懂得，這些情形不能不引起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可是為要打退階級敵人底反抗和替社會主義底前進肅清道路，就除掉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外，還需要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面的官僚主義清洗出去，改善他們的幹部人材和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及農村勞動羣衆來去反對城市和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

我們黨底現時的那些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底基礎上面產生出來的。

關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階級變動也應當這樣說。如果認為資本主義底穩定依然沒有改變，那就是可笑了。如果斷定說，這個穩定日益鞏固着，日益成為堅固的，那就更是可笑了。實際上，資本主義底穩定是一月比一月、一天比一天削弱起來和動搖起來。爭取市場和爭取原料的鬭爭底尖銳化，武裝底增長，英、美對抗底增長，蘇聯社會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左化，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底已經到來，各殖民地——印度在內——革命運動底發展，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底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是無疑義地證明，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新的革命高漲底成份是正在增長着。

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加緊鬭爭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是反對該黨底『左』翼，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共產黨內的右傾份子，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與右傾調和的調和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底避難所。於是就提出了關於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於是就規定了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可是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懂得，不實行這些口號就決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鬭，決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決不能實行挑選共產主義運

動底真正領袖——能引導工人階級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鬭爭的領袖。

同志們，這就是在我國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所發生的這樣一些階級的變動，在這些變動底基礎上便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方面以及在共產國際方面的那些現時的口號。

我們黨是看見這些階級變動。它懂得新任務底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所以，它總是帶着全副武裝去應付事變。所以它並不害怕擺在它面前的困難，因爲它總是準備着克服困難的。

新反對派底倒霉處，布哈林這一派人底倒霉處，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爲它不懂得這些新任務，所以它就抱着完全張惶失措的心理，總是準備着逃避困難，遇見困難而退却，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在大河裏面，比方葉尼塞河這樣的大河裏面遇見大風浪時的漁夫嗎？我看見過不止一次了。有這樣一種漁夫，這種漁夫遇見已經到來的大風浪的時候便動員自己的全部力量，鼓勵自己的人心，勇敢地朝着風浪划船：『弟兄們，不要軟勁，努力抓着舵，破浪前進罷，我們是一定要勝利的！』可是也有另一種漁夫，他們一聽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開始叫苦而使自己的人們萎靡不振：『真倒霉呀，大風浪來了，兄弟們，請在船板上臥下，閉着眼睛，也許就可以馬馬虎虎挨到岸邊罷。』（全場大笑）布哈林這一派人底方針和行爲，是與那第二批漁

夫，遇困難而驚惶退却的漁夫完全相同，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我們說，在歐洲，新的革命高漲底條件正在成熟着，這種情況給我們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的鬭爭，將右傾份子從黨內提出去，加強與掩護右傾的調和派的鬭爭，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鬭爭以及其他等等。而布哈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布哈林『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這些任務要求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和鞏固企業裏的勞動紀律；而為要執行這些任務，便非有根本改變職工會內的全部實際工作不可。而湯姆斯基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湯姆斯基『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國民經濟底改造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加強與蘇維埃經濟機關底官僚主義作鬭爭，清除這種機關裏的腐敗的和異己的份子、暗害份子以及其他等等。而李可夫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李可夫『當衆批評一頓』。

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可笑嗎？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

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臍之外，便看不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難道不明顯嗎？

布哈林這一派人底不幸，就是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為它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做事變底尾巴，遇到困難就束手無策。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裏。

##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和不懂得共產國際底因新革命高漲日益增長的條件而引起的那些新任務，這些任務，就是：從共產黨內趕出右派，征服調和派和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這個情形，已完全為我們在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所證實了。

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關於國際狀況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樣的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代表團內審查的。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弄得這樣，就是由布哈林署名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代表團，同時就分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各外國代表團。可是，在這個提綱上會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代表團曾不得不在提綱中加上大約二十個修正。

這種情形就使布哈林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是誰的過錯呢？試問布哈林為什麼要在還沒有交給聯共代表

團審查以前就把提綱送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是可以不加上幾條修正案呢？結果就弄出這樣的情形，就是從聯共代表團內實際上作出了關於國際狀況的新提綱，而各外國代表團就拿這個提綱來與布哈林署名的舊提綱對立。顯然的，如果布哈林沒有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送給外國代表團，就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

我現在要指出聯共代表團所加到布哈林底提綱上的四個基本的修正。我想指出這些基本的修正，爲的是要更明顯地表示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問題，這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底性質的問題。照布哈林底提綱看起來，在現今的時候，並沒有發生着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而且相反，資本主義是正在改造着和在基本上多少穩固地支持着。顯然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作這樣的估計，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能同意的。它當時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爲保存這樣的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們有材料來說我們是抱着所謂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觀點，即抱着希法亭底觀點，抱着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抱的觀點。因此聯共代表團便作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是不穩固的，而且不能是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底尖銳化，這個穩定現在正被和將來還會被事變過程所搖動。同志們，這個問題是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有決定的意義的。資本主義的穩



定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整個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底低落時期，處在單單是收集力量的時期，或者是處在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處在使工人階級準備去作當前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底策略方針就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代表團底這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了——底好處正是在於，它所規定的方針是以這第二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是以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這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社會民主黨作鬭爭的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了，與社會民主黨作鬭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這還不够。要使與社會民主黨的鬭爭進行得有成效，就必需要把問題着重在與社會民主黨底所謂『左』翼作鬭爭的上面，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詞句而這樣來巧妙地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顯然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戰勝一般的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却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在布哈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的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了有與右傾鬭爭底必要，可是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到要與那個對右傾調和的調和態

度作鬭爭。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問題在於，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份子就通常裝扮爲調和份子而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爲預防右傾份子底這個手腕起見，就必須提出與調和態度作堅決鬭爭的問題。因此聯共代表團曾認爲必須在布哈林底提綱上作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沒有提到各共產黨內有保持鐵的紀律之必要。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因爲什麼呢？因爲在加強與右傾的鬭爭的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的時期，右傾份子通常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的組織，造成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底派別組織的襲擊，就必須要提出關於黨內鐵的紀律的問題和關於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是這樣，便根本莫要想去與右傾作認真的鬭爭。因此聯共代表團就在布哈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當時是不是可以不把這些修正加在布哈林底提綱上去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在古代的時候，人們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是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可是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到布哈林底提綱上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第

一階段。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第二階段是與所謂維托爾夫及台爾曼的事件有聯繫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組織底以前的書記，被控告爲濫用黨的經費的。他曾因此被開除黨籍。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裏的調和派，曾利用維托爾夫是與台爾曼同志有接近的關係（雖然台爾曼同志是與維托爾夫底犯罪行爲絲毫沒有關係的），就把維托爾夫底案件變成了台爾曼底案件而開始來推翻德國共產黨底領導。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底消息中知道，調和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赫特當時竟能暫時拉攏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來反對台爾曼同志。怎麼樣呢？他們把台爾曼從領導機體中撤銷了，開始控告他爲舞弊營私，並且事先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委，也沒有得共產國際執委底批准，就公佈了『相當的』決議案。這樣一來，他們不是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與調和派作鬭爭的指示，不是與右傾及調和派作鬭爭，而是最無理地違背這個指示，與德國共產黨底革命領導作鬭爭，與台爾曼同志作鬭爭，這種鬭爭底目的就是要在德國共產黨員隊伍裏面掩護右傾和批准調和態度。

而布哈林並不去拉轉船舵，糾正現狀，不去恢復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那個已被違背的指示底權力，不去制止調和派底胡行，却反而在自己的一封著名的信內提議批准調和派底這次政變，將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派，而對於台爾曼同志，却又在報紙上加以誹謗，再次申明他犯了過錯。

而且這還叫做是共產國際底『領導者』！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領導者』嗎？

中央委員會討論了布哈林底提議並且否決了這個提議，這當然是布哈林所不高興的。可是這裏是誰底過錯呢？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爲着要我們去違背這個決議，而是爲着要由我們去執行這個決議。如果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曾決定向右傾及調和態度宣佈鬭爭，把德國共產黨底領導工作保留給台爾曼同志所領導的基本幹部，而調和派愛維爾特及黑爾赫特却忽然想來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底責任就是要制止調和派底越軌行動，而不是讓他們把持德國共產黨內的領導。錯在布哈林，因爲他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忘記』了。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第三階段，是與同德國共產黨內右派鬭爭的問題有聯繫的，與粉碎布蘭德列爾及達里格麥爾底派別組織以及將該派別組織底首領從德國共產黨裏開除出去的問題有聯繫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在這個根本的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就在於他們總是迴避參加這個問題底解決。實質上，當時所解決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底生命問題。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是知道這一點的。可是他們却還是有系統地迴避參加相當機關底會議，這樣來阻礙這件事情底進行。爲的什麼呢？大概是爲的要在共產國際面前與德國共產黨內右派面前都不失爲『潔白君子』。爲的是要在後來可以說：『將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開除於共產黨外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而是中

央委員會底大多數。』而且這還叫做與右傾危險的鬭爭哩！

末了，我們意見分歧底第四階段。這是與布哈林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提出的要求有聯繫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聶依曼，要求制止台爾曼同志底所謂越軌行動，說台爾曼同志在自己的一個演說詞內批評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夠同意布哈林底主張，因為手內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底要求。布哈林答應了找出文件來證實聶依曼及台爾曼底錯處。然而，任何文件他都沒有找出來。他並沒有找出文件來，而祇是把恩伯德洛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祕書處內的著名演說詞分發給聯共代表團底同志，而這個演說詞後來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評判為機會主義的演說詞。布哈林把恩伯德洛底演說詞分發給聯共代表團底同志，並把它介紹為控告台爾曼同志的材料，想這樣來證明他關於召回聶依曼及所謂制止台爾曼同志底越軌行動的這個要求是正當的。而實際上呢，他這樣證明了，他是與恩伯德洛同情的，而恩伯德洛底立場，由共產國際執委看來，却是機會主義的立場。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要點。

布哈林認為，我們既然是進行鬭爭反對共產國際各支部裏的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既然是清除德國共產黨裏和捷克斯拉夫共產黨裏的社會民主黨分子和傳統，從共產黨內開除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這般人，這樣我們就

是使共產國際『解體』，使共產國際『滅亡』。反之，我們却認為，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把問題着重在與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鬭爭上，這樣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清除共產國際裏面的機會主義者，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塞維克化，幫助各共產黨去準備工人階級進行臨到的革命搏戰。

可見得，這並不簡簡單單是聯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裏面有什麼不同的色彩，而是關於共產國際政策底根本問題有很嚴重的意見分歧。

###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鬭爭。我已說過，布哈林這一派人沾染了瞎眼病而看不見這些變動，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我已說過，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便抱着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和決心在困難面前束手投降。不能說，新反對派底這些錯誤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恰恰相反，它們是與已經過去的那個發展時期有聯繫的，那個時期是叫做國民經濟底恢復時期，那時的建設是依和平的道路進行的，所謂依自流的辦法進行的，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新的發展時期，與舊時期，就是說與恢復時期不同的時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是新的建設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底基礎

上改造的時期。這個新的時期引起新的階級變動，引起鬥爭底尖銳化。它需要新的鬥爭方法，需要重新分配我們的力量，需要改善和鞏固我們的一切組織。布哈林這一派人底倒霉處也就是在於，他們現在還過着舊生活，它看不見這個新時期底特點，不懂得新的鬥爭方法底必要。因此，他們就患着瞎眼病，抱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

### 一 關於階級鬥爭問題

布哈林這一派人底這種瞎眼病，這種張惶失措心理，其理論基礎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以為，這種瞎眼病和張惶失措心理底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對於我們國內的階級鬥爭問題所採取的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所指的是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環境與階級鬥爭關鍵底不瞭解。

在這裏，已經有人幾次從布哈林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小冊子裏，摘引了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一段著名議論。可是這裏所摘引過的都有一些遺漏。請讓我把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同志們，這是必要的，祇有這樣，才可以看出布哈林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到了何等深刻的程度。聽吧：

『我們的農民的合作社組織底基本網子，將不是由富農式的而是由「勞動」式的合作社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會生入我們的一般國家的機關底系統內，這樣就會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這整條鏈子裏的單個環節。

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的巢窩，也將同樣經過銀行等等而生入這個系統內；可是它們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如同租佃企業一樣。』（布哈林：『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工農聯盟』第四九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有些同志從布哈林底小冊子裏摘引這一段議論的時候，却不知爲什麼把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遺落了。羅季特大概是想替布哈林幫忙，所以利用了這一點而從座位上叫喊，說人家曲解布哈林底意思。可是這全段引證底要點正在於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因爲如果把租佃企業家與富農看作同等的東西，而富農又生入社會主義，那末從這裏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祇有一個，就是說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就是說，不僅富農，而且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全場大笑）

羅季特啊，這就是從這句話裏得出來的結論。

羅季特：布哈林所說的是『異類物體』。

斯大林：羅季特啊，布哈林所說的，並不是什麼『異類物體』，而是『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所以，富農和租佃企業家，『在某種程度內』是社會主義系統內的異類物體。可是，布哈林底錯誤也正是在於，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可是，總還是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底理論竟弄到何等荒謬的地步。城市和鄉村的資本家、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會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是說出何等荒謬的話來



了。同志們，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讓布哈林把它拿給自己去用吧。

直到現今，我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都是認為，城市及鄉村中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是有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正是建築在這一點上面的。而現在，照布哈林底關於資本家和平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說來，所有這些原理都要推翻，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階級利益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在消滅，剝削者正在生入社會主義。

羅季特：這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需要的。

斯大林：可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鬭爭底最尖銳的形式。

羅季特：問題底本質正是在這裏。

斯大林：而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是生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羅季特，你怎樣不懂得這一點？如果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家是生入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內，那末，到底是爲反對誰而需要進行鬭爭，爲反對誰而需要進行最尖銳的階級鬭爭呢？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是爲着要與資本主義份子進行不可調和的鬭爭，爲着要鎮壓資產階級和根本剷除資本主義。可是，如果城市與鄉村中的資本家，如果富農及租佃企業家是生入社會主義，那末是否一般地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需要，那末是爲鎮壓什麼階級呢？

羅季特：問題底本質正是在於，照布哈林說來，所謂

生入是要有階級鬭爭的。

斯大林：我覺得，羅季特已經立誓要替布哈林効勞。可是他的効勞正好像是狗熊効勞一樣，因為，羅季特本來是想去挽救布哈林的，而事實上却完全把他沉到水底下去了。難怪俗語說：『喜歡効勞的狗熊比敵人還危險些。』（全場呵呵大笑）

兩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與爭得了政權及建立了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有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或者是沒有這種利益矛盾，那末就祇有一個辦法——宣佈階級利益底協和。

或者是馬克思的階級鬭爭的理論，或者是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或者是階級利益底不可調和的矛盾，或者是階級利益協和的理論。

兩者必居其一。

像布連唐諾或維伯這類的『社會主義者』宣傳社會主義生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入社會主義的主張，這還可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就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可是，一個人既然想做馬克思主義者而同時又宣傳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就不可解了。

布哈林曾在他的演說內企圖引列寧底一段著名的話來證實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他斷定說，列寧所說的也同布哈林說的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粗魯地和不可容許地誣蔑列寧。請看列寧這一段話底原文：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底合作上面的，現在，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潑曼」，就是說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列寧：『我們要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你們看，這裏沒有一個字是講到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這裏祇說到，我們『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潑曼，就是說資產階級參加工農底合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認為有耐潑曼生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的。祇有不怕羞恥的人才會這樣來解釋列寧底這一段話。這祇是說，我們現在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現在不沒收它的財產，而在相當條件之下還容許它存在，所謂某種條件就是，要他們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法律，就是為要從國民經濟生活中逐漸排除資本家起見而日益加緊限制他們。不作極劇烈的階級鬭爭，而可以實行排除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底根源嗎？是不可以的。既然有主張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那還可以消滅階級嗎？是不可以的。這樣的理論和實際祇能培植和永遠保全階級，因為它，這個理論，是與階級鬭爭底理論相矛盾的。而列寧底這段話却完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內的階級鬭爭的理論上面的。在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列寧關於專政是極尖銳的階級鬭爭的理論之間，會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

然的，這裏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布哈林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階級鬭爭就應當熄滅和取消，以便達到階級底消滅。反之，列寧却認為，祇有用經過堅持的階級鬭爭，階級才可以被消滅，這種鬭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還更劇烈些。列寧說：

『消滅階級是長久的、困難的、堅持的階級鬭爭底事情，這種鬭爭，在推翻了資本政權以後，在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後，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並不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及舊社會民主黨底卑鄙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祇是變更自己的形式，而在許多方面還成爲更殘酷些。』（列寧：『給匈牙利工人致敬禮』，『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這就是列寧關於消滅階級的話。

經過無產階級底極劇烈的階級鬭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底公式。

經過階級鬭爭底熄滅和資本家底生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底公式。

這兩個公式之間能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它們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如此，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鬭爭的理論。他的理論就是接近於學院派社會主義底理論。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所犯的一切錯誤底基礎，就在這

裏。

有人會說，關於布哈林底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值不得多講，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說道——不僅說道，而且喊道——布哈林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還藏在櫃子內的時候，還可以不去注意它：在個別同志們底著作裏面有些愚蠢話，這有什麼奇怪呢？直到最近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對待的。可是在最近的時候，環境已經有了一些改變。在最近幾年來囂張起來了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已經在鼓勵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具有帶着迫切的性質。現在已不能說它是藏在櫃子裏面了。現在，它，布哈林底這個奇怪理論，有野心要成爲我們黨內右傾底旗幟，機會主義底旗幟。因此我們已不能把這種理論忽略過去。因此我們一定要打碎這種理論，打碎這個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理論，以便利我們的黨員同志們去與右傾作鬭爭。

## 二 關於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問題

布哈林底第二個錯誤，是從他的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第二個錯誤是在於對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份子加強反抗蘇維埃政權底社會主義政策這個問題有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裏所說的是關於什麼事情呢？是不是說，資本主義的成份比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因此它們加強自己的反抗，損害社會主義的建設呢？不，不是關於這一點。況且說資本主義成份比社會主義成分增長得快些，這是不對的。如果這

是對的，那末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已經快到滅亡的地步了。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主義有成效地進攻着資本主義成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成份增長得快些，資本主義成份底比重因此降落下去，正因為資本主義成份底比重降落下去，他們就感覺得有死亡的危險和加緊着自己的反抗。而他們暫時還有加強反抗底可能，這不僅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給他們以幫助，而且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是降落了，他們的相對增長與社會主義底增長比較起來雖然是減低了，可是，他們的絕對的增長，還是有的，這也就給他們相當的可能來積累力量，以便反抗社會主義底增長。而在現今發展的階段上，在現今的力量對比條件之下，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和城市及鄉村資本主義成分反抗底加強，正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懂得這種簡單的和顯明的真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以庸人的態度去觀察問題，企圖用各種偶然的原因來解釋階級鬭爭底尖銳化，例如說是因為蘇維埃機關底『不中用』，因為地方的同志們底政策『不謹慎』，因為『缺乏』圓滑性，因為有『過火行動』以及其他等等。

例如，在布哈林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小冊子內有一段話，就表示他以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觀察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問題。請看這一段話罷：

『鄉村中的階級鬭爭，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在以前的那種形式中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

通常都是由富農份子所引起的。例如，富農們或者是那些靠剝削別人而發財的、鑽進了蘇維埃機關內的人們，開始槍殺農村通訊員——這就是階級鬭爭表現底最尖銳的形式（這是不對的，因為最尖銳的鬭爭形式是暴動——斯大林註）。然而，這樣的情形通常都是在這樣的地方發生的：在這些地方，地方的蘇維埃機關還是軟弱的。隨着這種機關底改善，隨着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機關底強固，隨着地方的農村的黨的和團的組織底改善和加強，這種現象將——這是完全顯然的——日益稀少，歸根到底將完全消失。』（布哈林：『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和工農聯盟』由第五三——五四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樣說起來，那末階級鬭爭底尖銳化是由於機關方面底原因，由於我們下層機關中用或不中用，軟弱或強固。這樣說起來，那末比方沙哈廷區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暗害行爲，這種資產階級份子對蘇維埃政權的反抗底形式和階級鬭爭尖銳化底形式，並不是因為階級力量底對比，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底發展，而是因為我們的機關不中用。這樣說起來，那末在沙哈廷區內的大規模的暗害行爲未出現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大規模的暗害行爲出現的時候，機關却不知怎樣成了毫不中用的東西了。這樣說起來，那末，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採辦還是自流式的進行和階級鬭爭還沒有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的地方的機關是好的或甚至是盡善盡美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底反

抗已採取特別尖銳的形式時候，我們的機關便忽然變壞了和不中用了。這不是解釋而是拿解釋來開玩笑。這不是科學，這是妖術。

這種階級鬭爭底尖銳化應當拿什麼原因來解釋呢？

應當用以下兩個原因來解釋：

第一，因為我們的前進，因為我們的進攻，因為工業和農業裏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底發展，這種發展同時使得城市和鄉村中相當的資本家隊伍受着相當的排擠。現在情形是這樣，就是我們是依照列寧底這樣一個公式過生活的，這個公式就是『誰勝誰敗』：或者是我們把他們——資本家——完全打倒，給他們一個——如列寧所說過的——最後的決定勝利的鬭爭，或者是他們把我們完全打倒。

第二，是因為資本主義份子不願自動下台：他們反抗着而且將來也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生存底末日快要到了。而他們暫時還能夠反抗，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降落了，但是在絕對關係上，他們還是增長着：城市 and 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如列寧所說過的，每日每時從自己的隊伍中提拔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他們，這些資本主義份子，採取一切辦法來保持自己的生存。

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下台的事情。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用盡一切氣力來保持自己的生存的事情。無論我們的下層蘇維埃機關將來是好還是壞，而我們的前進，我們的進攻，將要縮減資本主義的份



子和排擠他們，而他們，垂死的階級，將要不顧一切而進行反抗。

階級鬭爭尖銳化的社會基礎就在這裏。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底增長與他們的比重底增長看作是同等的東西。可是這種同等看法是沒有絲毫根據的。沒有根據，因為要是他們，資本家進行反抗，那末，這並不是說他們已比我們強些。實際上恰恰相反，垂死的階級起來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已比我們強些，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增長得比他們快些，因此，他們日益比我們弱些。正因為他們日益變弱些，所以他們感覺得自己的末日要到了，而不得不盡力設法反抗。

現今歷史時期內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和資本家反抗底加強，其關鍵就在這裏。

實際情況既是這樣，黨底政策應當是怎樣的呢？

它應當是要喚醒工人階級和鄉村中被剝削羣衆，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展他們的動員的決心來和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鬭爭，來和正在反抗中的階級敵人鬭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之所以是好的理論，局部地也就是因為它便利着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

布哈林的關於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布哈林的關於階級鬭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其害處是在什麼地方呢？

害處就在於，它催眠工人階級，搖動我們國內革命力量底動員決心，解散工人階級底隊伍，便利資本主義份子進攻蘇維埃政權。

### 三 關於農民問題

布哈林底第三個錯誤是與農民問題有關係的。大家知道，關於農民的問題，是我們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我們的條件下面，農民是由各種社會集團組成的，即是由貧農、中農及富農組成的。顯然的，我們對這些集團的態度是不能同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底支柱，中農是同盟者，而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這都是很明顯的和大家所知道的。然而，布哈林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却有些不同。在他估計農民的時候，分化底事實是失落了，各個社會集團存在底事實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而祇剩下一個叫做什麼農村的灰色斑點。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而是什麼農村中的一片貧窮現象。他在這裏演說時也就是這樣說：難道我們的富農可以叫做富農嗎？他說：須知這是窮人。他說：我們的中農難道像個中農嗎？須知道這是餓肚子的窮人。顯然的，這樣一種對農民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觀點。

列寧說過，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個原理對不對呢？是絕對對的。爲什麼把農民看作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爲農民在構成我們的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間是這樣一個階級，它的經濟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和

小商品生產上面的。因爲，農民，當他們還是經營着小商品生產的農民的時候，經常地和不斷地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出而且不能不產生出資本家。這種情況，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工農聯盟問題的態度問題上，對於我們有決定一切的意義。這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與農民的無論那個聯盟，而祇是這樣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與農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作鬭爭爲基礎。可是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提綱，不但不與工農聯盟的主張相矛盾，而且相反，是給這種聯盟以根據，使它成爲以反對我們的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分爲目標的工農聯盟。列寧提出了這個提綱，爲的是要指明工農聯盟，祇有在它是以反對那些由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鬭爭做基礎的時候，才能是堅固的聯盟。

布哈林底錯誤就在於，他不懂得和不領會這個簡單的東西，他忘記在鄉村裏有幾個社會集團，在他的眼光內沒有富農，沒有貧農，而祇剩得一片盡是中農羣衆。這是布哈林底毫無疑義的右傾，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左』傾相反，『左』傾在鄉村中祇看見有貧農和富農，而看不見有其他的社會集團，看不見有中農。

在與農民聯盟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這一派間的分別是在什麼地方呢？分別就在於：托洛茨基主義反對與中農羣衆成立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派則主張與農民作無論那個聯盟。用不着證明，這兩個立場都是不正確的，好像半斤和八兩一樣。

列寧主義絕對主張與農民底基本羣衆作堅固的聯盟，主張與中農聯盟，可是他並不主張與無論那個聯盟，而是主張與中農作這樣的聯盟，這個聯盟可以保證工人階級底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便利着消滅階級。

列寧說：

『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協定，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法。從工人階級底觀點上看來，祇有當這個協定是維持工人階級專政和成爲消滅階級的辦法之一的時候，這個協定才是可容許的、正確的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協定底公式，當然還是爲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敵人所主張的公式。』（『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七頁）

往下又說：

『現在，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並領導着這個政權。它領導着農民。領導着農民，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以消滅階級爲路綫，而不是以適應小生產者爲路綫。如果我們離開這個根本的和基本的路綫，那我們就不成其爲社會主義者而陷入這樣一些小資產者底營壘，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營壘，這些小資產者，這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現在就是無產階級底最凶惡的敵人。』（『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九九——四〇〇頁）

這就是列寧底關於與農民基本羣衆聯盟，與中農聯盟

問題的觀點。

布哈林這一派人關於中農問題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中農底兩面性質，介於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中間的兩面地位。列寧曾說：『中農是動搖的階級。』爲什麼呢？因爲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是他與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財產者，這使他與富農接近。因此就有中農底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對的，這種動搖在實際上也每日每時都表現出來。列寧說：

『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傾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傾向於資產階級，傾向於自由貿易，就是說後退到「慣常的」、陳舊的「歷來的」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四頁）

因此與中農的聯盟，祇有當它是以反對資本主義份子爲目標，反對一般資本主義，祇有當它是保證着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裏的領導作用，祇有當它是便利着消滅階級的時候，它才可以是堅固的。

奇怪得很，布哈林這一派人公然把這些簡單而明瞭的東西都忘記了。

#### 四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布哈林底第四個錯誤，是與新經濟政策問題有關係的。布哈林在這裏的錯誤就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底兩面性，他祇看見新經濟政策底一方面。當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曾把這政策底鋒芒用去

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反對那些排除任何貿易自由的統制秩序。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表示相當的貿易自由。布哈林是記住了這一方面的事情。這也是很好的。可是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祇有這一方面，這就錯了。布哈林忘記新經濟政策還有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的事情就是在於，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表示完全的貿易自由，在市場上玩弄價格的自由。新經濟政策，就是在保證國家底調節作用和它在市場上底作用的情形之下的、在相當界限內的、在相當範圍內的貿易自由。新經濟政策底第二方面就正是在這裏。而且，新經濟政策底這第二方面，如果不是比第一方面重要些，那至少也不比第一方面次要些。在我們這裏，沒有像資本主義各國所通常都有的那種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糧食價格在基本上由我們規定。工業品底價格由我們規定。我們努力實行減低成本費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時極力保持農產品底穩定價格。市場上這樣的特殊辦法，是資本主義各國所根本沒有的，這難道不明白嗎？

由此可見，在有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應當保存它的兩方面：一方面就是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底統制及以保證相當的貿易自由，另一方面，就是反對完全的貿易自由及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如果取消這兩方面底某一方面，那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了。

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祇能『從左邊』受到危險，從那些想消滅任何的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受到危險。這是

不對的，這是最嚴重的錯誤。況且，現在這樣的危險是最不實在的，因為我們的地方的及中央的組織內現在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那個人不懂得，保持相當的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完全妥當的。現在比較更實在得多的是從右邊來的危險，是從那些想消滅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而這樣來開闢完全的貿易自由底紀元的人們方面的危險。這種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現在比較實在得多，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不要忘記，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正在這方面進行工作——從右邊來進行破壞新經濟政策。也要記着，富農和豐裕份子底呼號，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底呼號（我們有許多同志往往受着這些呼號底影響），正是從這方面來衝擊新經濟政策。布哈林看不見這種破壞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危險，這個的確實的危險，這件事實就無疑地證明他是受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

布哈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和按區來『運用』糧食採辦價格，即是增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的市場條件，他想漸漸降低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並提議向那從右邊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讓步。

暫時假定我們是聽從了布哈林底話。由此會得出什麼結果呢？比如說，在秋季，在糧食採辦時期底初頭，我們提高糧食價格。可是因為市場上時常總有人、有各種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能多出兩倍價錢來收買糧食；又因為我們

不能同投機商人去搶生意，因為他們總共收買什麼一千萬普特，而我們却需要收買幾萬萬普特，於是糧食所有者反正還是會把糧食拿着不賣，等候繼續漲價。於是到春季的時候，當國家正開始最需要大批糧食的時候，我們又要增加糧食價格。可是在春季來抬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死貧苦的農民和力量單薄的農民，這些農民，在春季不得不買進糧食，部分地作為種子，部分地以供食用。而這些糧食就是他們在去年秋季以賤價賣出去而現在又以高價買回來的。花費了這些手續以後，我們是不是能夠得到什麼重大的結果，就是說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呢？一定是不能夠得到的，因為總是有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他們能夠又用比我們多一兩倍的價錢來收買同是這些糧食。於是，我們又要去應付糧食價格底提高，白費氣力來與投機商人及屯賣商人競爭。

而既然是這樣，那末我們既然走上了提高糧食價格的道路，我們就應該越往下滾去，還是沒有担保可以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

可是事情還不止於此。第一，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以後也就應該提高原料價格，以便維持各種農產品價格底相當比例；第二，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也就不能在城市裏維持糧食底低廉價格，——於是我們也就應該提高糧食底賣價。可是因為我們不能而且不應得罪工人——我們就應當以加快的速度來提高工資。可是這就不能不使得工業品底價格也提高起來，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辦，那末就會使財源違反着工業化底利益而從城市裏流入鄉村。結果我們就會要不是根據降低的價格或至少穩定的價格來調勻工業品與農產品底價格，而是根據糧食和工業品一同提高的價格來調勻這些價格。換一句話說，我們就會要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不難明白的，這樣『運用』價格，不能不弄到完全取消蘇維埃的價格政策，弄到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弄到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這將對於誰有利益呢？這就是對於城市和鄉村中的豐裕階層有利益，因為高價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不能不成爲工人階級和貧農以及能力單薄的農民所買不起的東西。佔便宜的是富農、豐裕份子、耐潑曼及其他的富足階級。

這也是聯絡，可是却是特殊的聯絡——是與鄉村及城市裏的富足階層的聯絡。工人和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將有全權來質問我們：我們究竟是誰的政權，是工農的政權呢，還是富農及耐潑曼的政權呢？

與工人階級及與鄉村裏經濟能力單薄的階層破裂，與鄉村及城市裏的豐裕階層聯盟，——這就是布哈林底所謂市場『常態化』及按區『運用』糧食價格所要弄出的結果。

顯然的，黨是不能走上這條滅亡的道路的。

布哈林關於新經濟政策的一切觀念是混亂到什麼地步，他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束縛是厲害到何等程度，這局部地在下面這件事實裏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他對

於城市與鄉村間的、國家與農民間的商品周轉底新形式問題是抱着極端反對的態度。他氣憤起來和叫喊起來反對這樣的事實，就是國家已變成了用商品來供給農民的供給人，而農民正變成拿糧食來供給國家的供給人。他認為這是違背新經濟政策底一切規矩，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試問，爲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要是國家、國家工業變成替農民供給商品的人，而農民變成替工業、替國家供給糧食的人，這會有什麼壞處呢？要是農民變成了替國家工業供給棉花和糖、蘿蔔以及大麻的供給人，而國家工業變成了替農業底這些部門供給城市商品、種子和生產工具的供給人，那末這從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底觀點上看來會有什麼壞處呢？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在這裏是建立城市與鄉村間商品周轉底這些新形式底基本方法。可是，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難道與新經濟政策底要求相矛盾嗎？如果因爲有這種訂立合同的方法，農民不僅在棉花、糖、蘿蔔和大麻方面，並且在糧食方面也變成爲國家底供給人，這會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小批生意、零星生意可以叫做商品周轉，而按照關於價格及商品質量的預定條約（訂立定貨合同）來進行的大批生意就不能叫做商品周轉呢？這種荒唐話從那裏來的呢？城市與鄉村間按照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來實行商品周轉的這些新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它們是我們的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的和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最大的進步，這難道不容易明白嗎？

布哈林已經不會了解這些簡單明瞭的東西，這不是奇怪嗎？

### 五 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新式聯絡問題

最後，就是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關於城市與鄉村間的新式聯絡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的意見分歧裏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我們的一切關於黨底經濟政策問題的實際方面的意見分歧底綫索，都是集中在這個問題內面的。

什麼是新式聯絡，從我們的經濟政策底觀點上看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除掉城市與鄉村聯絡底舊形式以外，我們現在還需要這個聯絡底新形式；在舊形式下面，工業在主要方面是滿足了農民底個人需要（花布、靴鞋、一般的布疋等等），而在新形式下面，工業將滿足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農用機器、拖拉機、改良的種子、肥料等等）。要是我們以前在主要方面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而少牽涉到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那末，現在我們除繼續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以外，同時還需要盡力供給農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與農業生產在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有直接關係的。過去，當任務還是在於恢復農業及由農民好好經營過去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的時候，我們還能夠以舊式聯絡為滿足。可是現在，當任務已經是在於改造農業的時候，這已經是不够了。現在須要更加前進，須要幫助農民在新技術及集體勞動底基礎上改造農業

生產。

第二，這就是說，除了改造我們的工業以外，同時我們還應當開始來認真改造農業。我們正在改造而且局部地已經改造了我們的工業，給我們的工業建立新的技術基礎，供給它以新的優良的機器，新的優良的幹部。我們建造着新的工廠和製造廠改造和擴大改善舊的工廠，我們發展着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因為這個緣故，城市就發展起來，新的工業地點就增多起來，舊的工業地點就擴大起來。因為這個緣故，對糧食品、對工業原料的需求就增長起來。而農業依舊還是使用舊的工具，使用舊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耕種方法，使用舊的、原始的、現在已不中用或者差不多已不中用的技術，使用舊的、小農的個人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比方，革命以前我們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個事實不是有很大的意義嗎？這一切不是證明農村經濟日益帶有渙散零碎的性質是什麼？而渙散的小農戶經濟底特點，就在於它們不能在應有的限度內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農業科學成績，就在於它們是少帶商品性的農業。因此，農產品內的商品出產量就感覺不夠。因此，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就有發生破裂的危險。因此，就必須催促農業底發展，使它趕上工業發展底速度。所以，為要不致有發生這種破裂的危險起見，須開始在新技術底基礎上來認真地改造農業。而為着改造農業起見，就須要把分散的農戶漸漸聯合為大規模的農莊、集體農莊，須要把農業建立在

集體勞動底基礎上，須要擴大集體農莊，須要發展舊的和新的蘇維埃農莊，須要把大批訂立定貨合同的形式有系統地運用於農業底一切基本部門，須要廣設農業機器站以幫助農民來學會使用新技術和把勞動集體化，——總而言之，須要把小農戶漸漸轉到大的集體生產底基礎上，因為祇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够盡量利用科學成績與新技術成績，大大推進我國農業底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忽視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不，不是的，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工業供給糧食及原料這件事情上，現在是有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有主要的作用。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必須幫助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可是這就是說，單祇是個體的農民經濟已經不够了。我們的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正是證明這一點。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需要盡力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因此需要以普遍訂立定貨合同，以成立農業機器站，以盡量發展合作制運動，作為個體的貧農中農農莊和集體的公共農莊之間的橋樑，以便使農民將自己小的個體農莊轉到集體勞動底軌道上。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解決五穀問題。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使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解脫窮苦，解脫貧困。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們的工業，因為我們的工業是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基本供給來源，必須發展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

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經過廣泛的訂立定貨合同制來督促基本的農民羣衆進到集體形式的經營，如果不用很多的拖拉機、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那末就沒有可能來發展集體農莊，就沒有可能來發展農業機器站。但是，如果不加緊速度來發展工業，就沒有可能來用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因此，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便是在集體制度基礎上進行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新式聯絡底意思和意義，就是這樣。

布哈林這一派人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新式聯絡底必要。可是，這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認，其目的是要用在口頭上承認新式聯絡這一點做掩護，以便暗中偷運一種簡直相反的東西。實際上，布哈林是反對聯絡底新形式的。布哈林底出發點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槓桿，而是發展個人底農民的農業。在布哈林看來，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場『常態化』，以及容許農產品市場上的自由玩弄價格，實質上就是容許完全的自由貿易。因為是這樣，所以他就對集體農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這種不信任的態度，當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演說時以及當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以前起草提綱時，他就已經表現出來。因為這樣，所以他就對於在採辦糧食時爲反對富農而採取的所有一切的和各種各樣的非常辦法都抱着否定的態度。大家都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辦法，正好像邪鬼躲避正神一樣。大家都知道，布哈林一直到現在還不能了解，

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富農不會自願地按照自流手續來繳納充分數量的糧食。這一點現在已經我們糧食採辦工作底兩年來的經驗所證實了。

如果商品糧食始終還是不夠，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要用非常辦法來驚動富農；從外國輸入糧食吧。不久以前，他還提議從外國輸入五千萬普特糧食，就是說，輸入價值一萬萬金盧布的糧食。如果金盧布須要用來輸入工業裝置品，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必須寧願從外國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要把輸入工業裝置品的事情放在末尾的地位。

這樣就是說，爲要解決五穀問題和改造農業起見所需要的基礎，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而是以自由市場及在自由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這一點做基礎來發展個人的農民的農業，富農的農業也在內。

這樣看來，這裏是有兩個不同的經濟政策計劃：

黨底計劃：

一， 我們要改造工業。

二， 我們要開始認真改造農業。

三， 爲要做到這一步，就要擴展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底建設，廣泛地採用訂立定貨合同制和設立農業機器站，以作爲建立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聯絡的手段。

四， 至於說到現時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那就必須承認，在這裏採取一種得着中農貧農羣衆底公共讚助的臨時的非常辦法，是可以的，這是打破富農底反抗和盡量取

得他的剩餘糧食的手段之一，而爲要免得從外國輸入糧食和保存金幣來發展工業，就必須取得這些剩餘糧食。

五， 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國家供給糧食和原料這件事情方面，現時有而且將來還會有主要的作用，可是單靠它已經不多了。——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要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廣泛的採用訂立定貨合同制，加緊發展農業機器站，爲的是要易於把資本主義份子排擠於農業以外，易於把個體農莊漸漸移到大規模的集體農莊底軌道上去，移到集體勞動底軌道上去。

可是爲要達到這一切，就必須首先努力發展工業，五金工業、化學工業、機械製造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而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解決五穀問題和改造農業。

結論就是：加快速度來發展工業，便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布哈林底計劃：

一， 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提高糧食價格，那怕這一點會弄到工業品、原料和糧食都昂貴起來。

二， 盡力發展個體的農民的農業，而同時相當地降低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底發展速度（布哈林在七月間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三， 用自流辦法採辦糧食；根據這種採辦法，那末



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面都不容許採用——那怕就是局部地採用——非常辦法去對付富農，即使這些辦法得到中農貧農羣衆底讚助，都是不可以採用的。

四， 如果採辦的糧食不够，便拿出一萬萬盧布去從外國輸入糧食。

五， 要是金幣不够來同時開支糧食底輸入和工業裝置品底輸入，那就應該減少裝置品底輸入，也就是說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不然我們的農業就會『踏步原地』，也許還會『簡直下降』。（布哈林：『經濟學家底意見』）

結論就是：發展個體農民經濟，便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事情底真相就是這樣的，同志們！

布哈林底計劃，就是降低工業發展底速度和破壞新式聯絡的一個計劃。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這樣。

我們對於發展新式聯絡，發展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等等這件事情，是不是做遲了呢？

有人斷定說，黨對於這件事情，至少遲做了兩年。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祇有不懂得蘇聯經濟的『左的』空談家才能這樣說，所謂在這件事情上做遲了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事情是在於預先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必要，那末我們還在十月革命時就開始了這件事情，而關於黨還在十月革命時期就已預先看到了集體農

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末了，還可以拿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所通過的黨綱來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在那裏已經十分明顯地顧及到了。可是要實行和組織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單祇靠我們黨底上層領導份子預先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還是不夠的。所以，問題不在於預先看到，而在於實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底計劃。可是爲要實現這樣的計劃就需要有好些條件，而這些條件是我們以前所沒有的，這些條件祇是在最近才表現出來，事情就在這裏，同志們。

爲要實行這個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底計劃，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需要使黨底上層機關在這方面首先得到黨員羣衆底讚助。而我們的黨，是人數達百萬的黨，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此，當時需要說服廣大的黨員羣衆，使他們相信上層領導機關底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爲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在農民羣衆裏造成擁護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要農民不害怕集體農莊，而根據經驗相信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好些，並自動地跑進集體農莊去，而這一點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花費相當時間的事情。這是第二。

其次，爲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國家有一批爲資助這個運動、爲資助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所必要的經費。而爲要資助這件事情，是需要許多萬萬款子的，親愛的同志。

們。這是第三。

末了，爲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需要使工業多少充分地發達，以使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來供給農業。這是第四。

是不是可以斷定說，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已有了這一切條件呢？不，不能這樣說。

不可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發出口號——我講的是運動底根本實際口號——而打算在自已取得政權以後去實現。誰也不能說，反對黨不立刻實現自己的基本口號是它的過錯，因爲大家都懂得，當權的不是它這個反對黨而是別的黨。而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是執政黨，所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政黨底口號不是簡單的（鼓動的）口號，而是一種更大得多的東西，因爲這些口號有實際解決底效力，有法律底效力，是應當立刻就實行的。我們的黨決不能提出實際的口號而然後把它延擱不執行，如果這樣，那就是欺騙羣衆。要發出口號，特別是將千百萬農民羣衆轉移到集體制度底軌道上去這樣重大的口號，需要有可以使它們直接實現的條件，末了需要創造和組織這些條件。因此，單祇是黨底上層機關預先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這對於我們還是不夠的。正是因爲這些緣故，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爲實現和切實執行我們的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黨底黨員羣衆，比如說，在兩三年以前是不是已經有決心去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不，他們

當時還沒有決心去做這件事情。黨員羣衆向着新式聯絡方面的重大轉變，祇是從糧食採辦方面的第一批嚴重困難發生時才開始的。祇是因為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羣衆才感覺得十分需要加速建立新式聯絡，首先就是加緊建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堅決讚助自己的中央委員會來進行這件事情。這就是我們從前沒有而且現在却有的 一個條件。

兩三年以前，我們這裏是不是有過千百萬農民羣衆贊成集體農莊或蘇維埃農莊的重大運動呢？是沒有的。人人都知道，兩三年以前農民是敵視蘇維埃農莊的，至於集體農莊，却被它們譏笑為毫不中用的『共產社』。而現在呢？現在就不同了。現在我們這裏已有整批農民階層把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看作是使農民經濟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幫助的來源：種子、優良的牲畜、機器和拖拉機。現在，祇要是有機器和拖拉機，集體農莊底事業就會以加快的速度前進。

在某一些的和很廣大的農民階層裏的這種轉變是從那裏來的呢？它是由什麼促進了的呢？首先是由於合作制和合作運動底發展。無可懷疑的，如果沒有合作制尤其是如果沒有農業合作制——這種合作制已在農民中間造成讚助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底強大的發展，我們這裏就不會有像現在整批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這種趨向於集體農莊的熱心。現有的組織得優良的集體農莊在這裏也起了大的作用，因為它們給了農民好的榜樣，表明將小農的農莊合併

爲大規模的農莊，合併爲集體農莊，是可以怎樣改良農業。這裏發生了相當作用的，還有現成的設備得優良的蘇維埃農莊，因爲它們幫助了農民改良它們的農業。我還不說到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的事實。這就是我們從前所沒有過的而現在却有了的又一個條件。

其次，可不可以斷定說，兩三年以前我們曾有可能去認真地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發出數萬萬盧布來資助這件事情呢？不，不能這樣斷定說。你們明白知道，我們在當時連用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沒有這樣最低限度的工業便根本不能有任何的工業化）的經費都不够，更不用說去改造農業了。當時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那成爲國家工業化底基礎的工業方面取出這些經費，而把它們轉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顯然是不可以的。可是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經費來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末了，可不可以斷定說，兩三年以前我們已在工業方面有了充分的基礎，來加緊着拿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等等呢？是不能這樣斷定說的，那時的任務，在於創造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將來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業。當時我們的區區的款項也就用去創造這種基礎。可是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這種工業基礎以供給農業底需要。無論如何，這種基礎在我們這裏，正在以加快的速度創造起來。

可見，爲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底大批發展所必需的條件，祇是在最近時候才造成的。

同志們，事情底真相就是這樣的。

正是因為這樣緣故，所以不能說我們把發展新式聯絡這件事做得太遲。

## 六 布哈林是怎樣的理論家

右傾反對派底理論家——布哈林——在我們的政策底這些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就是這樣。

有人說，布哈林是我們黨底理論家。他當然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不小的理論家。可是問題的實質就在於他的理論並不完全是高明的。這祇要看他在黨的政策底問題上所作出的那一堆錯誤——關於這些錯誤我在上面已經講過——就可以知道。這些錯誤，關於共產國際問題上的錯誤，關於階級鬭爭問題、關於階級鬭爭尖銳化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聯絡底新形式問題所犯過的這些錯誤，決不能是偶然出現了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它們，布哈林底這些錯誤，是從他的不正確的立場、從他的理論缺點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是個理論家，可是他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這個理論家還得補習一下以後，才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有些人總是藉口說列寧那封給了理論家布哈林以估計的著名的信。現在來談一談這封信吧。列寧說：

『從年青的中央委員中間，我想關於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說幾句話。我以為這是最出色的人材（就最年輕的人材來說），關於他們須要注意以下一點：布哈

林不但是黨內極寶貴的和極巨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作是全黨所喜愛的人，可是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因為在他的思想裏有些學究氣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想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底記錄，第四卷，第六六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學究式的理論家，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的理論家。列寧對於布哈林底理論面目的估計，就是這樣。

同志們，你們自己都懂得，這樣的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如果布哈林懂得：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他是一個還沒有完全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却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如果他懂得這一點，他就會謙遜一些，而這樣一來，對於黨祇會有好處。但是倒霉處就在於布哈林並不過於謙遜。倒霉處就在於他不僅不過於謙遜，而且關於好些問題，首先是關於國家問題，他還想去教訓我們的教師列寧。同志們，倒霉處就在這裏。

在這裏，我要引證一九一六年列寧與布哈林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著名的理論上的爭辯。這一點，對於我們很是重要，以便揭露布哈林底太不量力的野心，想去教訓列寧的這種野心，同時也可以揭露他在這樣的重要問題上，

如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鬭爭問題等等上的理論弱點底根源。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底一篇文章，署名爲 *Nota Bene*，這篇文章在事實上是用來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內寫道：

『…要是認爲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在於前者贊成國家而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實際上區別就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作爲集中的、即是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祇是退步到舊的技術，舊式企業…。』

『…社會民主黨是或者至少應當是羣衆底教育者，對於這個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現在的戰爭已經指明國家觀念底根蒂是何等深入到工人底心靈內去了。』

列寧批評布哈林底這些觀點。於一九一六年發表了一篇專門論文回答：

『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而所回答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對將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這當然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問題。可是，並不因此而就可以把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忘記。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底解放的鬭爭中利



用現代的國家及其各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它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n) 它，如「Nota Bene」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而把這種觀點誤推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在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就要衰亡，「漸漸」「死去」…。

…要想「着重指出」對於國家的「原則上敵視態度」，就要真正「明白」懂得這態度，而作者恰恰就沒有明白性。「國家觀念底根蒂」這種話是完全糊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並不是「國家觀念」碰着了國家觀念底否定，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去對待國家）碰着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去對待資產階級的國家和以這樣的態度去利用國家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階級）。這是完完全全不相同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少年國際』）

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是滾入了何等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泥潭，這大概是明白了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還沒有盡量規定『炸毀』國家底

必要。而布哈林雖然是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去規定這個問題。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不是的，現在講的不是關於這一點，現在講的是對於國家的一般態度，是關於這一點，就是依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工人階級底國家也在其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祇講到關於利用國家的問題，而關於『炸毀』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時，却絲毫也沒有講到。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你弄錯了。我敢給你担保，這裏講的是關於，依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着重指明自己對於任何國家，因而也是對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對於工人階級底國家的原則上的仇視態度。你試去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極力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布哈林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的論文中所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在這裏忽略過了一件『小事情』，就是他忽略過了一整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如果的確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便不能不要有自己的本身所有的國家。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在自己的批評中沒有講到關於『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僅講到了這種理論，這從我們所引過的那段話內可以看出來，而且，他還會批評它，說它是無政

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關於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它對立。末了，不要把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國家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理論混爲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觀念混爲一談，認爲它們都是同一個思想底表現。可是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和『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的時候，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爲出發點的。

要是我爲着更明白起見，把列寧關於國家問題的手稿之一——這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末或一九一七年初（二月革命以前）寫的——引出來，或許不是沒有益處的。從這篇手稿中可以容易看到：（一）列寧批評布哈林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國家問題的錯誤的時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爲出發點；（二）雖然布哈林依列寧底說法『比考茨基較近真理』，可是他還是『並沒有揭破考茨基派，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去幫助他們』。請看這篇手稿底原文：

『在關於國家問題方面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是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六號至二十八號，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一封信。

請看這封信底整段最重要的地方：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照這

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的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所有這一套關於國家的廢話了，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在原來意思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字眼來攻擊我們已太够了，雖然馬克思底那些用以駁斥蒲魯東的著作和以後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簡直說過：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施行時，國家就要自行解散(Sich auflöst)和自行消滅。既然國家祇是在鬭爭時、在革命時不得利用來以暴力來鎮壓自己的敵人的一種臨時機關，那末，關於自由的人民國家的說話就是純粹的無謂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他不是為自由起見而需要它，而是為鎮壓自己的敵人起見而需要它。而到了有可能來談到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因此，我們要提議到處用「公社」(Gemeinwesen) 這個字眼來代替國家這個字眼，公社這個字眼是一個很好的德國古字，與法文的「康姆納」相當。(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 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裏大概是最顯著的和最激烈的「反對國家」的議論了。

(一)「應當拋棄所有這一套關於國家的廢話。」

(二)「公社已經不是在原來意思上的國家

了。」

(到底是什麼呢？顯然是由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

(三)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字眼來「攻擊」(原文in die Zähne geworfen——打嘴巴)我們已經够了(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他們的德國朋友犯了這個顯然的錯誤而覺得不好意思；然而他們認為，依當時的情況當然是正確地認為，這個錯誤比無政府主義者底錯誤是比較不重要得多。這要NB!!)。

(四)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施行時」，國家便會「自行解體和自己消滅」…「自行解散」(Nota Bene)(請與以後的「衰亡」字眼對照看)…。

(五) 國家是「在鬭爭時、在革命時」所需要的「臨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六) 國家之需要，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壓倒(Niederhaltung——這個字並不是壓倒這個字底本來意思，而是制止復辟、鎮服)無產階級底敵人。

(七) 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

(八) 「我們(即是恩格斯和馬克思)要提議『到處』(在綱領上)不講『國家』而講『公社』(Gemeinwesen)，『康姆納』！」

由此可見，不祇是機會主義者，而且是考茨基，也是如何俗化了和污辱了馬克思與恩格斯。

這八項最豐富的思想，機會主義者一項也沒有懂得！

他們祇採取了現有東西底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鬭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得讓步」。這是對的（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但這還祇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這樣用算術名詞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作品和一般的時評著作上，完全抹煞了（或者是忘記了？或者沒有懂得？）馬克思底一、二、五、六、七、八等項和「Zerbrechen」這個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或一九一三年與潘業枯克辯論時——看下面四十五頁至四十七頁——，關於這個問題已完全滾落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使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主張現在利用國家和（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候也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目前對於實際工作最重要的幾項。（布哈林正是把這幾項忘記了！）

使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就是以下的幾點更深刻「更恆久的」真理，就是：（一）國家是有「暫時」性的；（二）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三）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底性質；（四）國家與自由是相矛盾的；（五）應當用「公社」這個字眼代替國家這個字眼，「公社」這個字眼是比較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名詞）；（六）應「打破」（Zerbrechen）軍閥官僚的機器。還有一

點不可忘記，就是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伯恩斯坦、科里布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便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他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它，並容忍科里布等人底叛徒行爲。

一九一六年八月，已經向布哈林寫過：「請你讓自己的關於國家的思想完全成熟罷」。可是，他並沒有讓自己的這種思想完全成熟，而就在刊物上發表了，署名爲（Nota Bene），而且他所發表的意見並沒有揭破考茨基派，反而是用自己的錯誤去幫助了他們！可是實際上布哈林是比較考茨基近於真理的。」

（列寧）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辯底簡略歷史就是這樣。問題本來似乎是很明顯的：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早已應當改正這些錯誤，而跟着列寧底脚步前進。可是祇有列寧主義者才能這樣想。布哈林却不同意這一點。他反而斷定說，不是他錯了，而是列寧錯了，不是他跟隨了或者應當跟隨着列寧底脚步走，而是相反，原來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底脚步走。同志們，你們不相信嗎？如果不相信，請再聽下去吧。自從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以後，已經九年了，在這九年之內布哈林沒有做聲，在列寧死後過了一年，就是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把他的『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理論』這篇論文登在『法權底革命』彙刊上，而這篇論文就是以前『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編輯部（即列寧）所沒有接受來發表的，他在這篇論

文底附註上面簡直說，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並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們，這看起來是很奇怪的，然而這却是事實。

請聽聽這個附註底本文：

『依里奇（即列寧）曾經發表一篇評論來反對「少年國際」雜誌上的一篇論文。讀者容易看到，人家曾經硬說我有錯誤，可是，我本來沒有錯誤，因為我明白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另一方面，從依里奇底評論中可以看出，他那時對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這種原理有了不正確的態度，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底衰亡問題混淆了。也許我那時應當多多發揮專政的問題。但是我可以這樣來替自己辯白，就是那時候社會民主黨人曾經這樣風行一時地讚美資產階級的國家，以至於在這種情形下面，自然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關於炸毀這架機器的問題上。』

當我由美國回到俄國而碰見了克魯普斯加雅同志的時候（這是在我們的祕密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這時依里奇已躲藏起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依里奇叫我向你轉達，說關於國家問題，他現在與你並沒有什麼意見分歧」。依里奇研究問題時，也得出了關於「炸毀」的同樣結論，可是他是這樣發揮了這個題目以及關於專政的學說，以至於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見『法權底革



命』彙刊，第一冊，一九二五年共產主義學院出版，第五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布哈林在列寧死後經過一年的時候，就是這樣議論列寧的。

這就是沒有學習成就的理論家過分妄自尊大的標本。也許克魯普斯加雅同志真是對布哈林說過他在這裏所寫的話，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祇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列寧曾經有了一些根據來意料布哈林已經放棄了或者已決意放棄自己的錯誤。不過是這樣罷了。可是布哈林却有了另外的打算。他斷定了，從今以後應該算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底創造者或至少是發啓人的，並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

我們向來都認為，並且現在還照舊認為我們自己都是列寧主義者。可是現在才知道：列寧和他的學生——我們，原來都是布哈林主義者。同志們，這真是有點兒好笑。可是布哈林既然要這樣過分妄自尊大，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可以設想，布哈林在上述這篇論文底附註上不過是偶然失言，說了一句蠢話，後來已經把它忘記了。可是這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底話，原來是完全認真說出來的。這一點可以從這樣一件事實中間看得出來，就是布哈林在這個附註中所說的關於列寧底錯誤和布哈林底有理這種話，在不久以前，就是說在一九二七年，就是說在布哈林第一次襲擊列寧以後已經過兩年的時候，又在馬列茨基

所作的布哈林底傳略裏發表出來了（請參看『蘇維埃百科全書』），並且布哈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去抗議馬列茨基底這種大膽行爲。顯然的，布哈林底反對列寧的言論，決不可以認爲是偶然的。

這樣說起來，那末對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底發啓人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底理論上的錯誤和理論上的妄自尊大，就是這樣的。

雖然是這樣，這個人却還是有勇氣來在這裏、在自己的演說裏，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上『有些腐朽東西』，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上有趨於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而說這樣話的，就正是這個布哈林，這個布哈林現在正犯着（而且過去已經犯過）好些最粗鄙的理論錯誤和實際錯誤，不久以前還作過託洛茨基底門生，昨天還找過託洛茨基派做同盟者來反對列寧主義者，還與他們暗中私通過！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好笑嗎？

### 七 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

現在來講李可夫底演說。要是布哈林企圖給右傾思想以理論的基礎，那末，李可夫就極力想在自己的演說中替這件事情立定實際提議的基礎，拿我們農業方面的困難底『可怕情形』來恐嚇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沒有提到理論問題。不，他提到了這些問題。可是他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至少是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所提出的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草案，被中央政

治局專門委員會否決了，那草案上說，『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把這種完全不正確的立場否決了，可是李可夫竟在這次演說中擁護了這種立場。說在蘇維埃國家內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這話對不對呢？不，不對的。並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任何的增長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一定的增長，就是——需要足以保證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部門有系統地超過資本主義部門的這種增長。同志們，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五年計劃如果忘掉這個中心思想，那末它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廢話。勞動生產率底一般的增長，是任何一個社會所願意的，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無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也好，都是願意有的。蘇維埃社會與其他任何社會不同的地方也正在於，它所願意有的並不是勞動生產率底任何的增長，而祇是這樣一種增長，這種增長要能夠保證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超過其他各種經濟形式，首先是超過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如此而保證征服和排擠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而李可夫却把蘇維埃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底這種真正中心思想忘記了。這裏就是他的第一個理論錯誤。

他的第二個錯誤就在於，從商品周轉底觀點上看來，他不懂得（比如說）集體農莊和任何個人農莊——就中也包括資本主義的個人農莊——中間的分別，或不願意明瞭它們中間的分別。李可夫斷定說，從糧食市場上商品周轉

底觀點上看來，從取得糧食的觀點上看來，他看不見集體農莊與糧食私有主間的分別，所以在他看來，我們是從集體農莊方面，從私有主方面，還是從某個阿根廷的糧食商販方面去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伏龍金底著名言論，伏龍金有一個時候曾經對人說，在他看來，在何處以及向何人，向私有主還是向集體農莊去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的。這就是給糧食市場上的富農詭計作暗藏式的擁護、辯護與辯白。雖然這種擁護是從商品周轉底觀念上進行的，可是這個事實並不改變事情底實質，就是這種擁護畢竟還是替糧食市場上的富農詭計辯白。如果從商品周轉底觀點上看來，集體形式的經濟與非集體形式的經濟之間沒有分別，那末，是不是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不是值得給它們以優待條件，是不是值得去實現那征服農業上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困難任務呢？李可夫顯然是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這裏就是他的第二個理論錯誤。

而且這還不過是順便說的話。現在來講李可夫底演說中所提出了的實際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斷定說，除了五年計劃之外，還需要有另外的平行的計劃，就是發展農業底兩年計劃。他引用農業上的困難作為提議平行的兩年計劃的根據。他說過：五年計劃是好事情，他也是贊成的，可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擬定農業底兩年計劃，那就更好，——要不然，農業事情就會停頓。表面上看來，這個提議似乎一點也不壞。可是如

果切實去考察一下，就可看出，他之所以想出農業底兩年計劃，原來是爲的要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切實的，是紙上的，而兩年計劃是切實的，可行的。我們能够同意這一點嗎？顯然是不能夠的。我們曾向李可夫說過：如果你不滿意農業方面的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爲五年計劃上所規定的用去發展農業的款子不尙，就請公開說出你的補充提議，說出你的補充投資數目來，——我們同意把農業上的這些補充投資加在五年計劃上。結果是怎麼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什麼關於農業上的補充投資的補充提議。試問，那末農業底平行的兩年計劃要着幹什麼呢？我們往後又向他說過：除了五年計劃之外，還有每年計劃，這是五年計劃底一部份——請把你關於振興農業方面的補充的具體提議加進頭兩年的每年計劃上面去，如果有李可夫一般地是有這些提議的話。結果怎麼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提出這樣的關於補充撥款的具體計劃。那時我們就明白了李可夫關於兩年計劃的提議，並不是要去振興農業，而是想來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切實的紙上計劃，而是想來破壞五年計劃。爲着安慰『心靈』，爲掩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劃；爲着進行事情，爲進行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李可夫底戰略，原來就是這樣。李可夫提出兩年計劃來，是爲着在以後、在五年計劃底具體實行過程中，好拿兩年計劃來對抗五年計劃，好來改造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遷就兩年計劃，這樣來縮小和刪削那些用來發展工業的經費。

我們之所以否決了李可夫底關於平行的兩年計劃，就是因為有了這些理由。

## 八 關於耕種面積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恐嚇我們黨，說全蘇聯底耕種面積有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趨勢。同時他暗指着黨，暗示說，耕種面積底縮小應歸於黨底政策。他沒有公開說出，我們的事情正趨向於退化。可是從他的演說中可得出這樣的印象，就是說我們這裏是有類似退化的現象。說耕種面積有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趨勢，這種話對不對呢？是不對的。李可夫在這裏所採用了的，是關於全國耕種面積的平均計算。可是平均計算的方法，不用各區的統計材料來參照，就不是科學的方法。也許李可夫曾經讀過列寧著的『資本主義底發展』這本書。如果他讀過，他定當記得，列寧怎樣在那裏罵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關於耕種面積底發展是採用平均計算法，而忽視各區的統計材料。奇怪的是李可夫現在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底錯誤。所以，要是按區考察耕種面積底變動，即是說要是依科學方法來考察問題，那末，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有的區域裏，耕種面積是有經常不斷的增加，在有的區域裏，耕種面積，主要地是隨着氣候條件為轉移而有時減少；並且沒有這樣的材料可以證明，我們在什麼地方，那怕就是在某一個重大的糧食區域內，是有耕種面積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情形。

實際上，在有幾個受了大冰凍或旱災的地方，例如烏克蘭有幾個區域，耕種面積近來有了縮小。

座位上有的人說道：並不是整個烏克蘭。

施里赫特說道：在烏克蘭，耕種面積已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七。

斯大林繼續說道：我說的是烏克蘭底荒原地帶。可是在其他各區，例如在西伯利亞，在伏爾加河一帶，在哥薩克斯坦，在巴什基里亞，沒有被不良的氣候條件所牽累的地方，耕種面積是有系統地增加着。爲什麼在有些區域裏耕種面積有系統地增加，而在別個區域裏却有時減少呢？其實不能說，黨底政策在烏克蘭是一樣，而在蘇聯底東部或中部又是另一樣。同志們，這是講不通的。顯然的，氣候條件在這裏有不小的意義。

對的，富農不管氣候條件如何而縮小着耕種面積。這裏也許可以『歸咎』於黨底政策，因爲黨底政策是要幫助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可是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曾在什麼時候答應過要進行一種能使鄉村中一切社會集團都能滿意——連富農也能滿意——的政策嗎？而且一般地說來，如果我們一般地想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策，那末難道我們可以實行一種能够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都能滿意的政策嗎？如果由於我們實行了這種以限制和克服鄉村資本主義成份爲目標的列寧主義的政策的结果，富農便開始局部地縮小了自己的耕種，那末這有什麼特別呢？難道可以不這樣嗎？也許這個政策是不對的吧，——那末就請向我們公開這樣說。稱自己爲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看見富農局部地縮小耕種，就大驚小怪地說是一般耕種面積底縮

小，而忘記除了富農之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耕種正在推廣，還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它們的耕種正在以加快的速度增長着，這不是很奇怪嗎？

末了，在李可夫底演說詞內，關於耕種面積問題還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李可夫在這裏訴苦，說有的地方，就是在集體農莊最發達的地方，貧農中農的個人耕種面積開始在縮小。這是對的。可是這有什麼壞處？不這樣又能怎樣呢？如果貧農中農開始拋棄個人的耕地而加入集體農莊，那末集體農莊底推廣和增多就應當同時引起貧農中農個人耕地相當的縮小，這難道不明白嗎？你想要怎麼呢？現在集體農莊方面有兩百多萬公畝的土地。到五年計劃之末，集體農莊將有二千五百萬公畝以上。集體農莊耕地是用什麼人底土地來擴展的呢？是用貧農中農的個人的耕地。而你們想要怎麼樣呢，親愛的同志們？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來使貧農中農的個人農業轉移到集體農業底軌道上去呢？集體農莊的耕地將在許多區域內靠着合併個人農莊的耕地而發展，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人們不願意瞭解這種簡單的事情，真是奇怪。

### 九 關於糧食採辦問題

關於我們的糧食困難，人們在這裏說了一大堆荒唐話。可是，把我們的糧食的行情性的困難方面的要點却忽略過去了。首先就是忘記了，我們今年所收穫了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收穫總量——比去年少了五六萬萬普特。這能夠不影響到我們的糧食採辦事業嗎？當然是不能夠不



影響到。也許這應歸咎於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吧？不，這是與中央底政策無關的。這種現象是由於烏克蘭底荒原地帶有了嚴重的歉收（大霜凍、旱災），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區以及西北區有局部的歉收。主要地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去年我們在烏克蘭到四月一日時已採辦了二萬萬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却總共祇採辦了二千六百萬到二千七百萬普特。小麥與黑麥底採辦在中央黑土區差不多降低了七倍，在北高加索差不多降低了三倍，也就是因為這一點。今年在東方糧食採辦，有幾區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是這當然不能補償而且也沒有補償我們在烏克蘭、在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區所遇的糧食採辦不足的情形。不要忘記，在常態的收成之下，在烏克蘭與北高加索所採辦的糧食，等於蘇聯所採辦的全部糧食底一半以上，而有時還甚至三分之二。李可夫把這種情況忽略過去了，真是奇怪。

最後，還有第二個情況，這種情況是我們的糧食採辦的行情性的困難方面的主要關鍵。我所指的是鄉村中富農和豐裕份子反抗蘇維埃政府底糧食採辦政策。李可夫避開了這種情況。可是避開這一點，就是避開糧食採辦事情上的主要關鍵。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採辦方面的經驗證明什麼呢？它證明，鄉村中的殷實階層，手內握有大部份剩餘糧食，並在糧食市場上起指揮作用，他們不願意把我們所需要的糧食，依蘇維埃政權所規定的價格自願地賣給我們。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萬萬普特的糧食來供給城市和工業地

點，供給紅軍和工藝原料作物區域。依自流底辦法，我們大約能採辦到三萬萬到三萬五千萬普特。其餘一萬五千萬普特，不得不用對富農及鄉村殷實階層施行強迫辦法來取得。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的經驗所證明給我們看的，就是這樣。

最近這兩年以來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的變遷是從那裏來的，爲什麼自流辦法在從前有濟於事，而現在却已經不够了呢？所發生了的事情就是：富農和殷實分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他們在經濟上強固了，積累了一些兒資本，現在他們能在市場上投機，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屯積起來以等待高價，而拿別的農作物來周轉周轉。糧食不是平常的商品。糧食不比棉花，棉花不能吃，不是見人就能賣出的。在我們現今這種條件之下糧食與棉花不同，它是這樣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是大家都要的，沒有它就不能生存。富農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他把糧食屯積起來，使一般的糧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金幣中的金幣。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使自己發財的手段，而且是用以束縛貧農的手段。富農手上的剩餘糧食，在現今的條件之下是加強富農分子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手段，因此，我們從富農方面取得這些剩餘糧食，這不僅便利着城市和紅軍底糧食供給，而且根本破壞着那個使富農底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加強的手段。

要得到這些剩餘糧食，需要怎樣辦呢？首先需要消滅

自流主義底心理，因為這種心理是有害的和危險的東西。需要組織糧食採辦。需要動員貧農中農羣衆來反對富農，並組織他們來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底那些加強糧食採辦工作的辦法。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依自動規定徵收額的原則所實行的糧食採辦方法底意義，正是在於它使得有可能來動員鄉村中勞動階層去反對富農以加緊糧食採辦的工作。經驗指明了，這個方法使我們得到良好的結果。經驗指明了，這些良好結果我們是在下面這兩方面得到的：第一，我們徵取鄉村富裕階層底剩餘糧食，這樣來便利國家底供給事業；第二，我們在這事情上動員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在政治上教育他們，將他們組織為我們在鄉村中的強有力的、成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沒有注意到這第二種情形。然而這種情形，正就是烏拉爾、西伯利亞的糧食採辦方法底重要結果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結果的話。固然，有時候，除這個方法以外，還同時採用非常辦法來對付富農，這就引起布哈林及李可夫底可笑的叫喊。可是這有什麼壞處呢？為什麼不能在有些時候，在相當的條件之下採用非常辦法來對付我們的階級敵人，來對付富農呢？為什麼在城市內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機商人，將他們逐到土魯汗去，而對於那些企圖扼住蘇維埃政權底咽喉和束縛貧農的富農們，就不能用社會制裁的辦法，按貧農中農賣糧食給我們採辦機關的價格去取得他的剩餘糧食？這是從那裏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的黨曾經說過它在原則上反對採用非常辦法去對付富農嗎？李可夫和布哈林，顯然

是在原則上反對採取任何一種非常辦法對付富農的。可是親愛的同志們，須知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你們不能不知道，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甚至主張——當然是在相當的條件下面——恢復貧農委員會底政策。可是什麼是局部地用非常辦法來對付富農呢？這與貧農委員會底政策比較，甚至於還算不得滄海一粟。

他們，布哈林這一派人，希望說服階級敵人，使他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自願賣給我們。他們希望，富農——已經長大了的，並有可能拿別的農作物來實行周轉的、隱藏着自己的剩餘糧食的富農——會依照我們的糧食採辦價格而自願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賣給我們。他們不是發了昏嗎？他們豈不是顯然不懂得階級鬭爭底關鍵，顯然不知道什麼是階級嗎？他們是不是知道在我們爲着加強糧食採辦工作而召集的鄉村會議上面，富農怎樣譏笑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就是例如在哥薩克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費了兩點鐘工夫去勸說糧食所有人把糧食交出來供給國家的時候，有一個富農口裏啣着煙斗出來講話，向着這位鼓動員回答：『喂，小孩子，請你在我面前跳一跳舞，我就給你兩個普特糧食。』

座位上有人喊道：真是混賬忘八蛋！

斯大林繼續說道：請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同志們，階級到底還是階級呵。誰也跳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

和西伯利亞的方法底好處，本來也就在於，它使得更有可能來推動貧農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使得更有可能來打破富農底反抗和強迫他們把剩餘糧食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現在新反對派中間，布哈林這一派中間，最時髦的字眼就是糧食採辦上的『過火』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在他們那裏是最通行的貨物，因為它幫助他們掩飾自己的路線。當他們想掩飾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是這樣說：我們當然不反對壓榨富農，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犯的和觸犯中農的那些過火行動。然後，就來描寫這些過火行動底可怕情形，宣讀『農民』底信，宣讀如馬爾科夫這類人底大驚小怪的信件，然後做出結論：須要取消壓榨富農的政策。因為實行正確的政策時有了過火行動，所以就需要取消這個正確的政策，這豈不很好嗎？機會主義者底慣技就是這樣：藉口說在實行正確路線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的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同時布哈林這派裏面的人，小心地瞞着這樣的事實，就是還有另一種過火行動，更危險和更有害的過火行動——這種過火行動，就是走向與富農結合，走向遷就鄉村裏富裕階層，走向用右傾份子底機會主義政策去代替黨底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反對這些過火行動。我們大家都是反對把用去對付富農的打擊拿來觸動中農。這是顯然的，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用布哈林這派人所努力使用的關於過火行動的那一套廢話，來破壞我們黨的革命政策和用布哈林這派人底機會主義政策來暗中代替

它，那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同志們，不行的，『你們的這套把戲是要不通的』。

請你們說一說，在黨底政治辦法裏，究竟有那一個政治辦法在實行的時候，沒有附帶發生某些過火行動。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要與過火行動作鬭爭。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就責罵路綫底本身、唯一正確的路綫底本身嗎？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日這樣的辦法來講把。這個辦法是我們的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辦法之一，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誰不知道，這個在實質上很是革命的辦法，在我們這裏實行的時候就附帶發生過好些過火的行動，有時還是極可惡的過火行動。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日的政策呢？新反對派方面的同志們是不是懂得，他們動不動就把糧食採辦工作上過火行動拿來做藉口，這是滾到何等污濁的泥坑裏去了。

#### 四 關於與右傾鬭爭問題

這樣，我們已經再三分析了我們的意見分歧底一切主要問題。無論是在理論方面，無論是在我們黨底共產國際政策及內部政策方面，都講過了。由以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李可夫關於在我們這裏有一致的路綫的意見，是不符實情的。由以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我們這裏實際上有兩條路綫。一條是黨底總路綫，是我們黨底革命的列寧的路綫。另一條路綫就是布哈林這一派底路綫。這第二條路綫

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局部地是因為布哈林這一派人裏面觀點非常糊塗不清，局部地是因為這第二條路綫由於自己在黨內比重上的軟弱，所以總想這樣或那樣戴着假面具。可是它，這條路綫，到底還是存在着（這是你們所看到的），而且是一條與黨底路綫不同的路綫，是一條差不多在黨政策底一切問題上與黨底總路綫對立的路綫。這第二條路綫在基本上是右傾底路綫。

布哈林在這裏說，中央政治局三個委員受着『精神上的死刑』。他說，這三個委員被我們各個組織『當衆批評着』。他說，黨已經使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受着『精神上的死刑』，在刊物上和會議上批評他們的錯誤，可是他們——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却『不得不』閉口不言。同志們，這是廢話。這是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底妄言，這種共產黨員企圖減弱黨底反右傾的鬭爭。

照布哈林說來，要是他和他的朋友們犯了右傾的錯誤，那末黨是沒有權利來揭破這些錯誤的，黨應當停止與右傾的鬭爭，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自願放棄自己的錯誤。布哈林所要求於我們的不是太多了嗎？他是不是以為，黨是爲着他而存在，而不是他爲着黨而存在呢？當全黨動員起來反對右傾，進行決戰去征服困難的時候，誰強迫他閉口不言，靜靜地坐着呢？布哈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爲什麼現在不發言，不進行堅決的鬭爭去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決意走上這一個並不是

怎樣困難的步驟，那末黨一定會歡迎他們——對於這一點，難道有誰可以懷疑嗎？爲什麼他們不決意走上這一個歸根到底他們還是一定要走的步驟呢？是不是因爲他們把自己派別底利益看着比黨底和黨的總路線底利益更高呢？在反右傾的鬭爭中，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這幾個人，完全沒有參加，這到底是誰的過錯呢？所謂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受『精神上的死刑』這一套話，就是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底一個掩飾得不很巧妙的企圖——想強迫着我們黨閉口不言和停止反右傾的鬭爭——這還不很顯然嗎？

與右傾鬭爭，並不是我們黨底次要任務。與右傾鬭爭是我們黨底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自己本身的隊伍內，在自己本身的黨內，在領導運動及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司令部內，——如果我們在這一個司令部內容許右傾份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這些份子企圖拆散黨底隊伍，企圖腐化工人階級，企圖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並這樣來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投降——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末，這將是什麼意思呢？這難道不就是說我們想漸漸降低革命，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份子嗎？布哈林這一派人是不是懂得，拒絕與右傾作鬭爭，這就是出賣工人階級，出賣革命呢？布哈林這一派是不是懂得，不征服右傾和調和派，就不能征服我們面前的困難，而不征服這些困難，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決定的勝利？既然這樣，那末關於所謂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受



『精神上的死刑』的廢話，還有什麼價值？

同志們，不行的，用所謂『精神上的死刑』這類自由派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你們來和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內去與右傾及調和派作堅決的鬭爭。黨要求你們這樣，爲的是要易於動員工人階級，組織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綫上的進攻，打破階級敵人底反抗並保證克服我們的建設方面的困難。或者你們執行黨底這個要求，那時，黨就會歡迎你們；或者你們不做到這一點——那時你們就祇好埋怨自己。

# 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第十二週年（一九二九）紀念而作

過去的這一年，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戰綫上大轉變的一年。社會主義向城市及農村資本主義成份舉行堅決的進攻就是這個轉變底標誌。這個轉變已在這個標誌下進行了，而且還繼續在這個標誌下進行着。這個進攻底特徵，就是它已經使我們在蘇聯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底各個基本方面，得到了許多可以決定一切的成績。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我們底黨是能夠在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個階段中適當地利用一種退守，以便在新經濟政策往後的階段中進行一種轉變，並對資本主義成份施行一種順利的進攻。

『我們現在是向後退着，然而，我們這樣的後退是預備起初向後退，然後再迅速地向前跑，則跳得更遠。僅是因爲這個目的，我們在施行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中，才向退守…以便在退守以後，再開始最堅決的向前進攻。』（『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一〇三頁）

這一年來的總結，已經肯定地證明：我們底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執行了列寧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並得到了勝利。

如果拿這一年來的經濟建設（這個對於我們是有極大意義的）底總結來說，那我們在這裏進攻所得到的勝利，我們這一年來的成績，就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

第一，就是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毫無疑義的，去年經濟建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假使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根本的轉變。這個轉變底表現，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創造的自動性和強烈的勞動興奮性之發展。這就是我們這一年內第一個最主要的成績。

羣衆底創造自動性和勞動興奮性之發展，是由下列三方面的鬭爭所引起來的：第一方面，是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和壓制羣衆勞動自動性與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作鬭爭；第二方面，是用社會主義競賽的方法，來和偷懶者及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人作鬭爭；第三方面，是用實行不斷生產周的方法，來和生產中的頑固與守舊作鬭爭。結果，我們在勞動的戰綫上，得到了極大的成績，例如勞動的熱情和在我們這樣廣闊無邊的國家內四方各處的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彼此鼓勵的工作。這種成績底意義之偉大，確是不可計量的；因為，祇有廣大羣衆底勞動興奮和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的向上提高；如果沒有這種提高，社會主義要澈底戰勝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

列寧曾說：

『歸究到底說來，勞動生產率的確是保證新社會制度之勝利的最重要的與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未看到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澈底消滅，而且必然會澈底消滅，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造成一種新的、更高度的勞動生產率。』

（『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五四頁）

列寧根據這點，所以認為：

『我們現在應當養成一種勞動的熱情和勞動的意志與癖性，現在救助工農，救助國民經濟，全靠這種勞動的熱情和勞動的意志與癖性。』（『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下冊，第四三三頁）

這就是列寧在黨面前所提出的任務。

過去的一年已經證明了，黨的確是很有成效地執行這個任務，堅決地克服橫在這條路上的困難。

黨在這一年來第一個重要的成績就是如此。

第二，就是在工業建設方面。——和黨底第一個成績相密切聯結着的就是黨底第二個成績。這第二個成績就是：在這一年內，我們在基本上已經把重工業的基本建設方面基金積累的問題好好地解決了；我們在生產工具的生產中，採取了很快的速度；並造成了一種先決條件，預備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五金業的國家。這就是我們在這一年中第二個主要的成績。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甚麼特別困難的。因為在幾年以

前，我們就把它解決了。重工業問題是比較困難比較重要。它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大批的投資；同時，許多工業落後國家底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巨大的長期債款，重工業是不能發展的。它所以比較重要，是因為如果不發展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設任何的工業，就不能實行任何的工業化。我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長期的債款或若干長期的借貸，因此這個問題之困難，對於我們便更加明顯了。全世界資本家本着這個出發點而拒絕把債款和借貸借給我們；他們以為我們是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基金積累問題的，以為我們一定會打消改造重工業的問題，以為我們一定要向他們叩頭求救，甘受他們的宰割。

這一年來在這方面得的總結底意義在甚麼地方呢？這一年來總結底意義，就在於他們把各資產階級先生們底計劃，打得粉碎了。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指明：不管帝國主義對我們蘇聯施行什麼公開的和祕密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却沒有向資產階級們投降而受其宰割，而且已經用自己的力量勝利地解決了基金積累的問題，築下了重工業的基礎。現在，就是工人階級底惡毒的敵人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了。實際上，如果去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共有十六萬萬多盧布，其中有十三萬萬盧布是投在重工業內面的，而今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則有三十四萬萬多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盧布是投在重工業內面的；如果去年的大工業生產品總量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底生產品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今年的大工業生產品總量則要增

加到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底生產品總數則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建設重工業的基金積累問題，對於我們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難；我們正在發展重工業的路綫上很快地前進，超過以前的速度，拋棄我們『向來的』落後性，關於這個事實，難道還可以懷疑嗎？

五年經濟計劃中的本年原定計劃已被超過了，而資產階級學者所認為是一種『不可達到的幻想』，我們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一派人）所聞之害怕的五年經濟計劃底最高標準，實際上，已變成五年經濟底最低標準了。這兩件事實，在我們看了上面所講的以後，難道還可以認為是奇怪的嗎？

列寧說：

『我們知道，要拯救俄國不僅是需要農民經濟的豐收（這還不够）；不僅是要供給農民用品的輕工業興旺（這也還是不够）；我們需要重工業…。如果不救濟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設任何的工業。沒有重工業，我們這個獨立國家就要滅亡…。重工業是需要國家的補助金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金，我們這個文明國家——我已不說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滅亡了。』（『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九五頁）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列寧是曾經多麼確切地指明了積累問題和黨在建設重工業方面的任務。

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指明：黨是能夠堅決地克服這條道路上的一切困難；並很有成效地解決這個偉大的任務。

這自然不是說，工業就不會再有嚴重的困難了。建設重工業的任務，不僅祇是倚靠在基金積累問題上，而且還要倚靠在幹部人材問題上。第一，要吸收成千成萬同情於蘇維埃的技師和專門家，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第二，要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培養出新的紅色技師和紅色專門家。如果基金積累問題在基本上可以說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人材問題，就還在等候解決。同時，在目前改造工業技術的環境之下，幹部人材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可以決定一切的問題。

列寧說：

『主要的（我們所缺乏的），是文化力量和管理的能力的問題。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滿能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問題僅僅是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之文化力量這一點。』（『列寧文存』，第八本，第六八頁）

很明顯的，這裏首先就是講到『文化力量』的問題，講到對於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對於工業建設和管理的幹部人材的問題。

但是，從這裏就可以看到，雖然在基金積累方面我們已得到了對於重工業有極大意義的成績，然而在幹部人材問題未解決以前，我們還不能把建設重工業的問題當作完

全解決了的問題。

因此，黨底任務就是嚴密地注意幹部人材問題和堅決地佔領這一個砲台。

黨在這一年來的第二個成績就是如此。

第三，就是在農村經濟建設方面。——最後，就說到黨在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和上述兩個成績密切聯結着的。這就是我們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小的落後的個人經濟轉變為大的先進的集體經濟，轉變為共同耕種，轉變為機器與拖拉機，轉變為建築在新技術基礎上的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轉變為巨大的為數百拖拉機和康拜因機所武裝起來的蘇維埃農場。黨在這裏的成績，就是在許多區域內，我們已經把農民的基本羣衆從舊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個道路祇對於少數的富裕資產階級有益，而使絕對多數的農民陷於貧困）轉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這個道路，能夠排擠富裕的資產階級，而將中農和貧農重新武裝起來，用各種新的武器、用拖拉機和其他的農村機器，將中農和貧農武裝起來，使他可以脫離貧困和富農的剝削，而走上廣大的協作的集體耕種的道路。黨底成績就是：不管許多極大的困難，不管一切和各種反動勢力（自富農牧師起到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止）的拚死反抗，我們終久能夠在農民本身當中進行一種根本的轉變和將廣大的貧農和中農羣衆拉到自己方面來。

這裏就是幾個簡單的數字。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脫，其五穀商品



量共六百多萬担（約三千六百五十萬普特）；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三百五十萬担（約二千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共一百八十萬六千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約有八百萬担（約有四千七百萬普特）；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共有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一千三百萬担（約七千八百萬普特）。至於在目前，一九三〇年，照我們所定的標準數字，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就應達到三百二十八萬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要達到一千八百萬担（約一萬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則要達到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千九百萬担（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就是在一九三〇年裏，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萬萬普特以上，就是說，要達到整個農村經濟五穀商品量底百分之五十以上（指在農村以外的五穀流通數量而言）。

這裏必須承認，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化了的大工業，一般說來發展的速度已經是很快了，但它也沒有過這種狂風般發展的速度。

我們的年青的大的社會主義農業（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將有很偉大的前途，將有驚奇的發展，這難道還不明顯麼？

集體農場建設方面這種空前的成績，有許多的原因。我們現在至少要將下列的幾個主要原因舉出來：

第一，得到了這種成績，是因為黨實行了一種列寧主

義的教育羣衆的政策，因為黨能夠按步就班的用貫輸合作化意識的方法，來引導農民羣衆走向集體的經濟。得到了這種成績，是因為黨對一切傾向進行了一種勝利的鬭爭：一方面和那種企圖超過運動與企圖破壞集體農場之發展的傾向（『左派的』詞句）作鬭爭，他方面，和那種企圖把黨拉往後去，甘作運動底尾巴的傾向（右派的傻子）作鬭爭。如果沒有這種政策，黨就不能把集體農場運動變為真正的農民本身的羣衆運動。

列寧說：

『當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衛戍隊的兵士奪得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十分了解：爲了農村中的建設，必然要遇着許多很大的困難；這裏更須緩步前進；這裏，如果企圖用法律指令來強迫實行共同耕種，那就未免是一種極大的錯誤；祇有很少一部份覺悟的份子才能這樣做（意即共同耕種。——校者註），而絕對多數的農民，是不會提出這種任務的。因此我們祇能作那種爲革命發展底利益所絕對必需的事，就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超過羣衆底發展，而要等候着，等候着運動根據這些羣衆本身的經驗和鬭爭而向前發展。』（『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五〇〇頁）

如果，黨在集體農場建設方面得到了極大的勝利，那末，這祇是因為黨正確地執行了列寧這個策略的指示。

第二，農業建設方面這個空前的成績，是因為蘇維埃

政權能够正確地估量到了農民對於新農具和新技術的日益增長的需要；是因爲他能够正確地估量到了農民在舊的耕種形式下的沒有出路；因爲他能够估量到了這些，所以他就按時給了他們以幫助：例如，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農業機器站，進行共同耕種，建立集體農場，以及用蘇維埃農場的力量來從各方面幫助農民經濟等等。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世界中出現了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已經在事實上證明出自己準備着和有能力對勞動農民羣衆施行有系統的和長期的生產上的幫助。十分需要農具的勞動農民，不能不接受這種幫助而走上集體農場運動的道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從今以後，工人底舊口號『面向鄉村』，要用集體農場內農民底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難道還有什麼奇怪嗎？

最後，集體農場運動方面得到了這種空前的成績，是因爲我們國家內的先進工人能把這種事業抓到自己手裏。我這裏是指那些幫助農村的工人宣傳隊而言。這些宣傳隊成千成百地散在我國各個重要的區域內奔走工作。必須承認，在集體農場運動所有的宣傳家中，工人宣傳家是農民羣衆中間的最優秀的宣傳家。工人們已使農民相信大的集體經濟是比小的個人經濟佔優勢些，而且那些現成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正是說明這種優勢的明顯例子。這些事實難道還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我們在集體農場建設方面的成績，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據我底意見，這成績是近年來一切成績中最

重要的、可以決定一切的成績。

以前，有人根據『科學』來反對建設五萬公畝和十萬公畝的大的五穀工廠，以為這是不可能而且不適宜的。現在，這些『科學』底反駁已經完全破產和煙消雲散了。實際已經把『科學』底反駁推翻了，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不僅實際是要求『科學』來指教指教，就是『科學』也是不妨向實際去學習學習的。固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還沒有建設巨大的五穀工廠，但是，我們的國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啊。這個『小小的』區別，是不能忘掉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如果不購買許多土地或不繳納絕對地租，就不能組織巨大的五穀工廠。他們要進行這種生產，就不能不花費一筆極大的支出，因為在那裏，土地私有權還是保存着。在我們這裏則完全相反，在我們這裏，既沒有絕對地租，又沒有土地底買賣制，因為我們這裏並沒有土地私有權：這種事實，就不能不為巨大的五穀工廠之發展造下一種順利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建設巨大的五穀農場的目的，是要得到最高限度的利潤，或是至少也要得到與所謂平均利潤率相等的利潤，因為一般說來，如果沒有這樣的利潤，資本家就不會去組織五穀工廠了。至於在我們蘇聯則完全相反，我們底大五穀經濟同時也就是國家的經濟，這種經濟的發展，並不需要最高限度的利潤或平均的利潤率，祇要有最低限度的利潤就夠了；有時甚至於不要任何的利潤。這個情形，也為大的五穀經濟之發展造下了順利的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之下，對

於大的五穀經濟既沒有特別的優待借款，又沒有特別的優待稅制；但蘇聯的制度是爲着要幫助社會主義經濟，在蘇聯的制度之下，這種優待現在是存在着的，而且將來還是要存在的。高貴的『科學』把這些事實都完全忘掉了。

右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一派人）底斷言，完全破產了。他們斷定：（一）農民是不會到集體農場內來的；（二）加緊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祇足以引起羣衆的不滿意，引起農民和工人階級聯盟的破裂；（三）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底『大道』，不是集體農場而是合作社；（四）發展集體農場和進攻農村中資本主義成份，就會把我們國家變成沒有糧食的國家。所有這些說法都已經破產了，都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老廢物一樣地粉碎了。

第一，農民已跑進集體農場來了，他們整村、整鎮、整區的跑進集體農場來了。

第二，廣大的集體農場運動，不僅沒有把工農的聯盟減弱，而且把它加強了，而且給了這個聯盟一種新的生產上的基礎。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基本的農民羣衆中還有甚麼很大的不滿意，那末，這種不滿意並不是因爲他們認爲蘇維埃政權底集體農場政策不好，而是因爲蘇維埃政權在供給農民以機器和拖拉機方面，還不能趕上集體農場發展底速度。

第三，關於鄉村社會主義發展『大道』的爭論，是一種學究式的爭論，是一種年青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如亞黑卜瓦爾德和史勒卜可夫一流人）所歡喜的爭論。很明

顯地，當廣大的集體農場運動還未造成的時候，那末所謂『大道』就自然是初步的合作形式，即供給的和銷售的合作社；可是當高度的合作形式即集體農場形式已經跑上舞台的時候，那末，集體農場就成了鄉村發展底『大道』了。實際上，如果不用括弧來說，那末，祇有列寧底整個合作化計劃，才算是鄉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大道；列寧這個合作化計劃，是把農村經濟底一切合作形式（自最低的、供給的、銷售的合作形式起至最高的、生產的集體農場合作形式止）都包括在內的。如果將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對立起來，就等於侮辱列寧主義和表顯自己的愚昧。

第四，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看到：如果我們沒有向鄉村資本主義成分進攻，如果我們沒有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那末我們目前在收買糧食的事業上，就不會得到今年所得到的這樣大的成績，就不能得到那已經積聚在國家手裏的幾千萬普特的穀類儲蓄。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因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跑出糧食的危機，或者說已經跑出了糧食的危機。如果我們底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是日益迅速地發展，那末再經過三年以後，我們底國家即使不變成全世界中最產糧食的國家，也要變成最產糧食的國家之一；這個前途，是誰也不能懷疑的。

在目前集體農場運動中，有些什麼新的東西呢？在目前集體農場運動中新的與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農民跑到集體農場來的時候，不是如以前一樣幾個人一羣、幾個人一

隊地加入集體農場；而是整村、整鎮、整區，甚至於整州，一下子共同加入集體農場。這表示甚麼呢？這就是表示，中農也跑到集體農場中來了。農村經濟發展中根本轉變底基礎，就在這裏。這個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這一年來最大的成績。

托洛茨基主義底孟塞維克『意見』，說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基本的農民羣衆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意見』，也完全破產了和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看到：中農是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對於任何人都明瞭了：工業和農村經濟底五年計劃，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誰不相信在蘇聯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誰就沒有權利來恭維我們底五年計劃。

各國資產階級最後的一個希望，也完全破產了和完全變成泡影了。他們希望在蘇聯會要恢復資本主義，恢復私有財產的神聖原則；這個最後的希望完全破產了。他們認為農民是培養資本主義的肥料。可是農民却大批地拋棄了這個『私有財產』的光榮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希望，完全破產了。

然而，正因此也就引起了我國內部資本主義成份之拚命反抗的企圖。他們想發動一切舊世界的勢力來反對正在進攻的社會主義，他們這種企圖使階級鬭爭加緊起來。資產階級是不願『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的。

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最近來資產階級底馴服走狗：斯

脫魯維、黑興、米留科夫、克倫斯基、但茵、阿布拉冒維支等，才拚命地向布爾塞維主義狂叫狂吠個不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資本主義恢復的最後一個希望也完全絕望了。

階級敵人底這種憤恨，資產階級走狗這樣狂叫，若不是證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困難戰綫上真正得到了勝利，那末還是證明甚麼呢？

列寧說：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祇有在實際上能夠向農民證明：社會的、集體的、協助的、合作的耕種方法，是比較其他耕種方法佔優勢的時候；祇有能夠用協作的、組合的農場來幫助農民的時候；祇有在這個時候他才能切實地向農民證明自己的真理，才能夠切實地、可靠地、真正地把極廣大的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關於吸收極廣大的農民羣衆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方法問題，關於使農民轉入集體農場建設道路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

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指明：黨的確是能夠有成效地完成這個任務，能夠堅決地克服橫在這條路上的一切困難。

列寧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祇有當我們能夠改善和提



高中農生活經濟條件的時候，中農才能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夠給他們十萬架頭等的拖拉機，就能夠供給這些拖拉機以揮發油，就能夠供給這些拖拉機以駕駛員（你們都十二分地知道，這個在目前還是一種幻想），那末中農就會說道：「我贊成共產呀。」（即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克服國際資產階級，就要強迫他們給與我們這樣多的拖拉機；或者就要把我們底生產力提高到相當的程度，提到可以自己製造這樣多的拖拉機的程度。祇有這樣地提出問題，才是正確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五三頁）

列寧關於使中農在技術上重新武裝的方法問題，關於吸收中農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

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黨的確是能夠執行這個任務。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在農村中就會有六萬架拖拉機；從一九三〇年春天以後再經過一年，就會有十萬架以上；再經過兩年以後，我們就會有二十五萬架以上的拖拉機了。在幾年以前還被認爲是幻想的希望，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把他加倍地變成事實了。

中農轉到『共產』方面來的原因，就在這裏。

黨底第三個成績就是如此。

這就是黨這一年來幾個主要的成績。

## 結 論

我們正在用全副的力量沿着工業化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着，把幾百年來的『俄羅斯式的』落後性丟到後邊去，我們底國家正在轉變為五金業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安放在汽車上面，把鄉裏人安放在拖拉機上面的時候，——那時再讓那些以『文明』自誇的尊貴的資本家們去拚命在後面追趕我們罷。那時我們再來看看：可以把那些國家『當作』落後的國家，可以把那些國家『當作』先進的國家。

# 論蘇聯的土地政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  
思主義者的農業學家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現時我們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主要事實，一個引起一切人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場運動底突飛進展。

現在集體農場運動底特點，就是加入集體農場的不像從前一樣，祇有個別的貧農集團，現在加入集體農場的還有大批的中農。這就是說，集體農場運動，由勞動農民個別的集團與個別的階層底運動一變而為千百萬農民基本羣衆底運動了。用這個也可以說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場運動帶着强有力的、日漸高漲的和反富農運動的性質，這個運動掃除在道路上的富農底反抗，擊破富農，而為鄉村中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開闢道路。

但是，如果我們有根據來誇揚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上的進步，那末論到一般經濟方面，尤其是農村經濟方面，我們理論上的工作的進步就不能這樣講了。而且應該承認，我們的理論上的思想沒有趕上實際的進步，實際的進

步與理論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些隔離。但是理論工作不但需要趕上實際，而且要超過它，武裝我們的實行家為社會主義底勝利而奮鬥。

關於理論的意義，你們都很知道，這裏不必多講。大家都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它會給實行家指示方針，指明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有把握，使他們相信我們事業底勝利。所有這些，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上都有——而且不能不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缺陷就在於我們恰恰在這方面、在經濟問題底理論的研究方面表現得不健全。如果不然，怎樣來解釋在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上關於經濟問題何以還流行着各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呢？這些理論與理論家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呢？馬克思與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論據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與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極好的防毒劑，何以會被人遺棄，而不在刊物上通俗化起來，為什麼不把它擺在第一位上去呢？不站在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基礎上來與資產階級的理論作不調和的鬭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的敵人，這一點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

新的實際情形產生了新的看法來分析過渡時代的經濟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的速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黨的政策問題等等，現在都與前不同了。如要不落在實際之後，現在就要馬上用新環境的觀點來把這一切問題加一番研究。不如此就不能征服那些淆亂實行家頭腦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不如此就不能剷除這些偏見很深

的理論。因為祇有在理論上與資產階級的偏見作鬭爭，才能鞏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地位。

讓我來說明幾個命名為理論的資產階級的偏見，說明他們對於我們建設上的幾個主要問題的解釋是毫無根據的。

##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在共產黨員內還流行着所謂我們國民經濟各種成分底『平衡』論。這種理論當然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的地方。然而還有許多右派營壘中的同志拿它來做宣傳。依這種理論講來，第一我們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這是一個箱子，此外我們又有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也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的成分——這是另一個箱子。這兩個箱子各有各的軌道，和平地向前行駛，彼此不相接觸。依幾何學講，平行綫是永不相逢的。然而這種高明理論底發明家却認為這兩條平行綫有一天總會交合起來；它們一相交合，社會主義就出現了。可是，這個理論忘記了在這些所謂『箱子』的後面站着各階級。這些『箱子』底運動是在這慘酷的階級鬭爭、拚死命的鬭爭、以『誰勝誰敗』為原則的鬭爭底條件之下進行着的。

很明白的，這理論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之點。這個理論客觀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個人農民經濟底地位，而拿『新的』理論去武裝富農份子，來做反集體農場的鬭爭而降低

集體農場底地位。然而，這種理論至今還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界，它還沒有受到我們的理論家方面的打擊，更不用說致命的打擊了。像這種怪現象底存在，除了我們理論思想的落後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緣故呢？

然而，祇要打開馬克思主義底寶庫，取出複生產的理論來與各種成份平衡的理論對照一下，就可以使後一個理論消滅得無影無蹤。實際上，馬克思的複生產理論告訴我們，沒有逐年的積累，現代社會是不能發展的，而沒有逐年推廣的複生產，積累就不可能。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大規模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依馬克思的擴大複生產的理論而發展的，因為它本身是逐年增長，有它自己的積累，它是大踏步地前進着。但是我們的國民經濟並不單是我們的大工業。反之，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還是小農經濟佔大部份。是否可以說我們的小農經濟也是依照擴大複生產的原則而發展的呢？不是的，我們不能這樣說。我們的小農經濟大多數不但不能每年實現擴大複生產，而且還不常有實現簡單複生產的可能。這種小農經濟既不能擴大複生產，又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上佔着大部份，我們有這種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否能夠加速地繼續推進我們社會化的工業？這是不行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否可以在一個多少比較長久的期間內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在最巨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基礎之上，及在最散漫的、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底基礎之上呢？這是不行的。如果這樣，連整個的國民經濟都要完全

斷送了。那末出路又在那裏呢？出路在於擴大農村經濟，使它能夠積累，能夠擴大復生產，並由此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但是怎樣把它擴大起來呢？要擴大它有兩條道路：有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村內扶植資本主義來擴大農村經濟。這條道路是會使農民貧窮，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發展起來。這條道路是我們所要排斥的，因為它與蘇維埃經濟是不相容的。另外又有一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業上扶植集體農場與蘇維埃的國立農場，這條道路能使小農經濟合併為大規模的集體農場，用技術與科學武裝起來，把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去排除出去。我們擁護第二條道路。道路祇可採取一條，不取第一條便取第二條，不是後退——走向資本主義，即是前進——走向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平衡』論就是找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正因為它打算走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烏托邦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所以，祇要把馬克思的復生產的理論拿來同各種成分『平衡』的理論對照一下，就可以使後一個理論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學家不幹這件事呢？誰要滑稽可笑的『平衡』論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主義的復生產的理論倒反而拋在腦後呢？

##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

現在再來講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二種成見，第二種資產

階級式的理論。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但是它却被右派營壘中的同志們所熱心提倡着。這個理論底發明家大概是這樣說法：我們曾經有過資本主義，工業曾經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而鄉村曾經跟在資本主義的城市後面自然地、自動地行走，依照資本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行改造。在資本主義之下既是這樣，在蘇維埃經濟之下又何嘗不可這樣呢？鄉村小農經濟又何嘗不可以用自動的辦法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依照社會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然改造呢？這個理論底發明家根據這一點，就斷定鄉村可以用自流的辦法而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行走。這裏就要發生問題：假使鄉村本來就可以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那末我們是否還值得為組織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而操心費力，我們是否值得來斷干折戈呢？

這個理論底客觀上的目的，又是把新的武器交給鄉村資本主義份子來反對集體農場。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底理論家居然沒有工夫來擊破這種謬論，讓它淆亂我們實行家底頭腦，你想奇怪不奇怪？

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經濟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限量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工業改造農村經濟的作用也就在這裏。但是，這個要素是否足以使小農的鄉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跟着城市跑呢？不，這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鄉村所以自然地跟着城市跑，是因為城市底資本



主義經濟與農民底小商品經濟在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固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在基本上它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類的，因為它是以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為基礎的。當列寧評論布哈林所著的『過渡時代底經濟』一書時，列寧曾說到『農民底商品資本主義傾向』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傾向』\*對立，列寧底這些話是萬分正確的。正因此，所以『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然而然地而且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列寧）是否可以說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本上是與城市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同類呢？如果你不脫離馬克思主義，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要不然，列寧就不會說：『我們還是生活在小農的國家內，在俄國的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鞏固的經濟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是反列寧主義的。因此，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其他一切都除外，還必需在鄉村中建立如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底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底基礎，這種基礎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城市底領導之下率領農民的基本羣衆前進。

問題非常明顯。社會主義建設內的『自流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城市應該率領小農的鄉村，在鄉村中建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把鄉村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形式。

\* 着重符號是列寧標上的。

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我們的農學理論家方面受到應有的打擊，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再講到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三個謬論，即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反對馬克思主義謂大經濟勝過小經濟的有名的意見，依它們看來，這個意見祇在工業上有效，却不能够應用到農村經濟上去。達微特、黑爾茨這班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宣傳這種理論，企圖『根據』下述的事實：小農能堅持，善忍耐，祇要保得尺寸之地，便什麼困苦都能忍受；因為如此，所以在農業方面小農經濟與大經濟鬭爭時，就表現出自己的穩固性來。我們不難知道，這樣的『穩固』比任何的不穩固都要壞些。不難知道，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祇有一個目的：頌揚並鞏固資本主義的制度。正因為它有這種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很容易的擊破了它。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我們的實際已貢獻我們新的論證來反對這種理論，而我們的理論家不知怎樣竟不肯或不能利用這種新的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這裏所講的實際，是指推翻土地私有權底實際；土地國有底實際；以及實行解放小農使他不再像奴隸一般束縛在自己的尺寸土地上，並由此而促進他走上集體化的軌道的這種實際。

在西歐各國，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是什麼東西把小農束縛在他的小商品經濟之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他有那塊尺寸土地，就是那個土地私有權。他多年積累一點錢，就是爲的要買一小塊土地，買了土地之後自然不願捨棄它，寧可忍受一切窮困，寧可過粗野的生活，也死守着這一小塊土地——他的個人經濟底基礎。是否可以說這種要素也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之下繼續發生作用呢？不，這樣說不行。因爲我們沒有土地私有權。正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權，所以我們這裏也不像西歐那樣，農民像奴隸一般的束縛在土地上。這種情況不能不促進小農經濟走上集體農場的軌道。在我們國家內，在土地國有的條件之下，鄉村中的大經濟、鄉村中的集體農場之所以能够如此容易表現它勝過小農經濟，其中的一個原因也就在這裏。蘇維埃的土地法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規定了土地國有，它的偉大的革命意義也就在這裏。但是由此我們就有新的論證來反駁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謂小農經濟在它與經濟鬭爭中的穩固性。爲什麼我們的理論家（農學家）在他們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理論時，不充分利用這種新的論據呢？

而且，我們實行土地國有所根據的理論前提，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他的著名的『剩餘價值論』和列寧的有名的土地問題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是理論思想底極豐富的寶庫。我所指的是一般的地租的理論，特別是絕對地租的理論。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些著作中的理論顯然都

被我們鄉村與城市中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所證實了。所不瞭解的，祇是采牙諾夫式的『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的理論何以會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地租與絕對地租的天才的著作反不能通俗化，反不提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而拋在腦後呢？

你們總應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有名的小冊子。你們當然還記得恩格斯怎樣謹慎地講到小農轉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軌道的問題，讓我從他那書上引出一段相當的話來吧：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盡可能地去改善他的生活，去幫助他進到合作經濟，如果他有這種決心的話。如果他還不能夠下這種決心，我們就給他以盡可能的較多的時間，讓他去坐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去思量一番。』（重號是斯大林標上的）

你們看，恩格斯對於個人的農民經濟走上集體軌道的問題何等謹慎。恩格斯這種表面上似乎是過分的謹慎到底怎樣來解釋呢？他的出發點何在呢？很明顯的，他的出發點就是土地私有權底存在，他就是根據農民佔有一小塊土地而不肯輕易放手的事實。西歐的農民就是這樣。凡有土地私有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底農民都是這樣。當然這裏需要格外謹慎。是否可以說我們蘇聯也有這種情況？不，不能這樣說。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以至於把農民束縛在個人經濟上，因為我們這裏是土地國有，所以容易使個人農民走上集體的軌道。我們最近的集體農場運動之所

以比較容易發展而且迅速發展，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恨的，就是我們的農學理論家，還未曾打算十分明顯地揭露我們的農民狀況與西歐農民狀況底分別。然而這種工作不但對於我們蘇維埃的工作人員，而且對於各國共產黨員都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否應從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那天起，就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或不在這種基礎上來建立社會主義，這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我在不久以前一篇論文中（『大轉變的一年』）發揮了一些論據，證明農業上大經濟比小經濟優越，當時所指的是大規模的蘇維埃農場。很明顯的，所有這些論據也完全適用於集體農場，因為集體農場也是大規模的經濟單位。我所指的不單是發達的有機器和拖拉機作基礎的集體農場，同時也指那些初級的、依賴農民器具的、即所謂『手工作坊式』的集體農場。我講的是現時在統盤集體化的區域內所建立的、祇依靠農民生產工具底簡單湊合的那些初級集體農場。例如在從前的頓河州，河帕拉區底集體農場。這種集體農場，就技術上看來（機器少、拖拉機少）似乎和小農經濟差不多。其實農民工具簡單湊合在集體農場內，便得到了我們底實行家所夢想不到的功效。功效在什麼地方呢？功效就在於一成立集體農場，就使耕種的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這種『驚破腦袋』的功效，是怎樣來的呢？這是因為農民在個人勞動的條件之下力量薄弱；一旦把工具合併起來，

統一於集體經濟內，便變成了極大的力量；因為農民能够耕種在個人勞動條件下難於耕種的荒地和生地；因為農民可以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裏來；因為一切荒地、小塊的土地、地畝的境界等等都有使用底可能了。

耕種荒地與生地的問題，對於我們的農村經濟有偉大的意義。你們知道，從前俄羅斯革命運動底樞紐，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土地運動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消滅土地缺少的現象。以前有許多人以為土地缺乏是絕對的，這就是說，再沒有更多的空地可以耕種的了。事實上究竟是怎樣呢？現在大家都知道，蘇聯底空地曾有幾千萬海克脫。但是農民要用自己的一點可憐的工具來耕種這麼多的土地，是沒有任何可能的。正因為他們沒有耕種荒地和生地的可能，所以大家都往『耕地』上鑽，都眼巴巴地望着以前屬於地主的土地，都要想那些在個人勞動之下用農民自己的農具便於耕種的土地。這就是『土地缺乏』底根源。所以，我們的『糧食托拉斯』現在可以開墾兩千萬海克脫的空地，這些土地是農民所不要的，是個人勞動之下用小農器具所不能耕種的。集體農場運動（在它的各階段上，無論在初期或盛期，即有了拖拉機的時候），它的意義都在乎農民現在得到了使用荒地和生地的可能。農民一進為集體勞動，耕種面積就大大地增加，其原因就在這裏。集體農場勝過個人農民經濟，他的一個基礎也就在這裏。在統盤集體化的農業區內，若有拖拉機站與拖拉機隊來幫助初期的集體農場，集體農場自己又可以採辦拖拉機和『康

拜因』機，那末集體農場比較個人經濟優越，更顯然無疑了。

#### 四 城市與鄉村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還發揮一種謬論，就是所謂『剪刀』說。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反對這種理論，同反對流行於蘇聯出版界的一切其他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一樣。我指的這種理論說：十月革命所給農民的要比二月革命少，老實說來，十月革命對於農民什麼好處也沒有。這種謬論，曾經有個時候被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在我們的出版物上大事鼓吹。固然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放棄了他的理論。（台下叫：到底是誰呢？）這就是格羅曼。但是，這個理論大受托洛茨基與季諾維埃夫的反對派底稱許，曾被他們利用來反對黨。就是現在也絕對不能斷定說它不流行於『蘇維埃的』輿論界。同志們，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它牽涉到城市與鄉村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它牽涉到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矛盾的問題。它牽連到極切實的、關於『剪刀』的問題。因此我以為這一個怪論也值得研究。

說農民沒有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一點好處，這話對不對呢？

請看事實吧。我這裏有著名統計學家聶姆卿諾夫底著名的統計表，該表曾經在我的『糧食問題』一文內發表

過。從這表上可以看到革命前地主『生產了』六萬萬普特糧食，富農『生產』十九萬萬普特糧食。這就是說那時的地主手裏握有六萬萬普特糧食，那時富農有極大的勢力。貧農與中農生產了二十五萬萬普特糧食。從前的鄉村，十月革命以前的鄉村就是這樣情形。十月革命以後鄉村中起了什麼變化呢？還是拿這統計表上的數目字來看。就看一九二七年吧，這年地主生產了多少呢？很明顯的他們什麼也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因為地主都被十月革命消滅了。你們知道這對於農民就輕易了許多，因為農民脫離了地主的火坑。這自然是農民從十月革命所得到的很大的利益。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已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了。可見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勢力縮小了三倍多。你們知道，這不能不使貧農和中農底狀況輕鬆起來。一九二七年貧農和中農生產了多少糧食呢？已經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了。可見十月革命以後貧農和中農生產的糧食比革命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這些事實就證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了極大的利益。

這就是十月革命給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事實如此，如何還可以瞎說十月革命沒有給農民一點好處呢？

這還不算。十月革命推翻了土地私有權，廢除了土地買賣制，規定了土地國有。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農民要生產糧食並不必要去買土地。從前他們多年積累幾個



本錢，爲的是要買一塊土地。負重債，當奴役，祇爲的是得到一塊土地。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要算在糧食的生產價值上去。現在農民已不需要這樣了。現在他不買土地，可以生產糧食。這是什麼呢？這是不是減輕農民底負擔呢？很明顯的，是減輕。

其次。在最近以前，農民還用舊式農具，用個人勞動的方法去種田。大家都知道，個人勞動使用腐舊的、現在已經不中用了的生產工具，決不能賺得必需的資料來過寬裕生活，經常的提高物質狀況，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跑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廣闊大道。現在呢，自從加緊發展集體農場運動以後，農民就可以把自己的勞動和鄰人的勞動聯合在集體農場之內，開闢生地，利用荒地，得到機器和拖拉機，因此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兩三倍。這表示什麼呢？這是說農民現在，因加入集體農場之故，可以費同等的勞力而得更多的生產。這是說，糧食的生產比以前便宜得多了。這是說，如價格不變，則農民出賣糧食得到的比以前多得多了。

看了這些事實以後，何以能斷定十月革命沒有給農民以利益呢？

說這種怪話的人顯然是誣蔑黨與蘇維埃政權，難道還不明顯嗎？

但是由上述種種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由此可以說，關於『剪刀』與消滅『剪刀』的問題，現在應該有新的說法。又可以說，假使集體農場運動依目

前的速度發展下去，則『剪刀』很快地就要消滅。由上述種種又可以說，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係問題立在新的基礎上，城市與鄉村的矛盾現象可以加速地消滅。

同志們，這一點對於我們的全盤建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它改造了農民的心理使他們面向城市，它創造了消滅城鄉間矛盾的基礎，它造成了一種基礎使黨底『面向農村』的口號可以補上一個集體農民『面向城市』的口號了。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農民現在從城市中得到機器、拖拉機、農學家和組織家，又得到了反對富農及克服富農底直接幫助。懷疑城市像懷疑強盜一樣的舊式農民現在往後退了。代他而興起的有新的農民，有集體農場的農民，他對城市懷着熱望，希望從城裏得到真正的生產的幫助。舊式的農民害怕降為貧農，想偷偷的升到富農的地位（可以喪失選舉權！），現在起來代替他們的是新的農民，新農民有他們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場，逃出窮困而走上經濟發達的大道。

事情是這樣轉變了，同志們！

更可痛的，是我們的農學理論家不採用一切方法來徹底剷除企圖抹煞十月革命勝利和不斷發展着的集體農場運動的那些資產階級的理論。

## 五 論集體農場底性質

集體農場是一種經濟底形式，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

一種，這是毫無疑義的。

有位同志在這裏發言，抹煞了集體農場底意義。他斷定集體農場是經濟的組織，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同志們，我應當申明，這樣評論集體農場是完全不正確的。毫無疑義的，這種批評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同。

經濟形式是什麼來決定的呢？當然是由生產過程中人底關係來決定的。難道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決定經濟的形式嗎？但是要問：在集體農場內難道有生產工具私有主這個階級和喪失了這些生產工具的階級嗎？集體農場內難道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嗎？難道集體農場不就是在國家的土地把主要的生產工具社會化嗎？有什麼根據來肯定集體農場這種經濟形式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

當然，集體農場內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場內是有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殘餘，這些殘餘還沒有消滅，但是一到了集體農場的鞏固和機器化的程度加强的時候，這些殘餘是一定要消滅的。可是整個集體農場，把它的矛盾與缺點都算在一起，把它當作一種經濟看，它在基本上是代表農村發展底新路綫，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新路綫，去對抗富農，去反抗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綫的，這難道也可以否認嗎？集體農場（當然不是指假的集體農場而言）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是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底樞紐與基礎。是在與資本主義份子作死戰中生長起來的，這難道可以否認嗎？

有些企圖抹煞集體農場，宣佈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這種企圖毫無一點根據，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一九二三年我們還沒有大規模的集體農場運動。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內，講到合作的一切種類及其最低級形式（販賣合作社）和高級形式（集體農場的形式）。他關於合作、關於合作的企業怎樣講呢？他那本小冊子上有這樣一段話：

『在我們的現行制度之下，合作的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有分別，因為它是集體的企業，但是如果它是建立在國有的土地上，同時又有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工具，那末它就和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分別。』（重號是斯大林標的）

可見列寧並不把合作企業單獨拿來看，而是把它們與我們的現行制度聯繫起來，看它們是在國有的土地上、在生產工具國有的國家內而發生作用的，列寧既是這樣觀察它們，於是肯定說，合作企業與社會主義的企業沒有分別。

這是列寧論到一般的合作企業的說法，關於我們現在的集體農場，更有根據來說這樣的話，這還不明顯嗎？

因此，列寧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社底簡單發展』是與『社會主義底發展一樣』。

你們知道，這一位發言的同志抹煞集體農場底意義，是犯了反列寧主義的極大的錯誤。

由這個錯誤又發生其他的一個錯誤——即關於集體農

場內的階級鬭爭問題上的錯誤。這位發言的人描寫了集體農場的階級鬭爭，用了十分濃厚的色彩，以致令人設想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鬭爭與集體農場外的階級鬭爭沒有分別。而且可以令人設想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鬭爭更要劇烈些。同時在這方面犯錯誤的不單是這一位發言的人。漫談階級鬭爭，空喊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鬭爭是現在我們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徵。最好笑的是這些空喊家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階級鬭爭的地方偏偏『看見』階級鬭爭，但在階級鬭爭存在而且揚溢於外的地方倒反視而不見。集體農場內沒有階級鬭爭的成份嗎？有的。要是集體農場內還保有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心理底殘餘，要是那裏還有些不平等，那末，階級鬭爭底成份是不會沒有的。是否可以說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鬭爭與它以外的鬭爭是相同的呢？不，不同。我們的『左的』空談家不看見這種差別，其錯誤就在這裏。在組織集體農場以前，集體農場以外的階級鬭爭是什麼呢？這就是反對握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並藉此來奴役貧農的富農的那種階級鬭爭。這種鬭爭是拚死命的鬭爭。但在集體農場底基礎上的階級鬭爭又是什麼呢？第一，這是富農被擊破了並且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和工具；第二，這是貧農和中農在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社會化的基礎上聯合到集體農場裏面去了。最後，這是集體農場內部各份子間的鬭爭，其中有些份子還沒有脫去個人主義的和富農心理的遺跡，希圖利用農場內一些不平等來謀個人利益，另一些人想把這些遺跡和不平等提出農場之外。祇要不是瞎

子，誰都會看見集體農場內部和外部的階級鬭爭底區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場便算社會主義建設上必須的東西都有了，這是錯誤的。若以為加入集體農場的都已變成了社會主義者，那尤其不對。實際上還需要許多功夫來做改造集體農場的農民，糾正他們個人主義的心理，把他們造成社會主義社會底真正的勞動者。集體農場機器化底過程越快，則這步功夫也做得越快。但是這絲毫不減少集體農場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底槓桿之偉大的意義。集體農場偉大的意義，就在於他們是農業上使用機器和拖拉機的基礎，他們是改造農民，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精神而改造農民心理的基礎。

列寧說得好：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全盤心理與習慣，這是需要幾代功夫的事業。祇有物質基礎和技術，祇有農業上大規模的應用機器和拖拉機和大規模的電氣化，能夠解決這個對待小農的問題，能夠健全他的整個心理。』

集體農場正是這種社會主義經濟的形式，祇有經過這種經濟形式才可以使千百萬小農接近機器和拖拉機，接近這些提高經濟的槓桿，接近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底槓桿，這一點誰能否認呢？

我們的『左的』空談家把這一點忘記了。

我們的這位發言的同志也忘記了這一點。

##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的政策上的轉變

最後講到階級的變動與社會主義對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問題。

最近一年來我們工作底特點，就是我們的黨和我們的蘇維埃政權：第一，在各方面擴大了對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第二，大家都知道，這一個進攻已經有了而且繼續的生出來很顯著的好的結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從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進而消滅富農這個階級了；這就是說我們在全部政策上造成了而且繼續還在造成一個舉足輕重的轉變。

以前黨一向是主張限制富農底剝削。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當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在第十一次黨的大會上又重新宣佈過這個政策。大家都記得列寧給普列布拉仁斯基底著名的信（一九二二年），在這封信中，他又講到必需實行這一個政策。最後該政策又由第十五次大會批准了。我們一直執行到最近。

這個政策對不對呢？自然對，它無條件是對的。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可以像現在這樣進攻富農？我們當時是否可以指望到這種進攻的勝利？不，不可能的。要是這樣，那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政策，就是極危險的以進攻為兒戲。因為我們一定要遭失敗，一遭失敗便會鞏固富農底地位。為什麼？因為那時我們在鄉村中還沒有像集體農場和蘇維

埃農場那樣的支柱，作為大舉進攻富農的根據地。因為我們那時還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來代替富農資本主義的生產。

一九二六到二七年，季諾維埃夫與托洛茨基的反對派極力要把馬上進攻富農的政策強迫黨接受。黨不採用這種危險的冒險政策，因為它知道穩重的人決不肯拿進攻來作兒戲。進攻富農是件嚴重的事情。不可把他與反富農的宣言混淆了。也不可把他與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的反對派要強迫黨提出的向富農搔癢的政策混淆了。進攻富農就是打破並消滅富農階級。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那末所謂進攻就是一個宣言，就是搔癢，就是空口吆喝，却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向富農進攻就是準備動手，打擊富農，打擊他使他再也站不住腳。我們布爾塞維克就把這個叫做真正的進攻。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希望得到勝利呢？這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六萬萬多普特糧食，其中拿出來在農村以外去交易的有一萬三千萬普特。這是很大的力量，這是不可忽視的。當時我們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產生了多少呢？一共八千萬普特，其中送到市場上去的(商品糧食)約三千五百萬普特。你們試想一想，我們當時能否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與商品糧食來代替富農的生產與商品糧食呢？當然是不可能的。在那種條件之下向富農堅決的進攻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一定是失敗和加強富農的地位，而且要落得沒有糧食吃。因此我



們當時不能而且不應實行進攻富農，我們反對托洛茨基與季諾維埃夫反對派的冒險宣言。

現在呢？現在事情怎樣呢？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擊破他的反抗，消滅他的階級，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他的生產了。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糧食生產，總共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生產少二萬萬普特）。大家又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共一萬萬三千萬普特有餘（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還多些）。最後大家還知道，一九三〇年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糧食底總生產將不下九萬萬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生產的要多），商品糧食將在二萬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所生產的要多得多）。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形。這就是我們國家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你們已經看見，我們現在有了物質基礎，可以用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因此我們向富農進攻才有顯著的成效。所以講到進攻富農，要實際的進攻而不要限於一紙反富農的空文。

因此，我們最近才由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進而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了。

各方面都來問怎樣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呢？我們在整個集體化的區域內是否可以消滅富農呢？問題太可笑了。當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時，當我們不能堅決進

攻富農時，當我們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生產時，消滅富農是不可以的。在那時不容許消滅富農底政策是必需的，是正確的。現在呢？現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我們有可能向富農作堅決的進攻，打破他的抵抗，消滅他的階級，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了。現在消滅富農是由實現統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羣衆自己來進行的。現在在統盤集體化的區域內消滅富農已不是簡單行政的手段了。現在消滅富農在那些區域內是集體農場建設和發展底組成部份。所以現時多談消滅富農，未免滑稽可笑而且不莊重。已經割去了腦袋，便用不着去哭頭髮了。

另有一個同樣可笑的問題：可否讓富農加入集體農場？當然不能讓他加入，因為他是集體農場運動底討厭的敵人。問題大概是明白了。

## 七 結 論

同志們！這是六個樞紐問題，忽略了這六個問題，我們馬克思主義的農學家底工作是不能進行的。

這些問題底意義，首先就是把這些問題加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便可以澈底剷除一切及各種資產階級的理論，這些理論有時——真是丟臉——還被我們共產黨員同志所散佈，淆亂我們實行家底頭腦。老早就應該剷除並拋棄他們，因為祇有和這些理論作無情的鬭爭，才可以發展並鞏

固馬克思主義的農學家的理論思想。

這些問題底意義，還在乎他們能給過渡時代經濟底舊問題換上新面目。

現在，新經濟政策的問題、階級的問題、集體農場的問題、過渡時代經濟的問題等等都與前不同了。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了解爲退守，而且僅僅瞭解爲退守，這種錯誤一定要揭露出來。實際上列寧還在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說了，新經濟政策並不盡在退守，他說，它同時也是準備向城市和鄉村中資本主義分子作堅決的進攻的政策。還有些人以爲新經濟政策祇是爲聯絡城市與鄉村而需要的，這種錯誤也是要指出來的。我們所要的不是任何的城與鄉村間的聯繫，而是那種足以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聯繫。我們之所以主張新經濟政策，是因爲它是爲社會主義出力的；當它不能盡力於社會主義事業時，我們把它拋棄。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底實行是認真的而且是長久的，但它從來沒有說過要永遠施行新經濟政策。

我還得要提一提馬克思的複生產理論底通俗化問題。應當研究我們國民經濟底均衡表的問題。一九二六年國家統計局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均衡表，這不是均衡表而是玩弄數字。巴薩羅夫、格羅曼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的意見也不合於事實。蘇聯國民經濟底均衡表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製定，要是他們想研究過渡時代經濟問題的話。

要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能派出一批專門人材，來研究新環境中的過渡時代的經濟，那就很好了。

# 論消滅富農階級底政策

關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紅星報』上的文章

『紅星報』第十六號所載的『消滅富農階級』一文，一般說來，毫無條件是正確的。可是在措辭方面，有兩個不確之點。我以為這兩個不確之點是應當改正的。

第一，在這篇文章中說：

『在恢復的時期中，我們執行了限制鄉村和城市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從改造時期起，我們就開始由限制政策轉入排擠的政策了。』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一個政策。排擠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是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和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必然的結果與組成部份。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這還不是排擠富農階級。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這是排擠和克服富農中那些不能擔負稅務的壓制，無力支持蘇維埃政權的限制方法的個別隊伍。很明顯的，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限制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不能不做到排擠富農中的個別隊

伍。因此，排擠富農個別隊伍，不能不認為是限制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之必然結果與組成部份。

在我們國內，不祇是在恢復時期內執行了這個政策，在改造時期中也是執行的。就是在第十五次大會以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吾黨第十六次臨時代表大會時（一九二九年四月）及在這個代表會議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天，都執行了這樣的政策；當時在我們國內開始了通盤的集體化的時期，在消滅富農階級方面已經開始了轉變。

假使我們看一看黨的重要文件，那怕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大會起（參看根據中央委員會底報告而作的決議）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臨時代表會議止（參看『論發展鄉村經濟的道路』的決議），就一定會看見，關於『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或者『限制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的增漲』的提綱，永遠是與『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克服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的提綱平行並列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說黨沒有把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與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的政策、限制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分開。

黨的第十五次大會與第十六次臨時代表會議的基礎，全完建築在下列的政策上面。即是：『限制農村資產階級的剝削趨勢』，（第十五次大會『關於鄉村工作』的決

議) 『採用限制鄉村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方法』，(同上) 『堅決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第十五次大會關於五年經濟計劃的決議) 『進攻富農』，即是說 『進一步的、更有系統的和更堅決的限制富農與私商』，(同上) 『更堅決的在經濟上排擠』城市和鄉村中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份子』。(第十五次大會對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因此，第一，該文的作者，把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看作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不正確的。事實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整個的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排擠富農中的個別隊伍正是他的組成部份與結果。

所以，第二，該文的作者認為，在鄉村中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祇是在改造時期，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才開始，這也是不對的。實際上這種排擠是在第十五次大會以前恢復時期中，及在第十五次大會以後改造時期中，都有過的。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祇是用補充的新方法加緊了限制富農剝削的傾向的政策，並因此就要加緊排擠富農的個別隊伍了。

第二，在這篇文章中說：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完全是由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中產生出來的，它是這個政策在新的階段上的繼續。』

這種說法不確切，因此也就不正確。自然，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是由過去一切限制和排

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時期準備成功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它在根本上與限制（與排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沒有分別，似乎它是限制政策的繼續。照我們的作者這樣說，這就是否認由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鄉村發展中有了轉變。照這樣說，這就是否認在這個時期中吾黨在鄉村政策方面作了轉變的事實。照這樣說，就是為我們黨內的右傾份子造成一些思想上的護身符，這些右傾份子，現在拚命的咬着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來反對黨的新政策，正如伏龍肯當時拚命抓着第十四次大會的決議反對培植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一樣。

第十五次大會主張加緊限制（與排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其出發點如何呢？其出發點就是認為，雖然要限制富農，但是富農階級總還要暫時留在鄉村中。在這個基礎之上，第十五次大會便保留了出租土地的法令，同時，很明顯的知道，大半的富農是承租者。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第十五次大會便保留了鄉村中僱傭勞動的法令，同時要求正確的執行這個法令。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次的宣佈了消滅富農是不容許的。這些法令和決議與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是否矛盾呢？毫無疑義，是不相矛盾的。這些法令和決議與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否矛盾呢？毫無疑義是矛盾的！因此，現在在通盤集體化的區域內，應該放棄這些法令與決議。通盤集體化區域的影響的發展不是與日俱進，而是與時俱進的。同時，在通盤集體化的區域內，集體農莊運動發展的進程早已把

這些法令與決議推在一邊去了。

在這種解釋以後，是否還能認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之繼續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够的。

該文的作者忘記了，當富農階級的手中還握着生產工具與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時，當我們實際還保存着鄉村中僱傭勞動的法令、出租的法令及禁止消滅富農的時候，用稅務及其他一切限制的方法是不能排擠富農階級的。作者忘記了，在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的政策之下，祇能够排擠富農的個別隊伍，這與暫時保留富農階級並不矛盾，而是預先決定這個問題的。要排擠富農階級，那末限制和排擠其個別隊伍的政策是不够的。要排擠富農階級，就應該在公開的鬭爭中打破這個階級的反抗，剝奪其生存與發展的生產來源（自由的使用土地、生產工具、租佃、僱傭勞動權等）。這就是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之轉變。沒有這種轉變，排擠富農階級就是無味的空談，這祇對於右傾份子有利。沒有這種轉變，在鄉村中任何大的、通盤的集體化都是無稽之談。我們鄉村中進攻富農及實現通盤集體化的貧農與中農，對於這一點瞭解的非常清楚。很明顯的，我們有些同志現在還不瞭解這一點。

因此，目前黨在鄉村中的政策，並不是舊的政策之繼續，而是由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舊政策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之轉變。



# 勝利衝昏頭腦

##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講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就是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我們所得到的嚴重的勝利。實在的，這些勝利是很偉大的。到今年二月二十日止，全蘇聯農民經濟已經集體化了百分之五十，這是事實。這就是說到今年二月二十日止，我們已經超過了五年經濟計劃所規定的一倍以上。

到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止，集體農莊在春耕時，已經散播了三千六百萬担的種子，這大約估計計劃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等於二萬二千萬普特的種子。在順利的完成了收買食糧的計劃以後，祇是在集體農莊方面，就能夠收集二萬二千萬普特的麥種，不能不承認這是個很大的成績。

這些事實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告訴我們說：使鄉村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根本轉變，已經可以認為是有保障的了。

這些進步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對於領導我們國家的整個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本身都有很重大的意義，這是用

不着證明的。暫且不講直接的實際結果，祇就他們（這些勝利）對於黨的內部生活、對於我們黨的教育方面來說，也有很大的意義。這些勝利鼓舞起了我們黨的勇氣和對於自己力量的信任。他們用對我們事業勝利的信仰心武裝了工人階級。他們爲我們黨引來了幾百萬新的後備軍。

由此，黨的任務就是：鞏固已經得到的勝利，並且有計劃的利用這些勝利，使它更向前發展。

可是，這些勝利也有它的不好的方面，特別是當這些勝利來的比較『容易』或者是『出乎意料』的時候。有的時候這些勝利使我們容易發生自大和驕傲，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這些勝利有時醞醉了人們，而人們就因此弄得頭昏顛倒，失去了度量的感覺，失去了了解實際情形的能力，發生了過分的看重自己的力量和看輕敵人力量的趨向，表現出冒險主義的企圖，以爲『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問題。這樣的一來，對於鞏固已經獲得的勝利和有計劃的利用這些勝利使它更向前發展，這種顧慮，自然也就沒有了。爲什麼我們要來鞏固已經得到的勝利？我們『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

由此，黨的任務就是：向這些對於事業有害的和危險的情緒進行堅決的鬭爭，從黨內把他們驅逐出去。

當然不能說，這種有害和危險的情緒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已經散佈的很廣了。然而，這些情緒在我們黨內是存在

的。同時沒有根據來肯定說，這些情緒不會繼續發展下去。如果這些情緒在我們隊伍中被認為是正當的，那末毫無疑義的，集體農莊的事業就會大大的減弱，集體農莊破壞的危險，也將變成實際。

因此，我們的刊物的任務就是：有系統的揭露這種情緒和其他一切類似的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件事實：

一，我們集體農莊政策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正是因為這種政策是依靠着集體農莊運動的自願性和對蘇聯境內各區域特殊條件的估計。不能用強力來組織集體農莊。如果這樣那就是愚蠢和反動的。集體農莊運動應該依靠基本的農民羣衆積極的幫助。不應該把集體農莊建設發達的區域內的模樣機械式的搬到不發達的區域內去。如果這樣便是愚蠢和反動行爲了。這種『政策』，一下子就會使集體農莊的思想煙消雲散。在決定集體農莊建設的速度與方法的時候，必須小心的研究蘇聯各區域中特殊的條件。出產五穀的區域，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比一切區域都先進。爲甚麼？第一，因為在這些區域內，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穩固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正因為這個緣故，農民才能够相信新技術的意義與力量，相信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意義與力量。第二，因為這些區域，在收買食糧的運動中，有了兩年來與富農鬭爭的經驗，這自然不能不使集體農莊運動事業的進行更加容易些。最後，因為在這些區域中，最近兩年來，我們從工業中心裏加派了大批優秀的幹部人材

去工作。能不能說在其他的區域內，譬如：在我們北部的消費區域，或者是落後的民族區域例如土耳其斯坦，也有這些順利的條件呢？不能，這是不能說的。很明顯的，對於蘇聯各區域的特殊條件加以估計的這個原則，和自願性的原則同樣是健全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

但是，事實上有時是怎樣的呢？可不可以說自願性和考察各地的特殊情形的原則，未在許多區域內一被破壞過呢？不，可惜不能這樣說。舉例來說罷，大家都知道，北方消費地帶的許多區域裏，立刻組織集體農莊所必需的順利條件，比較在五穀區域內要少些。但在這些區域內，往往不去進行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而却代以官僚式的辦法來命令集體農莊運動，作些關於集體農莊發展的空決議，組織紙面上的集體農莊，事實上這些集體農莊並沒有存在，可是，關於它的『存在』却有一大堆吹牛的決議。或者我們再拿土耳其斯坦幾個區域來講，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比較北方消費區域更要少些。大家都知道，在土耳其斯坦幾個區域內曾經有過這種企圖，就是想用軍事力量恐嚇的辦法，剝奪那些不願意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的灌田水和工業品，企圖這樣的『趕上和趕過』蘇聯先進的區域。這種軍閥式的壓迫『政策』，與黨根據自願性考察各地特殊情形而進行的政策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自然，在他們中間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誰需要這種曲解黨的路綫、官僚式的命令集體農莊運動、用恐嚇

的方法來對付農民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而外，甚麼人都不需要！這些曲解可以得着什麼結果呢？這祇有使我們的敵人強大起來，並且會使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消滅下去。這些曲解路線的人們，自稱為『左派』，而事實上是幫助右傾機會主義，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二，本黨政治戰略的一個極大好處，就是在每個時期黨都會去選擇運動中的主要點，抓着這一點，然後再推動全部運動向一個總的目標進行，以便解決問題。能不能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的系統上已經選定了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呢？可以這樣說，而且應該這樣說。這個主要點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土地公耕社呢？不是的，不在這裏。在土地公耕社裏生產工具並不社會化，它已經是集體農莊運動過去的階段了。這個主要點是農業公社嗎？也不是的，也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目前還是集體農莊運動中單個的現象。如果農業公社成了普遍的形式，那末，不僅是全部生產已經社會化，而且分配也社會化了，這種條件還沒有成熟。集體農莊運動目前的主要點，它的普遍的形式，而且是我們現在應該培植的，就是農業勞動組合。在農業勞動組合裏面，主要的生產方法已經社會化了，這主要的是與五穀經濟有關的。例如：勞動、土地使用、機器及其他的農具、牲畜、經濟建築物等等。在這裏面沒有社會化的還有：園藝地（如小菜園、菓園等）、住房、一部份的奶牛、小牲畜、家禽等。勞動組合所以是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因為它是解決五穀問題最適宜的形式。而五穀問

題又是全部農村經濟系統中的主要點，因為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那末，無論是畜牧事業（小的或大的）或供給工業原料的特別農產物與原料植物的問題，都是不能解決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在目前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點。今天所公佈的集體農莊的『模範章程』，就是由此出發的。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也應該由此出發，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認真的研究這個章程，澈底的實行這個章程。

現在黨的意見就是這樣。

能不能說，黨的這個意見，在實行的時候沒有什麼破壞和曲解呢？可惜，我們不能這樣說。大家都知道，在蘇聯許多區域內，為實現集體農莊而作的鬭爭還說不上已經完結，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在那裏有一種企圖，要想超過勞動組合一下子就跳到農業公社去。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是他們就動手把住房、小牲畜、家禽等『社會化』了，而這種『社會化』祇變成了紙頭上的官僚式的命令，因為還沒有必要的條件可以實行這種社會化。有人以為在集體農莊中五穀問題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已經是過去的階段，目前最主要的任務，不是解決五穀問題，而是牧畜與養家禽的問題了。現在要問，什麼人需要這種頭昏顛倒的『工作』，把集體農莊運動的各種形式都混在一起呢？什麼人需要這樣糊塗的對事業有害的向前瞎跑呢？當五穀問題還未解決、集體農莊的農業組合的形式還未鞏固的時候，把住的房子、取奶的牛、一切的牲畜家禽等都

社會化起來，用這樣的方法來挑撥集體農民，這種『政策』，祇是對於我們可恨的敵人才適當才有利，難道這還不明白嗎？有一個急於要社會化的人，甚至於到了這樣的地步，他甚至在勞動組合裏下了一個命令，『限三天以內，把每個農家的家禽按頭計算出來』，指出一些專門的『司令』來管理計算和監督，『在勞動組合中掌握最高的領導』，『領導社會主義的鬭爭、不要放棄戰地』，——很明顯的，這樣就把整個的勞動組合緊握在一個拳頭裏了。這是什麼，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呢，還是破壞它和使它失掉信仰的政策呢？至於那些組織勞動組合的事業從摘取教堂的鐘做起的『革命家』，就不用我再來說了。摘教堂的鐘，你們想一想，這是怎樣的革…革…革命呵！

怎樣能够在我們的隊伍裏發生這樣一些昏頭昏腦的『社會化』的行動，和怎樣發生這種可笑的、想跳過自己和想避免階級和階級鬭爭而在實際上是幫助我們的階級敵人的企圖呢？祇有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輕易』和『出乎意料』的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够發生這類行動。它們的發生，是我們黨內一部份昏頭昏腦的情緒的結果：『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它們的發生，僅僅是因為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並且他們一時失掉了理智的明確性和穩健的觀點。

爲要使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路綫更正確，就必須要澈底的消滅這些情緒。

這就是黨現在的主要任務之一。

領導的藝術是很嚴重的事情。不可以落在運動後面，因為落後就是脫離羣衆。但是，也不可以跑得太向前了，因為太跑向前了，就是與羣衆失了關係。誰想領導運動，同時想與廣大羣衆保持關係，那末就應當在兩條戰綫上鬭爭——既要反對落後，又要反對跑得太遠。

我們黨之所以有力量，誰也不會戰勝我們的黨，正因為它在領導運動的時候能夠保持和擴張與千百萬的工農羣衆的聯繫。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 給集體農場工作的 同志們的答覆

從報紙上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所寫的名為『勝利衝昏了頭腦』的文章和中央委員會關於『反對集體農場運動中曲解黨的路綫』的有名的決議，在集體農場工作人員中間引起來了許許多多的回聲。因為這個緣故，最近我就收到了許多集體農場工作同志的信，要我回答他們信裏所提出的問題。我的義務，是用個人通信的方法來答覆他們的信。但這是辦不到的，因為大半的來信都未寫明寄信人的通信處（忘記寫通信處了）。同時，信裏所問到的問題，對於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的。而且，很明顯的，我也不能不答覆那些忘記寫通信處的同志們。因此我不得不公開的、即在報紙上選出一切實際上必要的問題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一個答覆。尤其是因為中央對於這點已經有了直接的決議，所以我更願意做這個答覆了。

**第一個問題：**農民問題上錯誤的根源在那裏？

**答覆：**在於不正確的對付了中農。在於在經濟方面用

壓制的方法對付了中農。在於忘記了在經濟上聯合中農羣衆，是不應該靠着壓制方法的，是應該靠着和中農協商，是應該靠着聯合中農的。在於忘記了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基礎，是工人階級和貧農聯合中農，反對資本主義，尤其是反對富農。

在中農聯合戰綫進攻富農的時候，一切事都很順利。但及至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醺醉了，不自覺的開始離開進攻富農的道路爬上了反對中農的道路，及至他們因為追趕集體化最高的百分數，開始向中農使用壓制的辦法，剝奪他們的選舉權、破壞他們、奪去他們的財產的時候，進攻的方向就彎過來了，和中農的聯合戰綫開始破壞，很明顯的，富農又能夠企圖重新站住他的腳跟了。

他們忘記了，在反對我們階級敵人的鬭爭中，壓制的方法是必要的，並且是有利的；但在對付我們的同盟者中農的時候，壓制的方法是不許用的，是有害的。

他們忘記了，像馬隊那樣的奔跳，在解決軍事問題的時候是必須的，並且是有利的；可是在解決集體農場建設問題的時候，在聯合中農建設集體農場的時候，這種辦法就不中用了，就是有害的了。

問題上錯誤的根源就在這裏。

你們看到列寧關於和中農發生經濟關係的問題是怎樣講的：

『我們應該隨時記着這樣一個真理，就是：在這裏用強迫的方法，實在是什麼都得不到的。這裏的經

濟任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此地並沒有像城市的資本家一樣，那種上層份子，把他們宰割以後，可以留下來全部的基礎，全部的建築。這種上層份子在鄉村裏面是沒有的。此地若強迫從事，就等於要毀滅全部事業…想在對中農的經濟關係方面實行強迫，這是再蠢不過的了。』（『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五〇頁）

『用強迫的方法對付中農，是最有害的。中農是許許多多的幾百萬羣衆的階層。甚至於在歐洲，在那裏沒有一個地方中農達到這樣大的力量，在那裏技術和文化非常的發達，城市生活、鐵路等非常的發達。在那裏最容易發生這種思想，——可是，從來沒有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曾提過用強迫的方法去對付中農。』（『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五〇頁）

大概明白吧。

**第二個問題：集體農場運動中主要的錯誤是什麼？**

**答覆：這些錯誤至少有三種。**

第一，在組織集體農場的時候，破壞了列寧主義的自願的原則，破壞了黨的基本指令，破壞了關於根據自願性而建設集體農場的農業組合的模範章程。

列寧主義教訓我們說，應該用自願的方式，藉着說服農民使之相信公共的集體農場比個人農場要好些的方法，來使農民跑上集體農場的道路。列寧主義教訓我們說，要使農民相信集體農場的優點，祇有在實際上、在經驗上指

示給他們看，證明給他們看，集體農場是比個人農場更好、更有利，集體農場能使農民，貧農和中農免除貧困。列寧主義教訓我們說，沒有這些條件集體農場是不能鞏固的。列寧主義教訓我們說，凡是企圖用強力來維持集體農場，凡是企圖用強迫的方法來設立集體農場，就祇能夠得出壞的結果，祇能夠把農民推出集體農場。

真的，在大家還遵守這條基本規則的時候，集體農場運動是一步步成功的。但是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醺醉了，才開始忽略這個規則，開始表示非常躁忙的樣子，並且爲趕着提高集體化的百分數，就開始用強迫的方法來設立集體農場。這種『政策』的結果不久就發生了，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發生很快的集體農場，解體時也和發生一樣的快，一部份農民昨天還相信集體農場，今天就開始脫離集體農場了。

這就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第一個主要的錯誤。

你們看列寧關於集體農場建設中自願性的問題是怎樣講的：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變到土地公耕，變到大規模的公有農場。但是蘇維埃政權方面決不可採用任何的強迫。無論什麼法律也不能強迫進行公有農場。農業公社是自願組織的，並祇可以自願的來共同的耕種土地。在這方面，工農政府不可以用一點強迫的手段，並且法律也不允許。假使在你們中間看到了這種強迫的手段，那末這就是濫用法律，這就是破壞法

律，這種行動，我們始終是要用我們全部力量來設法改正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下冊，第三二〇頁）

繼續下去：

『祇有能够在實際上表示給農民看，到共同的、集體的、土地公耕社的、組合式的耕種土地的好處的時候，祇有在能够用土地公耕社的、組合的帮助來帮助農民的時候，祇有那時候，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够真正的向農民證實工人階級的真理，真正的能够將幾百萬農民羣衆堅固的、真正的引到工人方面來。因此，就不應該誇大任何種促進土地公耕社和組合式的農業的辦法的意義。我們這裏有幾百萬散漫的、分散在各鄉村中的各別農場…祇有在實際的農民容易懂得的經驗上，證實了改成土地公耕社和組合的方法經營農業是必須的而且是辦得到的時候，我們才有權利說，在俄國這樣大的農民國家裏，是在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九二頁）。

最後，列寧的著作中還有一個地方說：

『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要鼓勵各種各樣的聯合（中農的農業公社也一樣），它在組織這些聯合的時候，不應該使用一點兒強迫手段。祇有農民自動組織的並且又是他們在實際上證實了是有利的農業聯合，才有價值。在這方面過分的躁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躁

忙祇能够加深中農反對新現象的成見。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凡是想採用強迫的手段（不僅是直接的，甚至是間接的手段）以使農民加入公社的，這些人，都應該負嚴重的責任，並應該撤消他們在鄉村中的工作。』（『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五九頁。着重點都是斯大林加的）

大概很明白了吧。

黨預備十分嚴格的來實行列寧底這些指示，這難道還須要證明嗎？

第二，破壞了列寧主義的原則：就是應當估計蘇聯各區的各種不同條件，應用到集體農場的建設上去。忘記了在蘇聯有各種各樣最不相同的區域，各種各樣的經濟制度和文化程度。忘記了在這些區裏有先進的中和的落後的區域。忘記了，在這些大不相同的地方，集體農場運動的速度和建設集體農場的方法是不能夠到處一樣的。

列寧說：

『倘若同志們簡單的按着死板板的格式來為全俄國各地方寫去一樣的法令，倘若烏克蘭和頓河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不考察情形，籠籠統統的把這些法令傳佈到其他地方，那就錯誤了』…『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守着死板板的老格式，我們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不能說我們的經驗、俄羅斯中部的經驗是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陲地方去的』。

（『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〇六頁）

列寧接下去說：

『把俄羅斯中部、烏克蘭、西伯利亞拿來按着一定的呆板的格式來處理，這是最蠢的行爲。』（『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一四三頁）

最後，列寧委託高加索的共產黨員，叫他們必須：

『瞭解他們的共和國和蘇俄情形和條件不同的特點，了解必須不抄襲我們的策略，要深思熟慮的按着具體條件的發展來變化這種策略的外形。』（『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二〇〇頁）

大概明白了吧。

我們黨的中央根據列寧的這些指示，在『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案（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裏，根據集體化的速度，把蘇聯各區分爲三類，其中北高加索、中伏爾加流域和下伏爾加流域，在一九三一年春季集體化基本上可以完結；另一種的五穀區（烏克蘭、中央黑土州、西伯利亞、烏拉爾、哥薩克斯坦等等），基本上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可以完結；其餘區域，集體化要延長到五年計劃底一九三三年才能完結。

大概明白了吧，

可是實際怎樣呢？實際上是，我們有些同志，看見了集體農場最初的勝利就特別高興，老老實實的忘掉了列寧的指示、中央的決議。莫斯科州發狂似的趕着增加集體化的數目字，乃開始指示自己的工作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完結集體化的工作，可是它實際上至少還有三年的時間可

用（一九三二年底）。中央黑土州不願意『落在人家後面』，也開始督促工作人員在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完結集體化的工作，可是按照計劃，它至少有二年的工夫的可用（一九三一年底）。外高加索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在『趕上和追過』先進區域的努力中，開始企圖在『最短時期內』完成集體化，可是它們實在還有四年功夫可用（一九三三年度）。很明顯的，在這樣飛快的集體化的『速度』之下，在追着『超過』比較有準備的區域的時候，不十分有集體農場運動準備的區域，就不得不採用加緊的行政的壓迫手段，企圖用他們行政的火力來填補加緊集體農場運動中所缺少的原素。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區域裏所得到的混亂情形，後來祇好由中央干涉，而把這種情形整頓過來了。

這就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的第二個錯誤。

第三，破壞了列寧主義建設集體農場的另一條原則：就是不許跳過未完成的運動形式的原則。破壞了列寧主義的——不要越過羣衆的發展，不要命令羣衆運動，不要脫離羣衆，應該和羣衆一起前進，推動羣衆前進，引導他們接近我們的口號，使他們容易在他們自己經驗中相信我們的口號是正確的——這個原則。

列寧說：

『當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衛戍隊的兵士奪得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十分瞭解：爲了農村中的建設，必然要遇到許多更大的困難；這裏更須



要緩步前進；這裏，如果企圖用法令來強迫實行公耕土地，那就未免是一種極大的錯誤，祇有很少一部份覺悟的份子才能這樣做，而大多數的農民是不會提出這種任務的。因此，我們祇能這樣作（這是為革命發展底利益絕對必需的）：就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越過羣衆的發展，而要等候着，直等到運動依據這些羣衆本身的經驗和鬭爭而向前發展的時候。』（『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三八——五三九頁。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中央根據列寧這些指示，在著名的『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裏（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為：（一）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主要形式是農業組合；（二）因此必須製定農業組合的模範章程，因為組合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的主要形式；（三）在我們日常工作中，不應該自上的『命令』集體農場運動，『把集體化當兒戲』。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應該抱着農業公社的方針，不應該跳過農業組合，跳到農業公社，不應該用『命令』集體農場和『把集體農場當兒戲』的方法來替代農民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運動。

大概明白吧！

可是實際上怎樣呢？實際上我們有些同志被集體農場運動最初的勝利所醺醉了，老老實實的忘記了列寧的指示和中央的決議。這些同志不去組織羣衆運動，讚助農業組合，反而着手把個人農民直接的『渡到了』公社的章程

去。他們不去鞏固組合式的運動，反而開始用強迫手段，把小牲畜、家禽、非商品的奶牛、小房子都『社會化』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列寧主義者所不應有的忙迫所得的結果了。他們，照例是未組織成堅固的公社。可是，因此却放過了許多農業組合。的確留下了『很好看的』決議。但是這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第三個錯誤。

第三個問題：怎樣會發生這些錯誤，黨應該怎樣去改正這些錯誤？

答覆：這些錯誤，是因為集體農場運動方面很快的得了勝利而發生的。有的時候，勝利是會衝昏頭腦的。有時候，勝利會造成過分的自信和自大。這種情形尤其是在握政權的政黨的代表們方面容易發生。尤其是像我們黨這樣的政黨，因為它的力量和威信，差不多大得無法估量了。這裏很可以發生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種誇大狂，列寧會無情的反對過的。這裏很可以發生相信命令、決議、吩咐的萬能的情形。實際上，在我們這樣廣大的國家裏，在某個小地方上，很可以發生一種危險，就是把黨的革命的設施變為黨代表們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我所說的不僅是地方上的工作人，而且連各州的工作人甚至於中央的某幾個委員也在內。列寧說：『共產主義的誇大狂，就是有一種人，加入共產黨裏，還沒有被清洗出去，他認為他可以用共產黨的命令來解決一切的任務。』（『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三八四——三八五頁）

集體農場運動的錯誤，集體農場的建設工作中對黨路線的曲解，就是根據這種根源而發生的。

倘若這些錯誤和曲解還是繼續下去，倘若這些錯誤和曲解不很快的消滅了，消滅的一點殘餘也沒有，那末，將有什麼危險呢？

這裏的危險就是，這些錯誤會直接的引起集體農場運動的破裂與中農不睦，拆散貧農的團結，擾亂我們的隊伍，減弱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恢復富農。簡單的說，就是這些錯誤有一種推動我們脫離堅固聯合農民中基本羣衆的道路，脫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跑上與羣衆分裂的道路，跑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的趨勢。

這種危險在二月下半月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那時候，我們一部分同志被以前的勝利迷住了眼，就狂跳到列寧主義道路的對面去了。黨的中央估計到了這種危險，毫不遲延的干涉了這種現象，委託了斯大林做一篇專門論集體農場運動的文章，警告那些冒險的同志。有些人以為『勝利衝昏了頭腦』那篇文章，是斯大林個人獨出心材的作品。這當然是空話。我們，中央之所以存在，並不是爲了在這種事情上讓任何人發展他個人的私意。這等於無度的破壞中央。當然中央弄清楚這些錯誤的深刻程度和範圍的時候，中央就一點也不延擱的用中央威信所有的全部力量來打擊這些錯誤，發表了它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著名的決議。

人們在飛跑的時候，雖然快要落到深溝裏，還是很難

停止的，很難回轉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但是，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之所以叫做列寧黨的中央委員會，就是因為它非常善於戰勝這些困難。並且基本的說來，它已經戰勝了這些困難。

這裏主要的問題就是，要有勇氣來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振作精神在最短時期內消滅這些現象。被不久以前的勝利所醺醉後，就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了，怕自我批評，不願意很快很堅決的改正錯誤，——這就是最大的困難。若想把這些錯誤去得乾乾淨淨，就要戰勝這些困難，丟掉誇大的數目字的計劃，丟開辦事房中官僚主義的最高限度主義，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到集體農場中經濟組織的建設工作方面去。可是黨已經基本上戰勝了這種危險的困難，這是一點可以懷疑的地方也沒有的。

列寧說：

『以前的一切革命的政黨，凡是受到滅亡的，都是因為自大的緣故，因為它們未能看見力量存在的地方，他們怕說自己的弱點。可是我們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還學習着戰勝這些弱點。』（『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五九頁）

列寧這幾句話，是不應該忘記的。

第四個問題：反對曲解黨路綫的鬭爭，是不是向後退，是不是退却？

答覆：當然不是！祇有那些以為繼續錯誤和曲解就是

進攻、反對錯誤就是退却的人，才會說這是退却。充滿着錯誤和曲解的進攻，這不必說，當然是很好的『進攻』…

我們認為農業組合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中的基本形式，並規定了模範章程，作為集體農場運動中的指南。這是不是我們要捨棄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

我們認為鞏固工人階級及貧農和中農的生產聯合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基礎。我們是不是退出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的！

我們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作為現在我們鄉村實際工作中主要的口號。這是不是我們要捨棄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

我們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裏，便已對蘇聯農業集體化採取了一定的步驟，把蘇聯分為幾區，並為每區定下了一種特別的步驟。這是不是我們捨棄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

這樣，那裏有黨的『退却』呢？

我們希望犯了錯誤和曲解的人們放棄他們的錯誤。我們希望頭昏顛倒的人們，放棄頭昏顛倒的舉動，走上列寧主義的道路。我們希望這樣，因為祇有這樣，才能够繼續的真正進攻我們階級的敵人。是不是可以說，我們因此就向後退了呢？當然不可以！這祇是說，我們要進行正確的進攻，不是昏頭昏腦的把進攻當作兒戲。

祇有呆子和『左』傾的份子，才會把黨的這種立場估計成爲退却，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胡說這是退却的人們，至少不懂得兩件事情。

第一，他們不知道進攻的規律。他們不懂得，不鞏固所奪到的地盤的進攻是必遭失敗的進攻。譬如在軍事方面，什麼時候進攻才可以勝利呢？祇有在人們不限於一味的前進，而同時還想方法鞏固已經奪到的地盤，把自己底力量重新安排一下，使之適合於已經變更的環境，充實自己的後方，準備一些後備的時候。爲什麼要這樣作呢？爲的是預防意外的事變發生，爲的是消滅各別的破綻，因爲意外的事變和破綻是一切進攻所免不了的，這樣，就準備着澈底的消滅敵人。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的錯誤，倘若祇從軍事方面來看，就在於他們看輕了這些規則。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一口氣趕到基輔、後來又不得不一口氣逃回華沙的原因之一。倘若再祇從軍事方面看，一九二〇年蘇維埃軍隊的錯誤，也在於他們進攻華沙的時候，重覆了波蘭人的錯誤。階級鬭爭戰綫上進攻的規律，可以說也是這樣。不鞏固已經奪到的地盤，不重新把自己底力量安排一下，不預備後備軍來保證前綫，不鞏固後方，這樣來作消滅階級敵人的進攻也是不能勝利的。

整個的問題就在於那些昏頭昏腦的人們不懂得進攻的規律。整個的問題就在黨懂得這些規律，且實行這些規律。

第二，他們不懂得進攻的階級性。他們大喊進攻，但是進攻那個階級，聯合那個階級呢？我們聯合中農，進攻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因爲祇有這樣的進攻，才能得到勝

利。但是，倘若在黨的各別隊伍興高采烈、一味進攻的時候，進攻開始離開了正確的道路，把火力轉向了我們底同盟者中農，那時候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是什麼進攻都要的而不是要聯合一定的階級向另外一定的階級進攻嗎？

董·吉訶德（小說裏的一個人物）和風磨比武，自己也說他這是進攻敵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這種進攻的結果倒把自己的腦袋碰破了。

大概，董·吉訶德的榜樣使我們的『左』傾份子羨慕得覺都睡不成了。

第五個問題：那一種危險是我們的主要危險，右傾呢，還是『左傾』呢？

答覆：我們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右傾曾經是我們的主要危險，現在還是我們的主要危險。

這種說法和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決議裏著名的提綱是不是相矛盾呢？這條提綱裏說，『左』傾份子的錯誤和曲解，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主要障礙物。不，不矛盾。這裏是因為集體農場運動方面『左』傾份子的錯誤，會造成一種順利的環境，去促進和鞏固黨內的右傾。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錯誤是用折光來映照黨的路綫，他們使人更容易破壞黨的信仰，因此，他們使右派份子更容易反對黨的領導，破壞黨領導的信仰，是右傾份子反黨的最基本的基礎，祇有在這種基礎上，右傾份子才能發展他們反黨的鬭爭。『左』傾份子的錯誤和曲解，正好給右傾份子這種基礎。因此，為要使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鬭爭得到勝利，

就應該戰勝『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左』傾份子客觀上是右傾份子的同盟者。

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特別關係。

我們應該用這種關係來說明有些『左傾』份子與右傾分子談判聯合的事實，而下面的一種特別的現象也應該用這種關係來說明，就是：一部份『左派份子』，昨天在『進行』大進攻，企圖在兩三星期內把全蘇聯集體化；但今天就消極起來，放下兩隻手，讓出鬭爭的地盤給右傾份子，這樣就執行了真正向富農退却（不加括弧的）的政策。

我們所處的時期的特點，就在於反對『左』傾份子錯誤的鬭爭乃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鬭爭勝利的條件和特別的形式。

**第六個問題**：怎樣的估計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

**答覆**：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這意思就是說，近來產生了不少不健全的集體農場，現在他們正在肅清不堅定的分子。這就是說誇大的集體農場消滅了，堅固的集體農場留了下來，並且還會鞏固起來。我以為這是十分平常的現象。有些同志見了這種現象，失了望，慌張起來，戰戰兢兢的抓住誇大的百分數不肯放手。另外有些人，非常高興，並且預言集體農場運動的『倒台』。這兩種人都大大的弄錯了。這兩種人都太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集體農



場運動的本意。

第一，退出集體農場的，首先就是那些所謂活死人。這甚至於可以說不是退出而是留下空位子。我們要不要這些活死人？當然不要的。我以為北高加索人和烏克蘭人的行為完全是對的，他們解散活死人的集體農場，組織真正的和真正堅定的集體農場。這樣對集體農場運動祇有好處。

第二，退出的就是異己的、公開仇視我們的份子。很明顯的，這些份子愈洗出早些，對於集體農場運動也愈好些。

最後，一部份退出的是那些動搖的農民，這些人不能夠把他叫做異己份子，也不能叫做活死人。這些人，我們今天還未能夠使他們相信我們工作的正確，但是我們明天是會說服他們的。這些農民的退出，對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損失雖然是一種暫時的，但是很嚴重。因此，奪取集體農場中動搖的份子，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中最緊要的任務之一。

因此，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不僅是壞的現象。倘若這種退出是肅清集體農場裏的活死人和公開的異己份子，那末這乃是健全的和鞏固集體農場的好現象。

一個月以前，大家認為我們在五穀區內有百分之六十的集體化。現在都明白了，倘若這是指着真正的、相當堅定的集體農場說的，那末，這個百分數當然是誇大的。倘若在一部份農民退出之後，在五穀區裏，集體化的百分數

能保得住百分之四十——這大概是可以實現的——，那末，這已經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偉大的成績了。我這是拿五穀區中平均數來說，——我很知道，其中有幾個統盤集體化的區域裏集體化的數目要佔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穀區內百分之四十的集體化，就是等於說，我們能夠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經能超過了第一個五年集體化計劃的一倍。

誰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這種歷史上勝利的重要性呢？

第七個問題：動搖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這種做法好不好呢？

答覆：不，他們做的不好。他們退出集體農場，這是反着自己的利益而行，因為祇有集體農場能使農民免除窮困和黑暗。他們退出集體農場，就是把自己放在更壞的地位上，因為他失去了蘇維埃政權給集體農場的優待和利益。集體農場中的錯誤和曲解，不足當做退出集體農場的藉口。應該留在集體農場裏面，共同努力來改正錯誤。因為蘇維埃政權要用全副力量和這些錯誤鬭爭，所以，這些錯誤是很容易改正的。

列寧說：

『在商品生產制度之下，小經濟制度是不能夠使人類去掉羣衆的窮苦和壓迫的。』（『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上冊，第四九頁）

列寧說：

『小經濟是不能脫離窮苦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七八頁）

列寧說：

『倘若我們照舊的坐在小經濟裏面，雖然是自由民坐在自由土上，但我們終究免不了遇到滅亡的危險。』（『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部，第一六八頁）

列寧說：

『祇有靠着公共的組合的聯合的勞動，才能夠脫離帝國主義戰爭逼着我們走上的絕路。』（『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七五頁）

列寧說：

『必須轉變到大模範經濟中的公耕制度，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夠脫離俄國現在所受的破壞，就不能夠脫離此種簡直是絕望的情形。』（『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上冊，第一六九頁）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集體農場是使農民免除窮苦和黑暗的獨一無二的方法。很明顯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這種行動是不對的。

列寧說：

『蘇維埃政權認為公社、組合和一切預備把個人小經濟變為公有的聯合或組合經濟並逐漸促進這種轉變的組織，都有極偉大的意義。』（『列寧全集』，

第十六卷，第三九一頁)

列寧說：

『蘇維埃政權直接給公社和聯合優待條件，把他們放在第一位。』(『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一八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蘇維埃政權要給集體農場優待條件和優先權，這是與對待個人農場不同的。意思就是，在供給土地方面，在供給機器、拖拉機及種子等等方面，在減輕捐稅方面，在借貸方面，蘇維埃政權都要給集體農場優待條件。

爲什麼蘇維埃政權給集體農場優待條件和優先權呢？

因爲集體農場是解除農民窮苦的唯一辦法。

因爲用優待條件幫助集體農場，是幫助貧農和中農最真實的形式。

幾天以前，蘇維埃政權決定把集體農場中一切社會化的工作牲畜(馬、牛等)以及集體農場裏公有的和集體農場裏個人所有的一切牛、豬、羊和家禽等等免除兩年的稅。

此外，蘇維埃政權決定，集體農場份子所欠的款子延期到年底償還，而且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在四月一日前的一切罰金和法庭的處罰，一概撤消。

最後，蘇維埃政權決定，必須在本年內借出五萬萬盧布給集體農場。

這些優待條件是用來幫助集體農場的農民的。這些優待條件是預備幫助那些能够在退潮的面前站穩腳的，那些在與集體農場的敵人所作的鬭爭中，擁護集體農場，緊緊的握住集體農場運動的旗幟等等的集體農民的。這些優待條件，是幫助這些集體貧農和中農的，他們是我們現在集體農場的基本核心，他們鞏固並且形成我們的集體農場，他們奪取幾百萬幾千萬的農民到社會主義方面來。這些優待條件，是幫助這些集體農民的，因為他們是現在集體農場的基本中堅，他們是完全配稱為集體農場運動的英雄的。

退出集體農場的農民，得不到這些優待。

農民退出集體農場是犯了錯誤，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他們祇有回到集體農場才能得到這些優待條件，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第八個問題：**怎樣對付公社呢，應該解散他們嗎？

答覆：不，不應該，解散是沒有道理的。我說的是真正的公社，不是紙上的公社。在蘇聯五穀區裏，有許多很好的公社，它們應該受到獎勵和幫助。我所說的是舊的公社，它們已經有了幾年的試驗，在鬭爭中鍛鍊過了，完全證實了它們的存在是對的。至於說到新的公社，不久以前才成立的公社，那末，他們要能存在下去，祇有他們是由自願組織起來的，是得到農民積極的擁護，沒有什麼強迫的公共生活才行。

組織和經營公社，是很複雜、很困難的事情。必須有有經驗的中堅份子和老練的領導者，才能够使堅固的大公

社存在和發展。趕快的把組合章程改爲公社章程，祇能够把農民推出集體農場運動。因此，對於這個問題，應該用特別嚴重的態度，不應該有任何的急躁。組合是比較輕易的工作，並且是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接受的。因此，組合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最普遍的形式。祇有漸漸的鞏固和充實農業組合，才能够造成一種基礎，使農民大批的組織公社。因此公社最高的形式，祇有在將來才能够成爲集體農場運動中的主要連環。

第九個問題：怎樣處置富農呢？

答覆：上面所講的都是關於中農的問題。中農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我們的政策是應該和他親善。但是，對富農就不同了，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們和他們是沒有和平的，也不會有和平。我們對付富農的政策，是消滅富農階級。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便能把它消滅。但這乃是說我們預備把它圍起來，消滅它。

你們看列寧關於富農是怎樣說的：

『富農是最野蠻的、最殘酷的、最凶惡的剝削者，在歷史上不祇一次的恢復過地主、沙皇、教皇、資本家的政權。富農比地主和資本家要多。但是富農還是人民中的少數…這些喝血的人，在戰爭的時候是靠人民的窮苦而發了財，他積聚了成千成萬的錢，抬高麥子和其他生產品的價錢。這些蜘蛛，靠着被戰爭所破壞的農民、挨餓的工人而養肥了自己。這些喝血的東西，喝勞動者的血。城市中工廠工人愈是飢餓，

他們就愈發財。這些蝙蝠，不斷的收集地主的土地於自己手中，再去不斷的奴役農民。』（『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下冊，第二五七頁）

我們忍耐了這些喝血的東西，這些蜘蛛，這些蝙蝠，我們曾經實行了限制他們的剝削傾向的政策。我們忍耐過了，因為沒有旁的東西可以代替富農經濟和富農的生產。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很有利的用我們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來替代他們的經濟了。用不着再忍受這些蜘蛛和吸血鬼了。這些蜘蛛和吸血鬼，燒毀集體農場，殺死集體農民，企圖破壞播種。再忍耐這些東西，這就是等於背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因此，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應該最堅決、最澈底的進行，祇有布爾塞維克才有這種本事。

**第十個問題：**集體農場最近的實際任務是什麼？

**答覆：**集體農場最近的實際任務就是，努力春耕工作，努力盡量的擴張耕地的面積，努力為正確的組織播種而鬪爭。

現在集體農場所有的其他任務，都應該適應於播種的任務。

現在集體農場中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應該受組織播種的工作所支配。

這就是說，集體農場和集體農場中非黨的積極份子的堅固性，集體農場中領導者的能力，他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堅份子的能力，都不是在流利的決議中、長篇的歡迎詞中

去證明，而是要在正確的組織播種的活事業上去證明。

但是，爲要光榮的實現這種實際上的任務，就應該把集體農場工作人員的注意力移轉到集體農場建設的經濟問題方面和集體農場內部的建設問題方面去。

直到現在，集體農場工作人員注意力的中心，是在追趕集體化高大的數目字，而且人們都不願意分清真正的集體化和紙上的集體化。現在這種數目字的誇大，應該丟開。現在工作人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鞏固集體農場，在正式組織集體農場，在集體農場裏組織實際工作。

直到現在，集體農場工作人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組織大集體農場，組織所謂『大農場』，其中有些『大農場』，時常是變成紙上的官樣文章，在鄉村中沒有一點兒經濟基礎。陳列式的工作因此就吞沒了實際上的工作。現在這種專心做陳列方面工作的現象應該拋棄掉。現在工作者的注意力應當集中在鄉村集體農場中組織的經濟的工作上。當這種工作得到應有的成績時，『大農場』自然會出現的。

直到現在，人們都不很注意吸收中農去作集體農場中的領導工作。可是在中農中間有很好的管理人，他們可以充當集體農場建設中最好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這個缺點，應該消滅掉。現在的任務是吸收中農中間優秀的份子做領導工作，讓他們在這方面發展他們的能力。

直到現在，人們還沒有充分注意到農婦中間的工作。



過去的時期，表明農婦中間的工作是我們工作中最弱的地方。現在，應該堅決的澈底把這種缺點消滅掉。

直到現在，許多區裏的共產黨員，以為他們能夠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解決集體農場建設中的一切任務。因此他們就沒有充分注意到吸引非黨份子來參加集體農場中負責的工作，沒有充分注意到提拔非黨份子來做集體農場中的領導工作，沒有充分注意到組織集體農場中廣大的非黨積極份子。我們黨的歷史，證明這種立場根本不正確的，集體農場建設中過去這個時期，又一次的證明了這點。倘若共產黨員閉關自守，用一堵牆與非黨的份子隔開，那末他們就要毀壞全部的事業。共產黨員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主義鬭爭中得到光榮，共產主義的敵人之所以都被打翻，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共產黨員能夠吸收非黨羣衆中的優秀份子來參加工作，他們能夠盡量的應用廣大非黨羣衆的力量，他們能夠團結廣大非黨的積極份子於自己黨的周圍。現在我們應該堅決的、澈底的把我們在非黨份子工作中的缺點消滅。

改正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根本的消滅這些缺點，這就是把集體農場中的經濟工作推上正軌。

所以：

- 一，正確的組織播種，這就是任務。
- 二，集中注意力到集體農場運動中的經濟問題上面去，這就是解決這種任務所必要的方法。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聯共(布)第十六次大  
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  
治報告與結論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日

# 報 告

## 一 日益增長的世界資本主義的 恐慌與蘇聯的國際地位

同志們！自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年半。這一個時期，就表面上看來，似乎覺得不很大。但是，這一時期中，在各民族和各國家的生活上都起了很嚴重的變化。若是簡單的拿幾句話來說明這一個時期的特性，那我們可把這個時期叫做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對於我們蘇聯是一個轉變時期，而且對於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個轉變時期。可是在這兩種轉變之間，却有根本不同之點。在蘇聯呢，這個轉變是向着新的更偉大的經濟興旺方面進行的一個轉變；而在資本主義的各國，這個轉變却是向着經濟低落方面走的一個轉變。在我們蘇聯，是工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建設一天天的興旺；而在資本主義的各國，却是工業和農業中日益增長的經濟恐慌。簡單的說，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你們可回想一下兩年半以前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

形。那時候差不多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和貿易都是增長的。差不多所有農業國家的原料和食糧的生產都是增長的。十足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那時候被人稱爲是光榮的。高唱美國經濟的『興盛』，崇拜美金，歌頌新技術的發達，讚揚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以爲資本主義『健康』的時期和資本主義穩定而不可動搖的時期到來了。蘇維埃『必定倒台』，蘇聯『必定破產』，這些話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同盟』歡呼。

兩年半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的情形怎樣？

現在，差不多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家裏，都是經濟恐慌。現在，一切農業國家裏都是農村經濟恐慌。不是『興盛』而是羣衆的貧窮和失業工人的大大增加，不是農村經濟的高漲，而是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破產。一般對於資本主義萬能的幻想，特別是對於美國資本主義萬能的幻想，已被擊破了。美金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得勝歌聲，已一天天的弱小起來。對於資本主義的『錯誤』所抱的悲觀，却是一天天的厲害。對於蘇聯『必定倒台』的『同盟』歡呼呢，已變爲必要處罰『這個國家』的『同盟』咒詛聲，因爲這個國家，當到處恐慌的時候它却敢發展自己的經濟。

這就是現在的情形。

結果，正像布爾塞維克兩三年以前所說過的一樣。

布爾塞維克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技術發達，

生產力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加強，在千百萬工農羣衆生活水平綫有限的範圍內一定要走到嚴重的經濟恐慌。資產階級的出版物，當時對於布爾塞維克的這種『巧妙的預言』曾經加以嘲笑。右派曾經聲明不同意布爾塞維克的預言，拿自由派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等空話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但事實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正是像布爾塞維克當時所說的一樣。這是事實。

現在就來看看關於資本主義國家裏經濟恐慌的材料。

### 一 世界經濟恐慌

一，在研究這個恐慌的時候，首先就有下面幾個刺目的事實；

(一) 現在的經濟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這就是說，商品的生產，比市場所能容納的要多。這就是說，布料、燃料、工廠製造品和食用品等等的生產，比那些主要底消費者即（民衆）拿現錢來購買的能力要大，因為民衆收入的水平綫還是很低。民衆的購買能力既然還是停留在最低限度的水平綫上，那末商品、布料和麵包等等的『多餘品』，資本家都拿來放在堆棧裏或者簡直拿來毀滅，以便維持市面上的高價；縮小生產，裁減工人，而民衆反因商品生產太多而貧困。

(二) 現在的恐慌，是歐戰後第一個世界的經濟恐慌。這個恐慌的成爲世界恐慌，不僅祇是就它包括世界上一切的或差不多一切的工業國家而講：其中甚至連有系統地吸吮德國幾十萬萬馬克賠款的法國，也不能避免經濟上

相當的停滯，並根據所有的材料，也必定由停滯而轉爲恐慌。這個恐慌成爲世界的恐慌，而且是因爲這個工業的恐慌在時間上恰與農業恐慌相匯合，而後者却又遍及了世界上各主要農業國家裏原料和食品的生產。

（三）現在的世界恐慌，在發展上是不平衡的，雖然它帶着普遍的性質，但是它打擊這一國或是那一國，在時期上和力量上都是不同的。工業恐慌，開始是在波蘭、羅馬尼亞、巴爾幹各地。這個恐慌，在這些地方繼續了去年整個的一年。農業恐慌的明顯的徵兆，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底，在加拿大、美國，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亞就已經有了。在整個這個時期中，美國的工業是向上升的。到一九二九年年中，美國的工業生產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僅從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才開始轉變，隨後就是工業生產恐慌不斷的擴大，竟使美國回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狀態。接着就是加拿大和日本的工業恐慌，其次，是中國和各殖民地的恐慌與破產，這些國家的恐慌，因銀價低落而更加嚴重，且生產過剩的恐慌與農民經濟破產相匯合，地主的剝削和軍閥的苛捐雜稅使農民經濟陷入完全不能生存的地位。至於西歐方面，經濟恐慌祇是在今年初才開始，且爆發的力量不是到處一樣，譬如在法國，那時候工業生產還是繼續着高漲。

我想，現在用不着特別舉出許多數目字來證明現在的恐慌。恐慌的存在這件事實，現在已經無人爭論了。所以我祇舉出一個不很大但『很能表示現時世界經濟』特點的

統計表來，這個表是不久以前德國『行市研究院』發表的。它表示美國、英國、德國、波蘭和蘇聯從一九二七年起礦業和大製造工業中各主要部門的發展，同時，把一九二八年生產的水平綫作為一百。

這個表如下：

	蘇聯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波蘭
1927	82.4	95.5	105.5	100.1	86.6	88.5
192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9	123.5	106.3	107.9	101.8	109.4	99.8
1930(第一季)	155.5	95.5	107.4	93.4	113.1	84.6

這個表證明些什麼呢？

第一，它就是證明美國及德國和波蘭在大工業生產上處於很顯明的恐慌裏，同時，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美國經過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高漲後，生產水平綫與一九二九年比較低落了百分之一〇點八，就是降低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水平綫。德國經過三年的停滯狀態後，生產水平綫與去年相比較降低了百分之八點四，與一九二七年相比較降低了百分之六點七。波蘭自去年恐慌之後，生產水平綫與去年相比較降低了百分之十五點二，比一九二七年低百分之三點九。

第二，這個表是證明英國已經三年停滯在一九二七年的水平綫上，處在嚴重的經濟上的停滯狀態中，同時，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英國已經把自己的生產水平綫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〇點五，這樣，它就開始了恐慌的第一

期。

第三，這個表是證明各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祇有在法國還有大工業稍許高漲的情形，可是，它在一九二八年高漲的百分數是一三點四，在一九二九年是九點四，而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與一九二九年相比較高漲的百分數祇是三點七了，因此，它的高漲綫是一年年下降的。

最後，這個表是證明世界上一切國家中祇有蘇聯的大工業是凶猛高漲的，同時，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生產水平綫超過一九二七年的水平綫兩倍以上，而高漲的百分數，一九二八年是一七點六，到一九二九年漲到二三點五，而到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已漲到三二，因此，高漲綫是一年年上升的。

或者有人說，本年第一季以前的情形是這樣，那末在本年的第二季中，情形或者可以變好。但是第二季中所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這種說法，反之，這些材料都是證明第二季的情形比以前更變壞了。這些材料，證明紐約交易所股票的價格更形低落，證明美國企業的破產更形增加；證明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南美、波蘭、捷克斯拉夫等處的生產更形縮小，工人的工資更加減低，失業工人更加增多；證明法國工業中許多部門都已入於停滯的狀態，而這種停滯狀態，在現時國際經濟環境之下，是恐慌開始的徵兆。美國失業工人，現在已有六百多萬，德國近五百萬，英國有二百多萬，意大利、南美、日本等國各近百萬，波蘭、捷克斯拉夫、奧大利等國各近五十萬。不



要說使千百萬農民羣衆破產的農業恐慌之更加緊張。農村經濟生產過剩的恐慌已經達到了這樣程度，就是爲了要保持高的價格和資產階級的利潤，在巴西拋棄了二百萬袋的咖啡到海裏去，美國已開始拿玉蜀黍來代替煤炭作燃料，德國有數百萬普特的黑麥拿去餵豬，而在棉花和小麥方面，却設種種方法把耕田面積縮小百分之十至十五。

這就是正在擴大的世界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形。

二，當現在世界經濟恐慌大行其破壞工作的時候，大批的中小資本家一落千丈，一部份貴族工人和農戶遭了破產，千百萬的工人羣衆受着飢餓，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都問：恐慌的原因在那裏，它的根源在那裏，怎樣與恐慌奮鬥，怎樣消滅這種恐慌？於是就發生形形色色的關於恐慌的『理論』。竟有人提出許多『減輕』、『防止』、『消滅』恐慌的計劃。資產階級的在野派批評資產階級的政府，說它『沒有採取所有的辦法』以防止恐慌。『民主派』非難『共和派』，『共和派』非難『民主派』，而這些派又共同起來非難胡佛派及其『聯合後備制』，因爲這種制度未能『防止』恐慌於未來。還有一種『聰明人』，他們甚至把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看得是『布爾塞維克的詭計』，我所說的是指一個有名的工業家列赫列格，看起來，這個人很少像是一個工業家，可是倒很像一個文學家中的『工業家』，或工業家中的『文學家』。(會場大笑)

很明顯的，這些理論和提議沒有絲毫的科學性。要承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在恐慌面前已表示完全破產了。不

但如此，這些經濟學家甚至連他們的前輩們所不常拋棄的最小限度的靈敏都失掉了。這些先生們，忘記了恐慌不可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的一種偶然現象。他們忘記了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的結果。他們忘記了經濟恐慌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產生的。在百數十年的時間中，經濟恐慌是按期發生的，每十二年、十年、八年一次。在這個時期中，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政府，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的行動家，都曾經企圖把自己的力量用來試一試『防止』和『消滅』恐慌。但是他們都遭了失敗。他們的失敗，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是不能防止或消滅經濟恐慌的。無怪乎現在資產階級的著名角色也遭了失敗。無怪乎現在資產階級政府的辦法，事實上不能減輕恐慌的緊張，不能減輕千百萬勞動羣衆的困苦，反而引起更多的破產，失業工人的更形增加，引起強大的資本主義聯合吞併比較弱小的資本主義聯合。

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和它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身裏。恐慌的基礎是在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結果底資本主義形式的佔有兩者間的矛盾裏。資本主義的這個根本矛盾的表現，就是資本主義爲要取得最大限度利潤而發展的生產可能猛烈地增高，但百千萬勞動羣衆的購買能力相對地縮小，而且資本家又時時努力要把這些羣衆的生活水平綫束縛在極低限度的範圍之內。爲了要在競爭中取得勝利且多得利潤，資本家不得不發展技術，實行合理化，加緊剝削工人，且把自己企業生產的可能性提

高到極大限度。所有的資本家，誰也不願比誰落後，因此，他必須用種種方法走上使生產可能性迅速發展的道路。但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以及主要的購買者（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購買力，還是在很低的水平綫上。從此就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從此就發生一定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多少有定期的重復爆發，它的表現就是商品賣不出去，生產縮小，失業工人增多，工資降低；因此，就使生產水平綫和購買支付能力的水平綫中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起來。生產過剩的恐慌，是這個矛盾表現的最激烈而且破壞性最大的形式。假使資本主義能夠把自己的生產不用它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而用它去有系統的改良民衆的物質生活，假使它能夠把利潤不拿去滿足寄生階級的需要，不拿去完成剝削的方法，不拿去作資本的輸出，而拿去有系統的提高工人和農民的物質生活，那末恐慌就不會有了。但是，那時候的資本主義就不得成其爲資本主義了。要消滅恐慌，須先消滅資本主義。

這就是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一般底基礎。

但是要說明現在的恐慌，僅祇有上面所講的還不够，現在的恐慌，不是舊時代恐慌的一種簡單的重演。它是在一定的新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着的。要瞭解現在恐慌的全景，必須對於這些條件加以說明。因爲它是由於許多特殊情形而更複雜和加深的，假使不說明這些特殊情形，便不能明確的認識現在的經濟恐慌。

這些特殊情形是什麼呢？

這些特殊情形，可以歸納成下面幾種事實：

（一）現在的恐慌特別厲害的傷害了資本主義底主要國家，這個國家，就是至少擁有全世界一半生產和消費的美國。這種情形很明顯的不能不使恐慌影響的範圍大大底擴張，不能不引起恐慌的緊張和世界資本主義額外的許多困難。

（二）在經濟恐慌發展的行程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恐慌不是簡單的與農業恐慌相匯合，而是與農業國家的農村經濟恐慌交相混雜，因此就加深了困難，而且預先決定了經濟發展上一般的低落。不用說，工業恐慌將使農業恐慌加緊，農業恐慌又將使工業恐慌加緊，而這種情形，是不能不使整個經濟恐慌加深的。

（三）現在資本主義與以前的資本主義之不同，就是在於前者是壟斷式的資本主義，正因此，雖然生產過剩，而各種資本主義的聯合，也必然為保持商品的高度壟斷價格而鬭爭。很明顯地，因為這種情形，恐慌就使那商品底主要消費者——民衆，特別地遭受破產和痛苦，同時不能不引起恐慌的延長，不能不阻礙恐慌的消散。

（四）現在的經濟恐慌，是在資本主義普遍恐慌的基礎上擴展的，這個普遍的恐慌開始於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它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促進了經濟恐慌的到來。

這是表明什麼呢？

這首先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和它的結果加緊了資

本主義的腐化，並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它表明我們所處的時期，是戰爭和革命的時期，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種世界經濟獨一無二且包羅一切的制度，現時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外，還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存在，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一天天發達起來，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它的存在這件事實，就是表示資本主義的腐朽，並且動搖它的基礎。

再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被保護國的統治，表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的威信已被破壞，表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已不能再用舊的方法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了。

這就是表明，大戰的時候和戰後的時期中，在殖民地和被保護國裏，發生並長大了本地的幼稚的資本主義，這個本地的資本主義，在市場上能順利的與老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因此就使爭奪市場的問題更加緊張而複雜起來。

末了，這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給了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一件困難的遺產，就是企業經常地不能開滿工和千百萬的失業軍，這些失業者，已經由後備軍變而為經常的失業軍，這種情形，還是在經濟恐慌以前就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很多的困難，而在恐慌的時候，當使問題更複雜起來。

這就是使世界經濟恐慌更加深和更緊張的幾個特殊情形。

應當承認，現在的經濟恐慌，是直到如今所有的世界經濟恐慌中的最嚴重且最深刻的一個恐慌。

## 二 資本主義矛盾底銳利化

世界經濟恐慌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顯露和緊張。

一，各主要帝國主義的國家，爭奪出賣商品的市場、爭奪原料、爭着輸出资本等等的矛盾正在暴露和緊張。舊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分配，現在已經不能滿足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看見力量的對比關係已經起了變化，要相當的重新分配市場和原料來源以及勢力範圍了。這些矛盾中的主要的，就是美國與英國中間的矛盾。無論在商品輸出方面或資本輸出方面，主要的鬭爭，都是英、美中間的鬭爭。對於這一點，拿關於商品和資本輸出的任何一種經濟報紙或文件來看，都不難明瞭。他們中間的鬭爭和主要的地方，就是南美洲、中國和老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被保護國。在這個鬭爭中，以力量的比重看起來，美國是比較強。除這個主要的矛盾外，還有不主要的，但亦是很現實的矛盾，即美國與日本間的矛盾，德國與法國間的矛盾，法國與意大利間的矛盾，英國與法國間的矛盾等等。

因為現在恐慌的發展，爭奪市場，爭奪原料，爭着輸出资本的鬭爭，定將一月一月、一天一天的加強起來，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種鬭爭的方法，就是：關稅政策，廉價商品，廉價借貸，重新團結力量和新的軍事政治聯盟，增加軍備和準備新的帝國主義大戰，最後就是戰爭。我在上面已經說

過，現在的恐慌牽動了所有的各生產部門。但有一個生產部門是沒有受恐慌影響的，這個部門就是軍事工業。雖有恐慌，但這部門工業却是經常地發展。資產階級國家都拚命的武裝，過度的武裝。爲的是什麼呢？當然，不是爲的要談判而是爲的戰爭。帝國主義者所以需要戰爭，是因爲戰爭是重新瓜分世界的唯一方法，重新瓜分商品市場、瓜分原料來源地、瓜分投資勢力範圍的唯一方法。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和平主義，自然走到自己的末日了；國際聯盟祇是一個還未埋葬的死屍；『裁兵計劃』已一個個的破產，裁減海軍會議，却變成了革新和擴充海軍的會議。

這就是說，戰爭的危險將以更快的步驟緊張起來。

讓那班社會民主黨人去高叫什麼和平主義、和平、資本主義的和平發達等類的鬼話吧！但是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和英國執政的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和平主義僅僅是他們掩蓋準備新的大戰的假面具。

二，戰勝國與戰敗國兩方間的矛盾正在顯露出來，並且這種矛盾必將緊張起來。我所講的戰敗國，主要的是指德國。因爲恐慌和市場問題緊張的緣故，戰勝國對於德國的壓迫，毫無疑義的是加強了，而德國不僅祇是一個欠債的，並且還是很大的一個商品輸出者。戰勝國與德國之間的關係，好像一個寶塔似的，坐在這個寶塔之上當老爺的是美國、法國和英國等等，他們手裏拿着榮氏的計劃，計劃上面寫着『付錢』二字，而被坐在下面的是千方百計不

得不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付清幾十萬萬賠款的德國。你們想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嗎？這就是『洛卡諾的精神』。假使以為這種情形能夠輕易的過去而無須世界資本主義費絲毫氣力，那就是簡直連一點實際生活也不懂。假使以為德國資產階級能够在最近的十年內付清兩百萬萬馬克的賠款，而處在『自家』資產階級和『外來』資產階級兩層壓迫下的德國無產階級，能不經過激烈的鬭爭，給德國資產階級好好地從血汗裏吸吮去兩百萬萬馬克，這也是等於癡人說夢。讓德國和法國的政治家去裝腔作勢，說他們相信會有這樣神奇的事情吧，我們布爾塞維克是不信什麼神怪的。

三，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兩方間矛盾的顯露和緊張。日形高漲的經濟恐慌，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加緊壓迫，因為這些國家是銷售商品和取得原料的主要市場。而實際上，這種壓迫也確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歐洲的資產階級，現在是處於和『自己』殖民地（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北非洲）作戰的狀況，這是事實。『自主的』中國，實際上已經分成許多勢力範圍，而反革命的×××中的各派軍閥，彼此交戰又是執行帝國主義營壘中自己主人們的志願，中國民衆乃因之而破產，這也是事實。

有種騙人的謊話，以為破壞中國『和平與治安』的罪人是俄國公使館的工作人員，這種話已經完全破產了。中國的中部與南部，好久已經沒有俄國的公使館了。可是，那裏有英、日、德、美以及其他國家的公使館。無論在中



國的南部或中部，早已都沒有俄國的公使館了。可是在各交戰的軍閥之下，有德、英、日等國的軍事顧問。中國已經好久沒有俄國公使館了，可是有英國、美國、德國、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國家的大炮、步槍、飛機、坦克車和殺人的毒氣等等東西。結果是怎樣呢？現在中國的南部和中部並沒有『和平與治安』，但是有最混亂、最帶破壞性的軍閥戰爭，並且這種戰爭，是有歐美各『文明』國家供給財政並指導的。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洗禮』工作的情形，却很令人驚駭，祇不知道這與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有什麼關係。

假使以為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橫行不會受絲毫的懲罰，那是笑話。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已經拿建立蘇維埃和紅軍來回答帝國主義者。有人說中國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我想如果這話是正確的，那也沒有什麼奇怪。毫無疑義的，祇有蘇維埃能夠把中國從最後的破產和貧困裏救出來。

至於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和非洲等地方，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有時候帶着謀解放的民族戰爭的形式，這種運動毫無疑義的是在那裏發展着。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依靠警察的刺刀且號召甘地一流人物來幫助，一心想把這些國家殺成血河。毫無疑義的，警察的刺刀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俄國沙皇政府也曾經依靠過警察的刺刀，但結果怎樣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甘地式的這類助手，俄國沙皇政府也曾經有過一大批，就是各式各樣的自由派的妥協者，但是結果，除倒台外沒有別的。

四，資本主義國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方間矛盾的顯露和緊張。恐慌早已使資本家加強對於工人階級的壓迫了。恐慌早已引起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新浪潮，工人階級生活的惡劣化，失業的更增加，失業工人常備軍的更擴大，工資的更減低。很明顯的，這種情形會使環境革命化，使階級鬭爭緊張，使工人們起來幹新的階級戰鬭。

因此，工人羣衆中那種社會民主黨的幻想日形消散。破壞罷工、指使工廠關門和開除工人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他們掌握政權之後，什麼『生產的民主』、『工業和平』、鬭爭的『和平方法』等等騙人的鬼話，在工人們的耳朵聽來，已是很可惡的笑談了。現在能相信社會法西斯蒂那種騙人宣傳的工人們，還可以多找嗎？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的工人示威（反對戰爭危險）以及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示威（反對失業），證明工人階級中較好的份子都已經脫離了社會法西斯蒂的影響。經濟恐慌給工人中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幻想一個新的打擊。現在找不出許多的工人，在因恐慌而破產和貧窮之後，還同意和相信『每個工人』有參加『民主化了的』合股公司而發財的可能。不用說，恐慌能給這一切類似的幻想以致命的打擊。

但是，工人羣衆的脫離社會民主黨，是表明他們（工人）向共產主義方面的轉變。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的。在共產黨影響下的職工運動的增漲；共產黨在選舉運動中的勝利；在共產黨員領導下的罷工運動的增多；經濟罷工轉變為共產黨員所組織的政治上的示威；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工

人們的羣衆示威遊行，這些示威遊行又引起了工人階級中最積極的情緒；這一切現象都是證明工人羣衆把共產黨看作是能和資本主義鬭爭的唯一的政黨，值得工人信仰的唯一的政黨，可以跟着這個政黨去爲謀從資本主義下解放出來而鬭爭。這就是羣衆向共產主義方面的轉變。這就是我們各兄弟黨能變成工人階級的大羣衆政黨的保證。不過須要共產主義者能估量環境，且適當的利用這種環境。各國共產黨曾與資本家在工人階級中的走狗——社會民主黨作不調和的鬭爭，且曾打破幫助社會民主黨的、離開列寧主義的各種傾向，這都是證明各兄弟黨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但必須他們能堅固的站在這條道路上，因爲祇有在這個條件下他們才能取得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且能順利的準備無產階級起來作目前的鬭爭。因爲祇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使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威信更加增高。

這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各根本矛盾的狀況，這些根本矛盾因世界經濟恐慌而緊張到了極點。

這些事實表明些什麼呢？

它們表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到了窮途末日。

它們表明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漲，將更有力的強烈起來。

它們表明世界經濟恐慌將在許多國家裏轉變成政治的恐慌。

第一，這是說資產階級在內政上將用加緊法西斯蒂化的方法去尋找出路，爲了這一點，它將利用一切反動勢

力，連社會民主黨也在內。

第二，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上，將在新帝國主義大戰中和武裝干涉中去尋找出路。

末了，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戰爭危險，必將在革命中去尋找去路。

### 三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

一，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除了這些矛盾以外還存在有一種矛盾，這就是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矛盾。不錯，這種矛盾不是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它是整個資本主義與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的一種矛盾。但是，這不妨礙它動搖和破壞資本主義本身的基礎。不僅這樣，這個矛盾並把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都揭穿到底，並把這些矛盾積成一團，使它們變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此，當資本主義矛盾每次開始緊張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總眼望着蘇聯，企圖在蘇聯的賬上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某個矛盾，或資本主義所有的一切矛盾，因為蘇聯是革命的大本營，它的存在，就使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它妨礙進行新戰爭，妨礙重新瓜分世界，妨礙統治廣大的蘇聯市場，而這種市場，因經濟恐慌的緣故，現在對於資本家是特別需要的。

由此，就生出對蘇聯的冒險行動和干涉的趨勢，這個趨勢，因經濟恐慌的擴展更要加緊。

這個趨勢在現時最明顯的代表者，就是現在資產階級的法國，即可愛的『大歐羅巴』的故鄉，開洛和約的『搖

籃』，世界上各侵略國、各軍國主義國家中最利害的侵略的和軍國主義的國家。

但是武裝干涉這件東西，是一條棍子的兩端。這是資產階級最明瞭的。資產階級想，假使干涉的事情能『一帆風順』，結果蘇聯失敗，那是好的。但是，假使這種干涉的結果是資本家失敗，那就怎樣辦呢？不是已經有過一次干涉嗎，那次的干涉是破了產的。在第一次干涉的時候布爾塞維克還是軟弱的，但干涉却破了產，那末，怎樣能保證第二次干涉不會遭同樣的破產呢？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布爾塞維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國防的準備上，都比以前強多了。同時，對於資本主義國裏的工人們要怎樣辦呢，這些工人們不是不准干涉蘇聯，不是將反對武裝干涉，在必要時，不是能夠打擊資本家的後方嗎？這樣看來，不如還是採取和蘇聯加緊通商關係好，並且布爾塞維克也是不反對這種辦法的。

由此就生出與蘇聯繼續和平關係的趨勢。

這樣，我們便有兩種不同而方向相反的趨勢：

（一）破壞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採取對蘇聯的挑撥行動，公開的和祕密的準備武裝干涉以反對蘇聯。這就是使蘇聯國際地位有危險的元素。譬如英國保守黨內閣與蘇聯的絕交、中國軍閥的奪取中東路、財政上封鎖蘇聯、以羅馬教皇為首的教徒底『征討運動』反對蘇聯、外國的奸細組織我們的專門家起來作破壞經濟的行動、舉行炸毀和焚燒（如『連那金場』幾個職員所幹的

事）、謀刺蘇聯代表（波蘭）、阻礙我們的出口（美國、波蘭）等等事實，都是這種元素的作用。

（二）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們的同情和擁護蘇聯，蘇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威力的增大，蘇聯在國防上力量的加強，蘇維埃政權所堅決執行的和平政策。這些都是鞏固蘇聯國際地位的元素。中東路事件的勝利，和英國恢復邦交，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聯繫的增多等等事實，就是這些元素的作用。

蘇聯的國外狀況，是由這兩種趨勢的鬭爭來決定的。

（三）有人說，改良與資產階級國家經濟聯繫的事情上的困難點，是債務問題。我以爲還債這不是一個理由，而是侵略份子作武裝干涉宣傳的一種口實。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是明白且完全有根據的。在借款給我們的條件下，我們同意償還一小部分戰前的債務，而把這種還款看作是借款的補充利息。沒有這個條件，我們是不能還債而且不應還債的。要向我們多要求些嗎？根據在那裏？難道不知道這些債是沙皇政府所借的，而沙皇政府已被革命所推翻，而沙皇政府的債務是蘇維埃政府所不能負責的嗎？有人要提起國際公法和國際義務來。那末，試問『協約國』的老爺們，根據何種國際公法，把比沙拉比亞從蘇聯奪去，而把它交給羅馬尼亞的貴族呢？試問法、英、美、日等國的資本家，根據何種國際義務進攻了蘇聯，干涉了蘇聯，且整整的搶劫了它三年之久，使它的民衆破產呢？假使這還叫作國際公法和國際義務，試問什麼叫作搶劫？

（會場上笑聲、鼓掌）『協約國』的老爺們既幹了這些搶劫的事，他們就不能拿國際公法和國際義務來作根據了，這事難道還不明白嗎？

又有人說，是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妨礙確定『正當的』關係。爲了要提防布爾塞維克有害的宣傳，資產階級的老爺們用『哨兵綫』和『鐵絲網』把自己保衛起來，而把看守『鐵絲網』的官職，很慈愛的交給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國。有人說德國很吃醋，因爲人家不願意委託它看守『哨兵綫』和『鐵絲網』。他們亂喊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不是爲着要確定『正當的關係』而是一種宣傳武裝干涉的口實，這還待證明嗎？他們如果不願意作可笑的人，怎樣會自己『用電網隔起來』以『提防』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哩，難道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沒有合於這種思想發展的基礎嗎？沙皇政府當時也曾經『這樣隔起來』『提防』布爾塞維克主義，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沒有『提防』得了的。它所以沒有提防得了，是因爲布爾塞維主義到處發展，不是從外而來的，乃是從內而來的。中國、印度、安南等國，恐怕在『提防』俄國布爾塞維克一方面比任何國家都要『保衛』得好，但是結果怎樣呢？雖然設有『哨兵綫』，但布爾塞維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現在是發展着，將來還是要發展的，因爲那裏有適合於布爾塞維主義發展的條件。這又與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有什麼關係呢？假使資本家老爺們能够設法和經濟恐慌、羣衆的貧窮、失業、工資的低落、勞動羣衆的被剝削等等『隔離起

來』，——那就是另外的說法了，那時候他們國裏的布爾塞維克運動也不會有了。但問題就在於他們沒有這種能力，却拿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來掩蓋自己的懦弱無能。

又有人說，問題的難點，是在於我們的制度是蘇維埃的制度，在於我們的經濟集體化，在於我們和富農鬭爭，在於我們作反宗教的宣傳，在於我們與『科學人物』中的賊害份子和反革命者鬭爭，在於我們驅逐了比雪都夫斯基、索羅門諾夫和德米托列夫斯基這班人等等。但是這說得未免太無聊了。他們不喜歡蘇維埃制度，不知我們也是同樣的不喜歡資本主義的制度呢。（會場上笑、鼓掌）我們不喜歡他們有幾千萬的失業工人被逼得挨餓和流離失所，而同時，無數萬的財產却都被一小部份資本家所操縱着。但是我們同意了不干涉別國的內事，那就值不得再提起喜歡與不喜歡的問題了。農業集體化、反對富農、反對經濟上的賊害份子、反宗教宣傳等等，是蘇聯工農底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載在蘇維埃憲法上，是不能被人剝削奪掉的。蘇聯的憲法是我們必須澈底施行的。誰要不願意承認我們的憲法，他就可以走開，四方八面都無阻礙。至於比雪都夫斯基、索羅門諾夫和德米托列夫斯基這班人，我們現在還是要把他們當作無用的貨物驅逐滾蛋的。因他們是革命所不需要的，是對於革命有害的。誰要是對於這種人懷有特別的同情心，就讓他收留他們去好了。（會場上笑）我們革命的磨石底工作是很靈敏的，把一切有用的東西都交給蘇維埃，把一切廢物都去掉。聽說法國巴黎資



產階級中很需要這種廢物，讓他們運回國去作康健劑罷。不錯，這種輸入品要稍許加重些法國在商業上的入超，是資產階級的老爺們所永遠反對的。但這已經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沒有關係。讓我們不去干涉法國的內政吧。（會場上笑、鼓掌）

妨害與資本主義國家確定『正當的』關係的一些『障礙物』的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看起來，這些『障礙物』是種有名無實的『障礙物』，是用來作反蘇維埃宣傳的口實的。

我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是和一切國家加緊商業關係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和許多國家的關係都好了些，並訂立了許多的通商條約、技術幫助的條約等等。蘇聯簽訂開洛和約，根據開洛和約，我們和波蘭、羅馬尼亞、立陶宛等國簽了有名的和約，與土耳其續訂了和善並中立的條約。這些，也是我們對外的和平政策的結果。最後，還有一件事實是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雖有挑戰者的許多挑撥和冒險行爲，但我們却得以維持了和平，未讓敵人把我們牽入戰爭的漩渦。這個和平政策，是我們以後還將用一切力量和種種方法來繼續實行的。我們不願意拿人家的一寸土地，但是我們自己的土地是一尺也不給人家的。（鼓掌）

這就是我們的對外政策。

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以後還是用布爾塞維克的堅決性繼續實行這個政策。

## 二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展 和蘇聯底內部情形

現在來講蘇聯底內部情形。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現在流行着經濟的恐慌和不斷增加的失業，而我們國家的內部情形却好相反，是國民經濟不斷興旺和失業不斷地減少。大工業發展起來，並且加快了發展的速度。鞏固了重工業。社會主義部份的工業已經大大的前進了。在農業中發展了新的力量，就是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倘若兩年前我們有過五穀生產的危機，在收買糧食方面主要的全靠個人經濟，那末，到了現在，重心已經移到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上去了，而五穀的危機大體上可以說是解決了。農民中間的基本羣衆，澈底的轉到集體農場方面來了。富農的反抗已被打退。蘇聯的國內地位更其堅固了。

現在蘇聯國內的一般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來考察一下具體的統計。

### 一 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

一，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全部鄉村經濟連木材業、漁業等等都在內，它的總生產，照戰前盧布計算總共有一百二十三萬萬七千萬盧布，即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那末下一年，即一九二七——二八年，就是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一九二

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零九點一，到了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鄉村經濟發展的情形來算，將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十三到百分之一百十四。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鄉村經濟不斷的增長，雖然它的速度是比較慢些。

一九二六——二七年，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以前，全部工業大小都在內，連麵粉工業也在內，總的生產品，照戰前盧布計算有八十六萬萬四千一百萬盧布，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第二年，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點五；到了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工業發展的情形來說，至少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工業空前的發展。

二，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我們所有鐵路上的貨物轉運量是八百一十萬萬七千萬啓羅米突噸，即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四點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六十二點四；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九十三以上。至於說到新鐵路的建築，那末，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內，即從一九二七——二八的年度開始，鐵路從七萬六千啓羅米突增加到了八萬啓羅米突，這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六點七。

三，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國內商品買賣的流

轉，當做一百（三百一十萬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裏，流轉的數量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六；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一百六十點四；到了今年，根據所有的統計，流轉的數量就將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二，這就是說，等於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兩倍。

四，倘若把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我們全部信用借貸機關的總賬目算做一百（九十一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點一，即等於一九二七年的兩倍。

五，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裏的國家總預算算做一百（六十三萬萬七千一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國家預算增加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五；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點七；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就增到了百分之二百零四點四，即等於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度的兩倍（一百二十六萬萬零五百萬）。

六，倘若一九二六——二七年我們對外貿易的流轉量（進出口）是等於戰前百分之四十七點九；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我們見到對外貿易的流轉量增到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六十七點九；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

七，總計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全部國民收入增加的情形（按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不變價格計算），根據國家計劃局的統計，是：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國民收入等於二百三十一萬萬二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二百五十三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二百八十五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六；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國民收入應該至少等於三百四十萬萬盧布，那就是一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年來平均每年的增加超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倘若我們注意一下美、英、德等國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祇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末，應該承認，蘇聯國民收入增加的速度真正要算是破天荒的了。

## 二 工業化的成績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盲目的，而是朝着一定的方向的，就是正朝着工業化方面的，是在增加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系統中的比重的目標之下進行的，是在把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旗幟之下發展的。

一，從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的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來說，全部工業和全部鄉村經濟之間互相關係的變動，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有如下的情形：戰前，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生產量中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四十二點一，鄉村經濟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五十七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工業所佔的部份等於百分之四十五點二，鄉村經濟佔百分

之五十四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七，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應該佔百分之五十三以上，鄉村經濟應該佔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說，工業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鄉村經濟的比重了，我們現在已經處在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前夜。（鼓掌聲）

二，從工業在國民經濟的商品生產中的比重方面說來，工業的比重更要大。倘若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工業的商品生產，在國民經濟商品生產的總數內所佔的部份，是等於百分之六十八點八，鄉村經濟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二；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裏，工業就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二，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四，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六，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將要佔百分之七十六，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四。

在鄉村經濟這種不利的條件中，其中有一點是因為鄉村經濟的小農性和商品生產量少。由此很明顯了，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方法去鞏固鄉村經濟，去增加它的商品，這種情形必有相當的變更。

三，但是，一般工業的發展，還不就表明工業化速度的全景。爲要見到全景，就必須再確定輕重工業間的關係。所以，生產工具的生產（重工業）在全部工業生產中

所佔的比重的不斷增加，應該算是工業化發展的最明顯的表徵。倘若一九二七——二八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在全部工業中所佔的部分是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大衆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八；那末，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就要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工具的生產，根據一切統計要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來看祇拿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一切基本生產部門的工業來看，那末，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大衆消費品的生產之間的關係，就要更好些：一九二七——二八年，生產工具的生產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一九二八——二九年，生產工具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六，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五點四；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生產工具生產將要佔百分之四十八以上，而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五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徵之下、是在鞏固和發展本國重工業的表徵之下進行的。

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提高了，並繼續發展着我們經濟獨立的基礎——我們的重工業。

### 三 社會主義工業底指導地位和它發展的速度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誌之下進行的。但並不是隨便什麼工業化我們都需要。我們所需要的

工業化，是要它能保證社會主義式的工業不斷地超過小商品式的工業，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我們工業化的特點，就在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它能夠保證社會化部份的工業戰勝私人經濟式的部份，戰勝小商品的和資本主義的部份。

下面就是關於各部份經濟中的投資和總出產量的幾個總計。

一，倘若拿各部份工業中投資數量的增加來看，那末，我們就可以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裏爲十二萬萬七千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十六萬萬一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二十萬萬四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四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爲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五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五千一百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中投資的數量增到了三倍以上（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的投資，在這個時期中減少了五分之一（等於百分之八十一）。

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分，是依靠着舊資本過活，並在走向滅亡。

二，倘若按部份來看工業的總出產，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的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是一百



十九萬萬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一百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是一百八十九萬萬零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是二百四十七萬萬四千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是四十萬萬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三十七萬萬零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是三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是三十三萬萬一千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到了兩倍以上（百分之二百零六又二）。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工業的總出產，在同一時期減少了五分之一（百分之十八點八）。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的生產來看，祇拿大工業來看，並且把它分兩部份來看，那末，我們就見到社會主義部份和私人經濟部份間的關係有以下的情形。社會化部份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是百分之九十七點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九二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私人經濟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是百分之二點三；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是千分之九；一九二九——三〇年是千分之七。

你們可以見到，資本主義的份子在大工業中，已經走向末路去了。

很明顯的，『誰勝誰』的問題，工業中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份子，還是他們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基本上已經是向着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勝利方面解決了。澈底地解決了，再不會變更了。（鼓掌聲）

三，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國有工業，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的發展速度的總計更可注意。倘若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候的總生產算是一百，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這種工業的總出產，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六；而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它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點八。

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計劃下的社會主義工業，包含一切主要工業部門和全部重工業，在這三年之中，已經達到了戰前的兩倍以上。

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底大工業的發展有過這樣快的速度。

這種情形就使我們有根據說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四，有些同志對於『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抱着懷疑的態度。不久以前，有一部份同志，把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五年計劃當作幻想看待。我且不講資產階級的著作家，他們一聽見『五年計劃』四個字，就驚訝得目瞪口呆。倘若我們從實行五年計劃第一二兩年的情形來說，事實是怎樣呢，審查執行最高度的五年計劃的情形的結果，告訴我們什麼呢？這不但證明我們能夠把五年計

劃四年來完成，而且這還證明，在許多工業部門中，我們能够三年完成甚至二年半完成。在機會主義營壘裏的懷疑論者看來這好像是不會有的。但這是事實，要爭論這點，就簡直是愚蠢、可笑。

你們自己來評判吧。

照五年計劃，煤油業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九萬萬七千七百萬盧布的生產品。而實際上，一九二九——三〇年已經能出產八萬萬零九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內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八十三。所以，我們大概在兩年半以內，就能完成煤油工業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泥炭工業到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一萬萬二千二百萬盧布的生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它已經能出產一萬萬一千五百萬以上盧布的出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所出產的百分之九十六。所以，我們在兩年半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完成泥炭工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一九三二——三三年全部機器製造工業要出產二十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它已經能出產十四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七十。所以，我們在二年半或三年內就完成全部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農業機器製造業在一九三二——三三年

裏應該出產六萬萬一千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已經能出產四萬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年——三三年應該出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就能完成農業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電機工業，到一九三二——三三年時，應該出產八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的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就已經出產五萬萬零三百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以內就完成電氣工業的五年計劃。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就是這樣。

我們加速的前進，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

五，這當然並不是說，在生產的規模上說來我們已經趕上了他們，或我們的工業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展的程度了。不，還差得遠哩。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為一談。許多人把它們混淆起來，以為倘若我們達到了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因此，我們就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達的程度了。但是，這是根本不對的。

譬如，舉電力生產做例子，那裏的速度是很快。我們電力的生產，從一九二四——二九年，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六百；而美國在同時期內，電力的生產，祇增加到百分

之一百八十一；加拿大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國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你們看，這裏我們的速度是向來沒有過的，它超過了一切其他國家的速度。但是，倘若考察一下這些國家中電力生產發展的程度，例如一九二九年的程度，把它和蘇聯的發展程度比較一下，那末，蘇聯的情形是很不可以安心的。蘇聯電力生產的發展雖然有空前的速度，可是在一九二九年，祇有六十四萬萬六千五百萬啓羅瓦特小時；而美國却有一千二百六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加拿大有一百七十六萬萬二千八百萬啓羅瓦特小時；德國有三百三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意大利有一百零八萬萬五千萬啓羅瓦特小時。

你們看，差別是很大的。

結果就是，照發展的程度來說，我們還落在這些國家後面。

或者舉生鐵的生產做例子。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生鐵出產當做一百（二百九十萬噸），那末，三年來，即從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生鐵的生產差不多增加到兩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萬噸）。你們看，發展的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倘若從我們生鐵的生產程度來看，把蘇聯生鐵生產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生產的規模比較一下，那末，情形就不十分可以安心了。開始先說到，我們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才趕上和超過戰前生鐵生產的程度。就這

一點，就使我們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說，倘若不加速五金發展的速度，我們就會使全部工業生產的命運發生危機。至於說到我們的和西方的生鐵生產的程度，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九年美國生鐵的出產，等於四千二百三十萬噸；德國等於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等於一千零四十五萬噸；而蘇聯生鐵的出產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總共祇有五百五十萬噸。

你們看，差別是不少哩。

因此，結果就是，在生鐵出產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落在這些國家後面的。

這些情形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

（一）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在一起；

（二）在我們工業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落後得很多；

（三）祇有繼續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們才能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國家；

（四）噪嚷着要減低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底人們，就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我們階級敵人的奸細。（鼓掌聲）

#### 四 鄉村經濟和穀類問題

上面我講到全部鄉村經濟的情形，連林業、漁業等等都在內，並沒有把鄉村經濟按部門的來劃分。倘若我們從

全部鄉村經濟中劃分出基本的部門，例如穀類經濟、畜牧、原料植物，那末，照蘇聯人民農業委員部和國家計劃局的總計，就得到以下的情形。

一，倘若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田的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穀田變動的情形如下：一九二六——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材料，將要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一。

你們看到，一九二七——二八年的五穀田是減少了。這種減少，並不是像右傾機會主義營壘中的庸人關於這點的胡喊那樣，說是因為五穀經濟退化了；這乃是因為七百七十萬海克脫秋麥田（蘇聯秋麥田的百分之二十）凍死的緣故。

倘若再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的總出產當做一百，那末，所得到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一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四；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總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一十。

這裏也應該注意一九二八年五穀總出產的減少，這是因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底秋麥凍死的緣故。

至於說到五穀總出產中的商品部分（鄉村外的流通），那末，我們見到更有意思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總出產的商品部分當做一百，那末，結果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商品生產等於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

三十六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而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三以上。

因此，結果就是耕田面積和五穀總生產方面，祇到一九三〇年才達到戰前的程度，並稍稍的超過了一些。

再就是，在五穀的商品生產方面，我們離戰前程度還遠得很，今年還要差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糧食缺乏的根源就在這裏，這在一九二八年尤其緊張。

五穀問題的基礎也就在這裏。

二，牧畜方面的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不過尤其使人驚訝。

倘若把一九一六年各種牲口的頭數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的情形就如下：一九二七年的馬匹，等於一九一六年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四點三，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點三，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三；一九二八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六，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八點五，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一；一九二九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五點六，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八，豬等於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馬等於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牛等於百分之八十九點一，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八十七點一，豬等於百分之六十點一。

你們看，倘若注意到最後的一年，那末，很明顯地我



們見到牧畜業有了開始縮小的表徵。

從牧畜業的商品生產上說來，尤其在肉和油類方面情形更使我們不安。倘若把每年肉和油的總出產當作一百，那末每年肉和油的商品生產，在一九二六年就等於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十九點二。

因此，我們見到牧畜業中小經濟和小商品性的經濟，帶着明顯的不堅定和經濟上不可靠的表徵。

結果，沒有超過一九一六年的牧畜業的程度，而最後一年倒有了很明顯的不斷減少的表徵。

因此，在我們已經大體上順利地解決了五穀問題之後，又擺着肉類問題，這個問題的緊張程度，現在已經表現出來了，這個問題正需要解決。

三，我們工業的原料植物的種植，就另是一種情形了。假定把一九一三年原料植物的耕種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我們就見到：在棉花方面，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一，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五十一點四，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七；麻的種植，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二點九，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糖蘿蔔，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二，一九二九

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八，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九；油類，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七十九點四，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二百三十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九點七，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六十以上。

原料植物的總出產同樣也有這樣好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的總生產當作一百，那末我們就有：棉花，在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點五，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二點八；麻，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七十一點六，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三；糖蘿蔔，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九點四；油類：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一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點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二百二十。

因此，在原料植物方面我們見到比較好一些的情形，這裏我們把一九二九年糖蘿蔔除外不算，因為那次收成被害蟲所損害了。

可是，就在原料植物方面，將來還有可能並必會發生嚴重的動搖和不穩定的表現，像已講過的麻和油類植物的數目字所表示的那樣，因為那裏小經濟佔優勢，而集體農

場和蘇維埃農場的影響很小。

因此，在鄉村經濟上在我們面前擺着下列的問題：

(一)鞏固原料植物的地位底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在那些區域有足量的賤價的糧食生產品。

(二)提高牧畜業和解決肉類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那些區內有充分的五穀產品和草料。

(三)澈底解決五穀問題，這是現在鄉村經濟的主要問題。

這樣看來，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中的基本問題，是解決一切其他問題的鑰匙。

因此，解決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的各種問題中的第一種任務。

但是解決五穀問題和引導鄉村經濟走上長足發展的道路——這就是根據消滅農村經濟的落後，供給它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他們科學工作人材，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出產量。沒有這些條件，就用不着夢想解決五穀問題。

以個人的小農經濟為基礎，是否能夠實現這些條件呢？不，不能夠。這是不能夠的，因為小農經濟不能使用和佔有新技術，不能夠充分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夠充分的增加鄉村經濟的商品生產量。留下來祇有一條路，這就是擴大農村經濟的路，設立那種具備有現代技術的大經濟的路。但是蘇維埃國家，不能夠走那種組織資本主義大經濟的道路。它可以而且祇應該着手組織社會主義式的大

經濟，應用現代的新技術。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就是這類的經濟。

因此就發生一種任務，設立蘇維埃農場，聯合小農經濟成爲大的集體農場，這是解決一般鄉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唯一的方法。

自從第十五次大會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了糧食的嚴重困難之後，黨就在日常實際工作中跑上了這條道路。

應該指出，我們黨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就把這種根本的任務提在面前當作實際上的任務，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遇到糧食的嚴重困難。在第十五次大會底著名的『關於鄉村中工作問題』的決議，很明白地說：

『在現在這個時期中，應該把聯合和改造個人小農經濟爲大的集體經濟，作爲黨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

把第十五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報告中論到這個問題的地方引證一下，也許算不得是多餘的事。那裏鄭重的、肯定的提出用集體化的方法消滅鄉村經濟落後的問題來。請聽那裏所說的話：

『出路在那裏，出路是把散漫的小經濟轉變爲共同耕田的大的聯合經濟，轉變爲用新式高級技術來集體耕田的經濟。出路就是要使小的和最小的經濟漸漸的、不屈不撓的、不是用壓刷的方法而是用證明和說服的方法聯合成爲公共的、聯合的、集體耕種的大經

濟，使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應用科學方法提高農業的強度旁的出路是沒有的。』

### 五 農民之轉向社會主義和蘇維埃

#### 農場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

農民的轉向集體化不是一下子開始的。這種轉變是不會一下子開始的。在第十五次大會時，黨的確已經喊出集體化的口號。但是要農民羣衆大批的轉向社會主義，僅僅喊出口號是不夠的。要達到這種轉變，至少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要農民羣衆自己相信所提出的口號是對的，接受它，當它是自己的口號。所以這種轉變是漸漸準備起來的。這種轉變的養成，是靠我們發展的全部過程，首先就是供給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的工業全部發展的過程。這種轉變的準備成功，是靠着堅決反對富農的政策和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二九年新式收買糧食工作的過程，因為這種形式是使富農經濟受貧農中農羣衆的監督。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鄉村經濟合作社的發展，這類合作社教育個人農民學會了集體的進行事業。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集體農場的發展，農民在那裏看出了集體式農場比個人經濟優越的地方。最後，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散處全蘇聯的、具備新技術的蘇維埃農場的發展，在那裏農民有可能認識了新技術的力量和優點。倘若認為我們蘇維埃農場祇是糧食的來源，那就錯了。實際上蘇維埃農場和它的新技術、它的空前的經濟規模對附近農民的幫助，都是一種引導的力量，

能促進農民羣衆的轉變，推動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

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幾百萬貧農中農的集體農場運動。這種運動是從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它在我們國家的生活中打開了偉大轉變的時期。

中央委員會用過什麼方法去全力的應付和領導這種運動呢？

中央委員會的方法，是由三方面進行的：組織和接濟蘇維埃農場，組織和接濟集體農場，組織製造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經過拖拉機器站、經過拖拉機隊等等，把機器供給鄉村。

一，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已經通過關於在三四年中組織新的蘇維埃農場的決議，要使這些蘇維埃農場，能够在三四年後出產一萬萬普特以上的商品糧食。後來這條決議經過中央全體會議批准。曾經創設了『五穀托拉斯』，委任這個托拉斯執行這條決議。同時，通過決議，鞏固蘇維埃農場，擴大他們的耕地。曾經組織了蘇維埃農場總局，委託它實行這條決議。

這裏不得不指出，這些決議是遇到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方面的反抗然後通過的。曾經有一種論調，說投到蘇維埃農場的款子是『丟掉了』的款子。還有一種『科學』家方面的說法，這種說法會得到黨內機會主義份子的擁護：說組織蘇維埃大農場是不可能和無意義。但是中央進行了自己的路綫，不顧一切的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二八年付出接濟蘇維埃農場的款子，除

流轉的短期借貸外，總共有六千五百七十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 付出了一萬萬八千五百八十萬盧布。最後，在今年付出了八萬萬五千六百二十萬盧布。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供給蘇維埃農場使用的拖拉機有一萬八千架，共等於三十五萬馬力。

這些辦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五穀托拉斯耕地的面積，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一十五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一百零六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有四百五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一——三二年將有九百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即五年計劃底將有一千四百萬海克脫。蘇維埃農場總局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四十三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八十六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是一百八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一——三二年是二百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將有二百五十萬海克脫。烏克蘭蘇維埃農場大聯合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十七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二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有五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將有七十二萬海克脫。糖業聯合的耕地面積（穀類的），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七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八十二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將有八十六萬海克脫，一九三一——三二年將有九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將有九十九萬海克脫。

第一，這就是說，祇一家五穀托拉斯，到五年計劃底

就將要等於現在整個阿根廷所有的五穀田的面積。（鼓掌聲）

第二，這就是說，把所有的蘇維埃農場合在一起，到五年計劃底，將要比現在整個加拿大所有的五穀田多一百萬海克脫。（鼓掌聲）

至於說到蘇維埃農場的五穀總出產和商品的生產，那末我們見到每年的變動如下：一九二七——二八年，蘇維埃農場的總生產有九百五十萬担，其中商品生產佔六百四十萬担；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一千二百八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七百八十萬担，一九二九——三〇年，照所有的統計，將有二千八百二十萬担，其中商品為一千八百萬担（等於一萬萬零八百萬普特）；一九三〇——三一年將有七千一百七十萬担，其中商品將佔六千一百萬担（三萬萬七千萬普特）。

這就是我們黨在蘇維埃農場政策上現有的和希望的成績。

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關於組織新蘇維埃農場的決議，我們在一九三一——三二年，應該從新蘇維埃農場得到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但實際上，一九三一——三二年中，祇從一種新的蘇維埃農場那裏，就已經可以取到二萬萬普特以上的糧食了。結果是超過計劃兩倍。

這樣一來，譏笑中央政治局底決議的人們，是自己狠狠地嘲笑自己了。

照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準的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



劃底，所有蘇維埃農場，總共應該有五百萬海克脫的耕田。可是實際上，今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田，就已經有三百八十萬海克脫，明年，即五年計劃第三年，將要有八百萬海克脫的耕田。

這就是說，我們將在三年內完成並超過蘇維埃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蘇維埃農場的五穀總生產應該有五千四百三十萬担。可是實際上，今年蘇維埃農場的五穀總生產就有二千八百二十萬担，而明年將有七千一百七十萬担。

這就是說，在五穀總生產方面，我們在三年內完成計劃而且超過計劃。

五年計劃三年完成。

現在讓資產階級的江湖客和它的機會主義的附和者去胡嚷吧，說什麼不能在三年內完成和超過蘇維埃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二，至於我們的集體農場建設的情形，還要好些。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已經關於集體農場建設通過了以下的決議：

『堅持的實行第十五次大會所提出的任務：「聯合和改造個人小農經濟爲大的集體經濟」；這種集體經濟，是自願的聯合，是根據新技術而建設的聯合，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方面和保證猛烈的提高生產率和商品量方面，都是代表高級的五穀經濟。』

（見一九二八年中央七月全會的決議：『論一般經濟狀況下的收買糧食的政策』）

後來，這條決議，得到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決議中的批准後，又得到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會關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決議中的批准。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正是農民根本轉向集體農場的時候，正是中農大批加入集體農場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就在那時候通過了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公佈的一個專門的決議：即論『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場建設的方法』的決議。

中央在這個決議中：

（一）認為農民現在確是大批的轉向集體農場了，可以在一九三〇年春季通過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二）認為確是存在着一切必須的物質條件和其他的條件，可以用集體農場的生產去替代富農的生產，因此必須從限制富農的政策變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三）指出一種前途，就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用社會化的方法來耕種的土地就要大大的超過三千萬海克脫；

（四）把蘇維埃分為三種區域，規定出每區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一種大概的時期；

（五）重新審查了土地營造的方法，使它有利於集體農場，重新審查了接濟鄉村經濟的形式，規定了一九三〇——三一年借給集體農場的信用借貸至少須有五萬萬盧布；

(六) 規定了組合式的集體農場運動，是現在集體農場系統中的基本形式；

(七) 責備了黨內機會主義份子，因為他們企圖藉口機器和拖拉機的缺乏去妨礙集體農場運動；

(八) 最後，曾預先警告黨的工作人員，預防集體農場運動中可能的過火行動，自上命令集體農場建設的危險，把集體化作為兒戲而不努力真正的大批集體化所引起的危險。

這裏應該指出，中央這次決議遇到黨內機會主義份子方面比不親善還要壞些的舉動。曾發生過『大談小論』，說中央被幻想所迷住了，中央把人民的金錢『浪費』到『不存在的』集體農場中去。右派份子洗了自己的手，預言『不免』塌台。但是中央堅決的進行了自己的路線，不顧右派份子愚蠢的嗤笑，不顧『左傾』份子的過火和昏頭昏腦，不顧一切的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二八年裏，支出了七千六百萬盧布去接濟集體農場；一九二八——二九年裏，交出了一萬萬七千萬盧布；最後，在今年，支出了四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此外，又支出了六千五百萬盧布作為集體化的基金。規定給集體農場的優待條件，這樣就使集體農場在財政上的積蓄增加了二萬萬盧布。把破壞了的富農經濟上的財產，大約價值四萬萬盧布以上，都交給了集體農場。三萬多架拖拉機，計有四千萬以上的馬力，交給集體農場的田地使用；還有拖拉機總局供給集體農場使用的七千架拖拉機，

蘇維埃農場用來幫助集體農場的拖拉機，都沒有算在裏面。今年曾借給和幫助集體農場一千萬担（六千一百萬普特）穀種。最後，又直接的在組織上幫助集體農場，成立機器馬匹站，這種機器馬匹站的數目現在已經有七千處以上，所使用的馬在一百三十萬匹以上。

這些辦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春耕的地面等於八十萬海克脫；一九二八年爲一百四十萬海克脫；一九二九年爲四百三十萬海克脫；一九三〇年，春秋兩季的耕種面積都算在內，不得少過三千六百萬海克脫。

第一，這就是說，在三年以內，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增加到四十倍以上。（鼓掌聲）

第二，這就是說，我們集體農場所有的耕地面積等於法意兩國合在一起那麼多了。（鼓掌聲）

至於說到他們五穀的總生產和商品量，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出產四百九十萬担，其中二百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八年出產八百四十萬担，其中三百六十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九年出產二千九百一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一千二百七十萬担；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出產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十五萬萬五千萬普特），其中商品將有八千二百萬担（五萬萬普特以上）。

應該承認，一般地說來，算是發展得十分快的工業，其中沒有一個部門發展的速度有過集體農場建設那樣快。

這些數目字表明什麼呢？

這首先表明，集體農場中五穀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加到五十倍以上，而商品量增加了四十倍以上。

第二，這是表明，我們今年能夠向集體農場取得全國五穀商品生產的一半以上。

第三，這是表明，從今以後，決定鄉村經濟和它的基本問題的命運的，不是個人農民的經濟而是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

第四，這是表明，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是開足馬力的前進。

最後，這是表明，國內已經發生了經濟的變動，使我們有完全的根據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已經把鄉村推上了新的道路，即推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因此，不僅是在城市裏，而且在鄉村裏也保證了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決議裏，規定到一九三〇年春季為止，根據社會化的方法耕種的集體農場的耕地計劃要有三千萬海克脫。但結果超過了中央的這個計劃。

結果，嘲笑中央決議的人們，自己却狠狠的嘲笑了自己。集體農場運動中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和過火，都救不了機會主義的胡喊。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應該等於二千零六十萬海克脫。但是在實際上，集體農場今年的耕地面積已經有三千六百萬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的一倍半以上。（鼓掌聲）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五穀的總生產應該有一萬萬九千零五十萬担。但是實際上，今年集體農場五穀的總生產，已經有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五穀生產的五年計劃百分之三十以上。

五年計劃兩年完成。（鼓掌聲）

現在讓機會主義份子去胡嚷，說兩年以內不能夠完成和超過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 六 改良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由此可見，工業和農業方面社會化部份積極的增加，是一件無可懷疑的事實。

從勞動者的物質條件說來，這可以說是什麼呢？

這就是說，從此就放下了根本改良工農物質條件的基礎。

爲什麼？怎樣的？

第一，社會化部份的增長，首先就是表明城市和鄉村中剝削份子的減少和他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底低落。這又是說，工農在全國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必然因了剝削階級份數的減少而增加起來。

第二，因爲在社會化部份增長的時候，一向供養剝削階級和它的僕人們的那部分國民收入，從此以後就必將留

在生產內，用來擴大生產，建築新工廠，改良勞動者的生活。這又是說，工人階級的數目和力量，又要增加，失業必將減少和消滅。

最後，因為社會化部分的增長能促進改良工人階級的條件，所以這就使國內市場購買力積極的提高，使工農對於工業品的要求增加，這又是說，國內市場的擴大將要趕過工業的發展，推動它前進，督促它不斷的擴大。

所有這類的情形，都能使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不斷的改良。

一，開始先講工人階級人數的增加和失業工人的減少。

倘若僱傭勞動者的數量（除失業者外）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等於一千零九十九萬人，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就有一千一百四十五萬六千人，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一千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有一千三百十二萬九千人。其中體力勞動者（連鄉村經濟工人和季候工人在內），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是七百零六萬九千人，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七百四十萬四千人，一九二八——二九年裏是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三〇年是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人。其中大工業中的工人（除職員外），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為二百四十三萬九千人，一九二七——二八年為二百六十三萬二千人，一九二八——二九年為二百八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三〇年為三百零二萬九千人。

這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情形是工人階級不斷的増加，再，假使僱傭勞動人數的百分數在三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五，而體力勞動的人數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七，那末，產業工人增加的百分數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現在講失業問題。我們應該說，在這方面，人民勞動委員部和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都有很多莫明其妙的地方。一方面，根據這些機關的統計，我們大約有一百萬的失業者，其中有最低限度的熟練程度的佔百分之十四點三，還有大約百分之七十三是所謂知識勞動者和不熟練勞動者，而且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未成年的人，他們與工業生產都是沒有關係的。另一方面，根據同樣的統計，我們看到熟練勞動力可怕的缺乏，勞動介紹所不能滿足我們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底百分之八十，因此我們不得不很快的、真正是飛快的訓練完全沒有技能的人們，從他們中間養成熟練的工人，這樣去滿足我們企業中最低限度的要求。試一試解釋這種莫明其妙的情形。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這些失業者，並不是後備軍，更不是我們產業中的經常失業軍。這是什麼呢？甚至按照人民勞動委員部的統計，近來失業工人的數目，比去年也要減少了七十萬人以上。這就是說，到今年五月一日止，失業工人數目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還有一個成績。

二，倘若站在按階級分配國民收入的觀點上來考察情



形，結果還要動人。站在工農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的觀點上來說，按階級分配國民收入的問題是一切根本的問題。德、英、美等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爲着資產階級的利益盡量想模糊這個問題，爲着這個，他們才公佈關於這個問題的什麼『完全客觀的』研究。

照全德統計局的統計，工資在德國國民收入內所佔的份數，在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七十，而資產階級的收入佔百分之三十。照『聯合商務委員會』和『全國經濟調查部』的統計，工人在美國國民收入內所佔的部分，在一九二三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四，而資本家的份數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最後，照經濟學家波立和斯頓勃的統計，英國工人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在一九二四年，差不多要等於百分之五十，而資本家的份數佔百分之五十(多一些)。

很明顯的，這些調查的結果是不足信的。它們不足信，是因爲除純粹經濟上的差錯外，在這些調查中，還有另一種錯誤，他們的目的是局部的隱瞞資本家的收入，少說一些；同時，又局部的誇大工人階級的收入，把薪水很大的官僚，都算做工人。此外，在這些調查中往往不計算農戶的收入，不計算一般的鄉村資本家的收入。這一點我已經不去講他了。

法爾格用批評的態度分析了這些統計。他得到下列的結果。工人和城市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其他勞動者底收入，在德國是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美國是佔百分之五十四，英國是佔百分之四十五；資本家的份數，德國

是佔百分之四十五，美國是佔百分之四十六，英國是佔百分之五十五。

最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就是這樣。

蘇聯內的情形是怎樣呢？

你們看國家計劃局的統計。請看：

(一) 工人和不剝削人家勞動的勞動者底收入份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點二（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一九二八——二九年，為百分之七十六點五（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九二九——三〇年，為百分之七十七點一（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二) 富農和城市資本家，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八點一；一九二八——二九年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一點八。

(三) 手藝人（大部份是勞動份子）的份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八——二九年佔百分之五點四，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四點四。

(四) 國家部份的份數（也是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的收入），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八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佔百分之十；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十五點二。

(五) 最後，所謂其他各項（指一切的卹金）的份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一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佔百分之一點六；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

之一點五。

因此，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剝削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大約要佔百分之五十，而在我們國家中，剝削階級的份數佔不到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

這也就可以說明一件驚人的事實：照美國資產階級作者鄧尼的話，一九二二年美國『百分之一的私有者，在自己的掌握中集中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五十九』；照鄧尼的話，英國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不到百分之二的私有者佔有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六十四』。（見鄧尼著的『美國戰勝英國』）

在蘇聯，在蘇維埃國家裏，能不能夠發生同樣的事實呢？當然是不能夠的。蘇聯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私有者』了，並且是不會有這樣的私有者。

但是，倘若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蘇聯總共大約祇有百分之二的國民收入落到剝削階級方面去，那末餘下來的國民收入到那裏去了呢？

很明顯的，這是留在工農掌握中的。

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幾千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中間所有的力量和威權的根源。

這就是蘇聯工農物質幸福繼續改良的根源。

三，既有了這些重要的事實，就非常容易瞭解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的增加，工人社會保險預算案的增加，對

---

★ 實際工資，就是根據工資所能夠買到的生活品的數目來計算。假定實際工資增加，那末工人的生活就好了 —— 譯者

貧農中農經濟幫助的加緊，建築工人住所的款子的增加，改良工人生活的用款的增加，保護產母和嬰兒的費用的增加，同時也更容易瞭解蘇聯人口很快的增加，死亡率減少，尤其是嬰兒死亡率的減少等等的事實了。

大家都知道，譬如工人的實際工資，連社會保險費和利潤上扣下來作為改良工人生活的基金在內，已經增加到戰前百分之一百六十七了。最近三年來，僅僅工人社會保險金的預算，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九萬萬八千萬盧布，到一九二九——三〇年裏，便增加到了十四萬萬盧布。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為保護產母和嬰兒化了四萬萬九千四百萬盧布。在同一時期內，化在兒童入學年齡前的教育上的（幼稚園、兒童遊戲場等等）計有二萬萬零四百萬盧布。化在建築工人住所上的計有十八萬萬八千萬盧布。

這當然不是說，凡是努力的增加實際工資所應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到了，再也不能把實際工資提得更高些了。但倘若真沒有做到的地方，那末，這就是我們一般供給機關中官僚主義的過錯，首先特別是消費合作社的官僚主義。照國家計劃局的統計，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國內貿易的社會化部分，經理着百分之九十九的批發和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的零賣。這就是說，消費合作社有系統的排擠私人部份，在貿易方面，站了壟斷的地位。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所不好的，是有的時候，這種壟斷是有害於消費者的。原來商業上雖然差不多是站了壟斷的地位，可是消費合作

社總願意把『收入』較多的、利潤較多的商品（時髦貨等等）去供給工人，不去把『收入』較少而為工人所更需要的商品供給工人（農業品等等）。因此，佔工人所消費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鄉村經濟產品，工人就不得不出高價向私人的市場去購買。這我還可以說到，消費合作社機關總是多注意於收支的差額，因此，中心的領導機關方面雖然下了嚴厲的指令，可是零賣價格的減低還是很慢。結果，消費合作社的活動，在現在的時候不像一個社會主義的部門，而像傳染了相當新資本家習氣的特別部門。試問，倘若消費合作社不執行嚴格的改良工人實際工資的任務，誰要這種消費合作社呢，它對於工人有什麼好處呢？

倘若雖然有上述的情形可是實際工資還是年年不斷的增加，那末，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國民收入的分配機關，工資方面的整個立場，都能削弱和抵償合作社方面各式各樣的缺點。

假使除此以外再加上許多其他的條件，譬如像公共飯廳作用的提高、工人住所的減價、給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大量津貼、文化設備的改良等等，那末，可以很勇敢的說，工人工資的增加，比我們有些機關的統計所提出的要多得多。

所有這些事實，合在一起，加上八十三萬以上產業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點五）的七小時工作制，加上一百五十萬以上產業工人（百分之六十三點四）的轉為五天工作周，加上廣大的工人休養所、養病所、避暑處的制度（最

近三年來曾派去了一百七十多萬工人），所有這些設備爲工人階級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好的條件，使我們能够養成下一代健康的、活潑的工人，能够把蘇維埃國家的能力提高到應有的高度，用自己的胸膛來擁護它，使它不受敵人的進攻。（鼓掌聲）

至於說到給個人農民和集體農民的幫助，連幫助貧農在內，那末，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它的數目是等於四十萬萬盧布，都是由信用借貸和國家預算中支出的。大家都知道，僅僅這三年來，就幫助了農民一萬萬五千四百萬盧布以上的穀種。

所以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工農一般的生活並不壞，人口死亡率比戰前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兒童死亡率比戰前減少百分之四十二點五，而每年人口的增加有三百萬人以上。（鼓掌聲）

至於說到工農的文化條件，那末，這方面我們也得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絕對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爲成績並不大。倘若拋開各種各樣的俱樂部、閱書室、圖書館、識字處等等在今年所吸引的一千零五十萬人不算外，那末文化教育情形就是如下：初級學校今年有一千一百六十三萬學生；中學校有一百九十四萬五千人；工業技術學校、交通學校、農業學校、羣衆生產技能養成所共有三十三萬三千一百人；各種技術專門學校和同等的職工學校共有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人；大學校和技術大學共有十九萬零四百人。

因為有這些設備，所以戰前識字者祇佔百分之三十，而現在便增到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六。

現在主要的事情，就是採用義務的初級教育。我說這是『主要的』，因為這樣的轉變是文化革命的緊要步驟。而轉變到這種制度很早就該幹的，因為現在我們在蘇聯最大多數的區裏，有了實行普及初級教育所必需的一切條件。一向我們必須『到處節省，甚至於節省學校』以『拯救和恢復重工業』。（列寧）可是近來，我們已經恢復了重工業並且繼續前進。因此，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已經應該着手組織普及的初級義務教育了。

我想，如果大會關於這點能通過一定的極堅決的決議，這是很正確的。（鼓掌聲）

## 七 發展中的困難，階級鬭爭和社會主義

### 在整個戰綫上的進攻

我已經講過我們國民經濟中發展的成績了。我已經講過工業方面，農業方面，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全部國民經濟方面的成績。我還講過改良工農物質條件方面的成績。

倘若有人以為，我們是『很容易很平安』的得到這些成績的，是所謂自流的，毫無特別努力和意志緊張、毫無鬭爭和震動就得了這些成績，那就錯了。這樣的成績不會自己跑來的。實際上，我們是堅決的向困難作鬭爭，是在嚴重的、長期的征服困難的鬭爭中，才得到了這些成績。

這裏誰都講到我們的困難。但是不是誰都顧計到了這

些困難的性質。可是困難的問題對於我們有很大的意義。

這裏就發生問題：我們困難的特點是什麼，這些困難後藏着那些敵人的力量並怎樣的來克服他們呢？

一，在說明我們困難的時候，應該至少注意到下列情形。

第一，應該估計到，現在我們的困難，是改造時期的困難。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這些困難根本和我們經濟的恢復時代中的困難不同。倘若在恢復時期中，問題是在使舊工廠工作和在舊基礎上幫助鄉村經濟，那末，現在的問題是根本重造、改造工業農業，更換它們的技術基礎，供給它們現代的技術。這就是說，我們面前擺着改造國民經濟全部技術基礎的任務。這種任務，又需要新的、大批的投資到國民經濟中去，需要新的更有經驗的人材，能够指揮新技術，推動它前進。

第二，應該注意，改造國民經濟不限於改良它的技術基礎，恰好相反，同時還需要改造社會經濟底關係。我這所講的，主要的是講鄉村經濟。已經聯合起來了的社會化了的工業中，技術的改造大體上算已經有了現成的社會經濟基礎。改造的任務，就是加緊在工業中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過程。鄉村經濟中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簡單。改造鄉村經濟的技術基礎，當然也是爲着同樣的目的。但是，我們鄉村經濟的特點，在於那裏還多半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不能夠佔有新技術，因此，改造農村經濟技術基礎而不同時改造舊社會經濟制度，不聯合小經濟爲大集體經濟，



不掘除鄉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根源，那就是不可能的。很明顯的，這些情形不會不使我們的困難更加複雜，不會不使我們戰勝這些困難的工作更加複雜。

第三，應該注意到，我們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已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聯繫，顛覆了舊世界的一切力量，就必然引起這些力量拚命的反抗。大家都知道，實在就是這樣。上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我們工業各部門中的陰險的危害行爲，富農像野豬般反對鄉村中集體式的經濟，各機關中官僚份子（是階級敵人的奸細）對蘇維埃政權各種命令的怠工，——這就是現在我們國內的臨死階級底反抗的主要形式。很明顯的，這些環境不能使我們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輕易的進行。

第四，應該注意到，我們國內底臨死階級的反抗，不是和外界隔絕的，它是受周圍資本主義世界所援助的。周圍資本主義世界並不是簡單地理論上的觀念。周圍資本主義世界——這就是說，在蘇聯的周圍有仇視的階級敵人，準備着在精神上、在物質上用財政封鎖的方法，有的時候甚至於用武裝干涉的方法來援助我們蘇聯內部的階級敵人。現在已經證實，我們底專門家的危害行爲，富農的反蘇維埃行動，焚燒和炸毀我們的企業和設備，都是得到國外津貼的，都是由外國所指使的。帝國主義的世界，不願意蘇聯站定脚跟，能够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這樣，它們就幫助蘇聯國內的舊勢力。很明顯的，這當然也是不會促進我國的改造工作的。

但倘若不注意另一件事情，那末，我們困難的特點，是不會完全明瞭的。問題是在說到我們困難的特性。問題是在說，我們底困難不是衰落中的困難或者停滯中的困難，而是發展中的困難，高漲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是根本和資本主義中的困難不同。當我們講到美國的困難時，講的是衰落中的困難，因為美國現在遇到恐慌，即經濟的衰落。當我們講到英國的困難時，講的是停滯中的困難，因為英國現在已經有幾年的停滯，即停止前進。當我們講到我們的困難時，我們講的不是衰落，不是發展的停滯，而是我們力量的增長，我們力量的高漲，我們經濟的往前進展。到某時期能前進幾多，能多製造出百分之幾的產品，能多耕種幾百萬海克脫土地，能早幾星期造成工廠、製造廠、鐵路等等，——這就是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的問題。因此，我們的困難和美國或英國的困難不同，是發展中的困難，是前進時的困難。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是本身包含着戰勝困難的可能性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困難的特點就在於它們本身帶着戰勝困難的基礎。

由此可以得到些什麼結論呢？

第一，我們的困難不是細小的和偶然的『麻煩』，而是階級鬭爭的困難。

第二，在我們困難後面隱藏着我們的階級敵人，這些困難，又因為我們國內的臨死階級的拚命反抗，國外對這些階級的援助，我們自己機關中存在着官僚主義份子，我

們黨內有些份子的不信任和遲疑而更複雜起來。

第三，爲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退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壓服他們的反抗，這樣去肅清道路，飛步的前進。

最後就是，我們發展上的困難的性質給了我們壓服階級敵人所以必須的一切可能。

但是爲要利用這些可能，把他們變成行動來壓服階級敵人的反抗，克服困難，那祇有一種方法：組織由各面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隔絕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份子，因爲他們妨害進攻，手忙腳亂的東奔西竄，將不相信勝利的思想引到黨裏來。（鼓掌聲）

沒有其他的方法。

祇有丟了腦袋的人們，才會從布哈林的資本主義份子能和平底生長入社會主義的幼稚的公式中去找出路。我們的發展，却不是照布哈林的公式前進的。我們的發展是照列寧的『誰勝誰』的公式前進的。我們戰勝他們剝削者，壓服他們，還是他們戰勝我們蘇聯的工農，壓迫我們，——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社會主義向各方面組織進攻——這就是在發展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工作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擺着的任務。

黨正好是這樣的瞭解自己的任務，實行進攻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份子。

二，但是，一般說來，在存在着新經濟政策的條件

下，是不是准許進攻，尤其是可否向各方面進攻呢？

有些人以為，進攻和新經濟政策是不能並立的，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退守，不久退守已終結了，新經濟政策當然應該撤消。這當然是傻話。這種傻話或者是從託洛茨基主義者方面說出來的，他們什麼列寧主義都沒有懂得，以為『一下子』就可以『取消』新經濟政策；或者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話，他們也是一點列寧主義不懂，胡嚷『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危險』，想為自己放棄進攻來講一講價。倘若新經濟政策祇是退守，那末，列寧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在澈底進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不會說『退守完結了』。列寧說退守完結的時候，難道他同時沒有說過我們將『嚴格的長期的』進行新經濟政策嗎？祇要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懂得胡嚷新經濟政策和進攻不能並存的話怎樣的無聊了。實際上，新經濟政策不僅要退守，要允許私人貿易復興，在國家的調節作用的保證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復興起來（新經濟政策的開始階段）。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在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同時便促進社會主義進攻資本主義份子，要縮小私人貿易的活動範圍，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資本主義份子，社會化部份的繼續超過非社會化部份，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的現在階段）。新經濟政策，是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份子而採用的。我們轉向各方面進攻，還沒有取消新經濟政策，因為私人貿易和資本主義份子還存在，商品流轉和貨幣經濟還存在，但是我們一定要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初期，發展它的下一個階

段，現在的階段，也就是新經濟政策最後的階段。

列寧在採用新經濟政策後一年，在一九二二年曾經說過下面一段話：

『我們現在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幹法，爲的是開始是後退以後再奔跑起來，和更有勁的向前跳躍。祇有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們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中向後退了。我們現在應該在什麼地方並且怎樣改排隊伍，適應，改組，以便退守以後，開始更勇猛的向前進攻——這我們還不知道。要順次序的實行所有這些動作，就應該不祇幾十次的而是幾百次的測量，然後再決定。』（『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一〇三頁）

大概清楚了吧。

現在有一個問題：轉入進攻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了，進攻的時期是否成熟了呢？

列寧一九二二年就在另一個地方說：

『聯合農民羣衆，聯合尋常的勞動農民，開始不可思議的、無邊的、比我們夢想還要慢些的前進，但是要全體羣衆真正的和我們一起前進』……『那時候，這種運動的加速，到了一定時候就發生，它的速度也將是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二九——三〇頁）

現在還是這個問題：這種加速運動，這種加緊我們發展的速度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選擇時期，在一九

二九年下半期開始向各方面作堅決的進攻，這是不是正確呢？

對於這個問題，黨已經給了明確的答覆。

是的，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了。

是的，黨所選擇的開始向各方面進攻的時期是正確的。

證明這一點，有工人階級積極性的繼續提高，在幾千百萬勞動羣衆中間，黨的威信空前的增加。

證明這一點的，有貧農中農羣衆積極性的提高，這些羣衆的根本轉向集體農場建設。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現在不僅能夠用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而且能夠超過它幾倍。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已經能夠大體上解決了五穀問題，積聚了一定糧食儲蓄，把穀類商品生產的重心，從個人生產方面轉到了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方面。

這些證據，證明黨正確的選定了向各方面進攻和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的時機。

倘若我們聽信了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倘若放棄了進攻，顛覆了工業發展的速度，阻礙了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發展，依靠個人的鄉村經濟，那末結果怎樣呢？

我們就一定破壞了我們的工業，葬送了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的事業，落得沒有糧食，並替富農肅清了道路。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倘若我們聽信了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派『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話，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開始了進攻的

火綫，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一點兒的可能去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那末，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大概已經在這方面破了產，表示了我們自己的軟弱，加強了富農和一般資本主義份子的地盤，把中農推入了富農的懷抱中，打翻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落得沒有糧食。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結果是一樣。

怪不得我們工人說：『向「左」去，就走到右邊來。』（鼓掌聲）

有些同志們以為，社會主義進攻中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壓力，倘若壓力不加緊，那就是沒有進攻。

這對不對呢？這當然不對。

壓力是進攻的必要份子，但這是輔助的份子，而不是主要的份子。在現在的條件之下，社會主義進攻中最主要的，就是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加緊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發展的速度，加緊在經濟上排擠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速度，發動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發動羣衆反對資本主義。你們可以拘捕和流放幾萬或幾十萬的富農，但是，倘若你們同時不用盡一切的方法去加緊建設新式的經濟，去用新的經濟形式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去剷除和消滅他們生產的根源，使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在經濟上不能生存和發展，那末，富農還是要重新產生出來、長大起來的。

另一些人以為社會主義進攻是一種無顧忌的前進，用不着相當的準備，用不着在進攻過程中重新配置各種力

量，用不着鞏固奪到的地盤，用不着利用積蓄來擴充勝利，而且如果有部分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那末，這就是說我們已遇到『革命的退潮』，運動的低落，進攻的停止。

這是對不對的呢？這當然是不對的。

第一，沒有一種進攻，無論它是怎樣的順利，會沒有某條戰綫上的破陣和陷陣的。根據這點而說進攻停止或進攻失陷，這就是不懂得進攻的實質。

第二，在進攻過程中不重新配置力量，不鞏固奪到的地盤，不利用積蓄來擴張勝利，不澈底進攻，那末這種進攻是從來不曾而且也不會勝利的。毫無顧忌的進攻，這就是說，不遵守這些條件，進攻必然要化爲烏有和失敗。我們國內戰爭的豐富經驗都證明了這點。

第三，『革命的退潮』往往因爲運動的低落而發生；但現在，是在運動繼續高漲的時候，是在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和集體農場繼續興旺的時候，是在我們革命繼續發展的時候，而有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在這兩件事情之間，怎樣能有什麼相像的地方呢？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表徵之間，怎樣能有共同之點？

二，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進攻的本質是什麼呢？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首先就是發動羣衆的注意力和革命的積極性去反對我國的資本主義份子；發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去反對我們機關和企業中的官僚主義，因爲他們埋沒許多後備軍，把他們隱藏在我們制度的中心



裏，不讓他出來應用；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羣衆的勞動熱潮，去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張社會主義建設。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第二，就是着手改造職工會、合作社、蘇維埃和一切其他羣衆組織的全部實際工作，使它適合改造時代的需要；在那裏造成最積極、最革命的工作人員的中堅份子，排擠和隔絕機會主義份子、職工主義份子、官僚主義份子；剷出其中異己和蛻化份子，自下提拔新的工作人員。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還有就是盡量的收集款子去接濟我們工業，接濟我們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派送我們黨的最好的人們去擴張這種事業。

最後，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就是發動黨的本身，去組織全部進攻事業；鞏固和整頓黨的組織，趕走那裏的官僚主義份子和蛻化的現象；隔絕和排擠脫離列寧黨路綫的『左』右派的說客，提拔真正的堅定的列寧主義者到上面去做工。

這就是現在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基礎。

黨怎樣的實行這種計劃。

你們知道，黨是最堅決的實現這種計劃的。

開始是黨推展廣大的自我批評，集中羣衆的注意力去注意我們建設的缺點，注意我們組織和企業的缺點。第十五次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了加緊自我批評的必要。一方面，煤礦事件和各部門工業中的危害行爲發覺了各級黨部的沒有革命感覺。另一方面，與富農的鬭爭揭穿了我們鄉村組

織的缺點，——這兩種現象，繼續的推動了自我批評。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通告裏，澈底的形成了自我批評的運動，號召全黨和工人階級底一切力量來發展自我批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顧什麼面子』。黨攆斥了那些站在巷戰防壘對面的、企圖破壞和削弱蘇維埃政權的託洛茨基派的『批評』，並宣告無情的揭破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以改造我們底建設，以鞏固蘇維埃政權，作為自我批評的任務。大家都知道，黨的號召引起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非常活潑的回音。

此外，黨組織廣大的運動去反對官僚主義，提出實行清洗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底組織除去異己份子和官僚化的份子。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的決議，決定提拔工人階級到國家機關內做工，決定大批工人監督蘇維埃機關（工廠的輔助），就是這種運動的繼續。大家都知道，這種運動，引起了工人羣衆偉大的興奮和積極性。這種運動的結果，就是黨在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偉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對黨信仰的增加，成千成萬的工人加入共產黨，整間和整廠的工人決然願意加入黨。最後，這種運動的結果，就是肅清了我們組織內一切暮氣沉沉的份子和官僚份子，解除了蘇聯職工中央委員會中舊的機會主義領導。

黨又組織了廣大的社會主義競賽，工廠中羣衆勞動的熱潮。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關於競賽的宣言，把工作推上了正軌。模範隊更推着它繼續前進。列寧共產青年團所

領導的青年工人，在競賽上和模範隊運動上得到很多的勝利。我們應該承認，我們革命的青年，在這方面，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懷疑，各工廠的社會主義競賽，幾十萬工人關於社會主義競賽所得到的成績的互相報告，互相號召，模範隊運動廣大的發展，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實，那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事實之一。祇有瞎子，才看不到羣衆心理上和對勞動的態度上已經起了一種根本的改變了我們工廠的面目。在不久以前，還有人喊出競賽和變化，模範隊運動的『杜撰』和『不中用』。現在這些『聰明人』，甚至於引不起人家的一顧了，大家都當他們是上世紀的『聰明人』了。現在競賽和模範隊運動的事業，是奪到了的和鞏固了的事業。社會主義競賽吸收了二百萬以上的工人，加入模範隊的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這是事實。

競賽的好處，就是競賽在人們對待勞動的觀點上造成一種根本的轉變，因為它使勞動從以前認為是卑鄙的煩重的重擔變為榮耀、光榮、英勇和勇敢的事業。在資本家那裏，人們所最希望的，最受社會讚揚的，就是有地租，依靠利息過生活，不作被輕視的勞動。在我們蘇聯，正好相反，最希望的，最受社會所讚揚的事情，就是能夠成為勞動的英雄，能夠成為模範隊運動的英勇，能夠在幾千百萬勞動羣衆中被崇敬的最高榮譽。

在競賽中還有一件事情可以算是一樣可以注意的，就是競賽開始在鄉村中散佈起來，已經蔓延到蘇維埃農場和

集體農場。大家都知道，在幾百萬蘇維埃農場農民和集體農民羣衆中間真正的勞動熱情的事實。

誰能够在二年前夢想競賽和模範隊運動有這樣的勝利呢？

黨又收集了全國的財源去發展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事業，供給蘇維埃農場最好的組織者，幫助集體農場二萬五千工人，提拔集體農民中最好的去領導集體農場，設立集體農民補習學校，因此，安置下了基礎，好去養成堅定的、老練的集體農場運動的人材。

最後，黨改造了自己的隊伍，改編成同行軍一樣的嚴整，改編了報紙，進行兩條戰綫的鬭爭，搗毀托洛茨基派的餘孽，當頭打碎了右傾份子，隔絕了調和派，因此就保證了順利進攻所必須的條件，即黨的隊伍在列寧路綫的基礎上的一致，和對進攻工作的實際正確的領導，拿住了並且設法處理了集體農民運動方面右派營壘中的漸進派人們和『左』傾份子。

這就是黨的基本辦法，用來實行向各方面進攻的。

大家都知道，這種進攻在我們工作中各方面都得到了勝利。

我們能够克服我們國民經濟改造時代中許多困難的原因，也就是在這裏。

我們能够勝利的戰勝我們建設中的最大困難，基本農民羣衆轉向社會主義方面的困難，其原因也在這裏。

外國人有的時候問到蘇聯國內的情形。蘇聯國內情形

是堅固的，不動搖的，這難道還可以懷疑嗎？你們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看一看這些國家裏恐慌和失業的增加，看一看罷工和歇業，看一看反政府的示威，——在這些國家內的情形和蘇聯的國內情形，有什麼地方可以比較呢？

我們應該承認，蘇維埃政權是現在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政權中最堅固的政權。（鼓掌聲）

## 八 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

因此，我們已經看到了蘇聯國內情形的全景。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情形。

無意中就發生一個問題：倘若把兩種國家相互對比起來，把這兩種景象比較起來，結果是怎樣呢？

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有趣，就是因為各國的資產階級行動家，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報紙，從公開的資產階級報紙一直到孟塞維克托洛茨基派為止，都異口同聲的呼喊資本主義的『興旺』，蘇聯的『滅亡』，蘇聯『財政上和經濟上的破產』等等的話。

這樣，分析我們蘇聯的情形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指出主要的、大家都知道的幾件事實。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工業和農業中都有經濟恐慌和生產衰落。

在我們蘇聯，國民經濟的各種部門中，都是經濟的高漲和生產的發展。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勞動者物質條件惡化，工人工資減低，失業工人增加。

在我們蘇聯，勞動者物質條件提高，工人工資增加，失業工人減少。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罷工和示威的數目增加，因此就喪失幾千百萬的工作日。

在我們蘇聯，沒有罷工，工農勞動熱情高漲，給我們的建設以數千百萬額外的工作日。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國內形勢緊張，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運動繼續高漲。

在我們蘇聯，國內地位鞏固，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民族問題緊張起來，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菲列濱羣島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天天的高漲，變成民族戰爭。

在我們蘇聯，民族親善的基礎鞏固起來，保證民族的和平，團結蘇聯各民族幾千百萬羣衆在蘇維埃政權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驚惶失措，並且情形還有繼續惡化的前途。

在我們蘇聯，相信自己的力量，情形有繼續改良的前途。

人們胡喊蘇聯的『滅亡』，資本主義國家的『興旺』等等。那些『意料不到的』，忽然落在經濟恐慌的漩渦裏而還不能夠脫離一落千丈的危險的那些國家，就必然的

要滅亡，——這樣說法不是更正確些嗎？

他們資本家那裏嚴重的失敗和我們蘇聯嚴重的勝利，這些原因究竟在那裏呢？

人們說，國民經濟的局面與資本的多少很有關係。這當然是對的。資本的缺乏，是不是能夠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資本多餘，是不是能夠說明我們蘇聯的興旺呢？不，當然不能。誰都知道，蘇聯的資本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得多。假使這裏問題是靠積累的情形來決定，那末，我們應該是恐慌，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是興旺了。

人們說，經濟情形要看經濟人材在技術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來決定。這當然是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是不是可以由技術人材的缺乏來說明，蘇聯的興旺是不是可以用技術人材的多餘來解釋呢？不，當然不能。誰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熟練的技術人材，比我們蘇聯要多得多了。我們從來沒有隱瞞過，而且也不預備隱瞞，在技術方面，我們是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首先，最主要的就是美國人的學生。不，雖然人材問題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多的意義，但這個問題，不是靠技術人材的多餘或缺乏來決定的。

也許問題的解答，是在我們文化程度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吧？又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羣衆的一般文化程度，比美國、英國和德國等等要低。不，雖然文化程度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很嚴重的影響，但問題不在乎羣衆文化程度。

也許原因是在乎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吧？

又不對，恐慌是和資本主義統治的進攻同時產生的。資本主義定期的經濟恐慌，已經發生了一世紀多，每過十二年、十年或八年重複一次。資本主義的一切政黨，資本主義的一切多少有名的行動家，從最有『天才的』起，一直到最普通的為止，試用過全部的精力去『預防』或『消滅』恐慌。但是，他們都失敗了。胡佛★和他的黨徒也失敗了，這有什麼奇怪呢？不，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裏有很大的意義，但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

那末，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蘇聯雖然文化落後，資本缺乏，技術上鍛鍊過的經濟人材的缺少，可是，經濟還是處在繼續發展的狀態；在經濟建設方面有重大的勝利；而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雖然資本多餘，技術人材多餘，文化程度比較要高，可是，還是處在繼續加緊的經濟恐慌情形之下，在經濟發展方面敗了一陣又一陣——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是在乎我們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同。

原因在乎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不中用。

原因是在乎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比較起來，有他的優點。

什麼叫做蘇維埃經濟制度呢？

蘇維埃經濟制度就是：

（一）資產階級的政權已經被推翻，由工人階級的政

---

★ 胡佛是美國的現任總統。



權來替代；

(二) 生產工具、土地、工廠、製造廠等等，從資本家那裏奪下來，轉交給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佔有；

(三) 生產的發展不受競爭的原則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所支配，而受有計劃的指導和有系統的提高勞動者物質條件和文化程度的原則所支配；

(四)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要使剝削階級和他們許多的寄生蟲發財，而是爲有系統的提高工農的物質地位和擴大城市和鄉村中社會主義的生產；

(五) 有系統的改良勞動者的物質條件，他們需要（尤其是購買力）的增加（是擴大生產的經常增加的根源）担保工人階級不遭受生產過剩的恐慌和失業者增加等等的苦痛。

(六) 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爲資本家而做工，而是爲本階級做工。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制度呢？

(一) 國家的政權是屬於資本家的；

(二) 生產工具是集中在剝削者手中；

(三) 生產不是受改良勞動羣衆的物質條件的原則所支配而是受担保資本主義高度利潤的原則所支配；

(四)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爲改良勞動者的物質地位而是保證剝削者的高度利潤；

(五) 資本主義合理化和生產很快的發展，目的爲的是担保資本家高度的利潤，這樣就遇到障礙，遇到千百萬

勞動羣衆窮苦的境地和物質保證的減少，他們往往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甚至最低限度的需要都不能滿足，這樣就必然立刻的產生生產過剩的恐慌，失業者的增加等等；

（六）工人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他們不是爲自己而做工，是爲另一個階級即剝削階級來做工。

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組織比較起來，就有這些優點。

我們蘇聯羣衆消費（購買力）的增加，總是趕過生產的擴張，推動生產前進；在資本家那裏，情形恰恰相反，羣衆消費（購買力）的增加，總是趕不上生產的擴張，總是落在後面，這樣就使生產轉入恐慌。原因就在這裏。

在資本家那裏，在恐慌時候，消滅商品的『剩餘』，燒燬農產品的『多餘』，以維持高價和保證高度利潤；而在蘇聯，犯這樣罪的人，就送他到瘋人院裏去了。（鼓掌聲）原因就在這裏。

在資本家那裏，工人罷工，示威，組織革命鬭爭，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政權；而在我們蘇聯，我們見到幾千萬工農偉大的勞動競賽，預備用自己的胸膛去保護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國內情形的穩固堅定，資本主義國內情形的不穩固和動搖，它的原因就在這裏。

我們應該承認，不知道那裏去安放生產的『多餘』，而不得不在羣衆窮困和失業的時候去燒燬『多餘』的那種經濟制度，應當自己替自己定死罪。

最近幾年是實際試驗的時期，是蘇維埃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考試的時期。在這幾年來，蘇維埃制度『滅亡』和『破產』的預言，已經是說得太充分了。資本主義『興旺』的論調和讚美，還要多些。怎麼呢？這幾年却更重複的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不中用的制度，蘇維埃經濟制度則有許多的優點，這些優點，無論是那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不論是最『民主的』也好，最『全民的』也好，以及其他的也好，都不敢夢想的。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聯共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說：

『現在我們用自己的經濟政策作為促進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大家都注意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上各國的勞動者，毫無例外的，毫無誇大的，都注意蘇俄。這一點，已經達到了。資本家既不能不作聲，又不能掩蓋，因此，他們就最注意我們的經濟錯誤和我們的弱點。在這方面，鬭爭轉移到全世界上去了。我們解決了這種任務，那末，我們大概就徹底的在全世界上得到了勝利。』（『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二八二頁）

我們應該承認，列寧所提出的任務我們黨已經很順利地完成了。

## 九 目前的任務

### A 一般的

一，首先就是在蘇聯正確地分佈工業的問題。無論我

們怎樣的發展國民經濟，但要不正確的分佈國民經濟中各主要部門的工業是不行的。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民經濟，主要的是依靠烏克蘭的煤礦和五金工業的基礎。很明顯的，沒有這種基礎，是不能使國家工業化的。我們烏克蘭的燃料和五金基礎，就是這樣的基礎。可是祇這一個基礎，將來是不是能夠滿足蘇聯南部、中部、北部、東北部、遠東、土耳其斯坦的需要呢？所有的材料都告訴我們，這是不能夠的。我們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這個基礎對於我們已經是不夠了。新的工作就是盡量的發展這個基礎，同時，即刻開始創造第二個石煤五金的基礎。烏拉爾·苦慈聶茨的『康平納脫』（大聯合）就是這種基礎，它把苦慈聶茨的焦煤和烏拉爾的鐵礦聯合起來。（鼓掌聲）尼日聶建造汽車廠，却亮平斯克建造拖拉機廠，斯維得洛夫斯克在設立機器製造廠，沙拉託夫和新西伯利亞設立『康拜因』廠；西伯利亞和哥薩克斯坦有色金屬業的發展，需要在東方設立修理機器的工場和主要的五金工廠；最後，決定在新西比司克和土耳其斯坦建造紡織工廠，——因為這些情形，所以急切需要立刻着手進行在烏拉爾組織第二個石煤五金基礎。

你們都知道，我們黨的中央，對於烏拉爾五金工廠的問題，就是根據這種精神在決議裏決定的。

二，再，就是在蘇聯正確的分佈鄉村經濟基本部門的問題，照農作物的種類和部門而使我們各州專門化的問題。很明顯的，在小農經濟之下，嚴格的實行專門化是不

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小經濟是不穩固的經濟，沒有必需的積蓄，不得不在自己田上分種各種各樣的植物，爲的是如果在一種植物上受了損傷，還可以從別的植物上得着補償。大家也都很明白，在國家掌握中，倘若沒有相當穀類的積蓄，那就不能做專門化的工作。現在，當我們轉到大經濟和在國家掌握中有了穀類的積蓄的時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正確的按照植物和部門實行專門化的任務來。而澈底的解決五穀問題，却是這種工作的起點。我說這是『起點』，因為不解決五穀問題和在畜牧區、棉花區、油區、蔬區和煙草區設立糧棧，那就不能夠把牧畜業和原料植物的耕種向前推進，就不能保證在我們各州裏按植物種類和部門來實行專門化。

這裏的任務是要利用一切已經開闢的可能性，推動這件工作前進。

三，還有工農業中的幹部人材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經濟幹部人材、我們的專門家、技術家、經濟工作人員等底技術準備的薄弱。又因爲一部份專門家和從前的主人發生關係，受國外的慫恿，領導賊害事業，因此問題就複雜了。問題又因爲另外一個原因就弄得尤其複雜了。這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作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在這方面不表示他底革命警備心，時常成爲賊害份子精神上的俘虜。可是在我們面前，擺着偉大的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任務，需要大批新的人材來指揮新的技術。因此，我們的人材問題，就變成真正最可注意的問題了。

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用的下列的辦法：（一）堅決地與賊害分子奮鬥；（二）極端注意和機警的去對一切與賊害分子無關的最大多數的專門家、技術家（我們說的不是烏斯特略洛夫一類的花言巧語、賊頭狗腦的東西，我說的是真正科學人材，和工人階級一心一意做工，不賣弄『鬼聰明』的人們）；（三）組織國外來的技術幫助；（四）派送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到外國去學習和學到技術經驗；（五）把技術學校轉交給相當的經濟機關，為的是從工人階級中間最快的養成足量的技術家和專門家。

這裏的任務，就是推廣這種工作，實現這些辦法。

四，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就是官僚主義埋沒了隱藏在我們系統中的無數可能，不利用他們，企圖把羣衆的創造性化爲烏有，關在事務房裏，使黨的每種新的發端都變成細小無聊的的貪慾。第二，官僚主義的危險，就是官僚主義經不起關於執行情形的審查，它企圖把領導機關的主要指示變成紙上的、和實際生活完全脫離關係的空話。不僅那些鑽在我們機關中的舊官僚是有危險的，而新的官僚份子、蘇維埃的官僚份子也是危險的，並且比舊官僚更危險。至於在蘇維埃官僚中間，『共產黨員』的官僚份子還起很大的作用。我說的是有些『共產黨員』，他們用辦公處的命令、『吩咐』（他們相信這些東西的力量，好像相信偶像一樣）的方法，去代替幾千萬工農羣衆的創造性和自動性。

這裏的任務，就是打倒我們機關中和組織中的官僚主

義，消滅官僚主義的『道德』和『習慣』，肅清道路，好去利用我們系統中的可能，發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

這種任務並不容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倘若我們想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真正改造我們國家，那末，我們無論如何需要把它解決。

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中，黨的工作向四方面進行：發展自我批評，審查各種工作執行的程度，清洗機關，從工人階級中自下提拔忠實的工作人員到機關中去。

這裏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實行這些辦法。

五，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倘若不在工農業中有系統的提高勞動生產率，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改造的任務，我們不但是不能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而且甚至於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存在。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對於我們有頭等意義。

黨在這個問題解決方面的辦法，是向三方面進行的：有系統的改良勞動者的物質條件，在工業和鄉村經濟企業中確定同志式的勞動紀律，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模範隊運動。所有這些辦法，都要依靠技術的改良和合理的組織勞動。

這裏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張羣衆運動去實行這些辦法。

六，供給問題。這是關於充分的供給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必需商品的問題，合作社機關適應工農需要的問題，有系統的增加工人實際工資的問題，降低工業品和農業品

價格的問題。關於合作社的缺點，我已經講過了。必須消滅這些缺點，實行降低價格的政策。至於說到商品的缺乏（商品饑荒），那末，我們現在可以擴充很堅固的輕工業的基礎，推進羣衆消費品的生產。糧食的供給可以算是已經有了保障。肉類、牛奶製造品和菜蔬的供給比較困難些。可惜這種困難不能在幾個月之內消滅它。爲要戰勝這種困難，至少必須一年。一年以後，因爲有了特別組織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我們就能够完全保證肉、牛奶製造品和菜蔬的供給。當我們在自己的掌握中，已經有了糧食的積蓄、紡織品、加緊工人住屋的建築、廉價的市政設備的時候，再去解決其他的貨品供給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去調理決定工人預算和工人實際工資的一切基本原素。這就是要澈底的保證工人實際工資迅速的增加。

這裏的任務，就是在這方面發展我們一切組織底工作。

七，信用借貸和貨幣流通問題。合理的組織信用借貸事業，正確的處置貨幣積蓄，這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很嚴重的意義。黨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按兩方面進行的：在國家銀行中集中一切短期借款，在社會部分中組織不用現款的支付。因此，第一，國家銀行變成計算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全國機關；第二，從流通中即閑出許多錢。毫無疑義的，這些辦法會促進（現在已經促進了）全部信用借貸事業的就緒，鞏固我們的『切爾逢涅赤』★。

★ 『切爾逢涅赤』等於十個盧布，蘇維埃新金本位的單位。



八，積蓄問題。我們已經講過好幾次，現在用不着再來重複了，一般的國家，尤其是我們的國家，不能夠沒有積蓄的。我們在糧食、商品、現金方面都有相當的積蓄。我們的同志們現在可以感覺到這些積蓄的好作用了。但是，『相當的』積蓄，對於我們是不足用的。我們在各方面都需要更結實的積蓄。

### B 工業方面

一，主要的問題，就是加緊發展鋼鐵業。你們要注意，祇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我們才達到了戰前產鐵的程度和超過它。對於全部國民經濟，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爲要消滅這種危險，應該着手加緊的發展鋼鐵業。到五年計劃底，我們不是應該像這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那樣，祇有一千萬噸鐵，而是應該有一千七百萬噸。倘若我們願想認真的發展我們國家工業化的事業，那末我們無論如何應該完成這種任務。

布爾塞維克應該表示他們是能夠應付這種任務的。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該拋棄輕工業。不，不是這樣說。至今我們到處節省，其中也節省了輕工業，爲的是要恢復重工業。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恢復了重工業。現在祇要繼續向前發展就好了。現在我們可以注意輕工業，加速度的推動它前進。我們工業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我們現在能夠加速的同時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今年超過了耕種棉花、麻和糖蘿蔔底計劃，順利的解決了『根頭兒』★和人造絲的問題，——這都是證明我們能夠真正的推

進輕工業。

二，合·理·化·、·減·低·成·本·費·、·改·良·生·產·品·質·量·的·問·題。在合理化方面的破綻，降低成本費方面的虧空，許多企業中生產品質量的惡劣，是再不能忍耐了。這些虧空和缺點，到處箝制我們的國民經濟，不讓它前進。早已到了結束這些可恥的污點的時候了。

布爾塞維克應該表示他們是能夠應付這種任務的。

三，專責制的問題。在各企業中，破壞實行專責制的情形也是受不了的。工人呢，却在發怨言說：『工廠裏沒有做主的』，『工作中沒有秩序』。再也不能忍耐使我們的企業從生產機關變為國會了。最後，我們黨和工會機關，應該懂得，沒有專責制，不嚴格地規定誰對工作負責，我們就不能夠解決改造工業的任務。

### C 農村經濟方面

一，牧畜和原料植物問題。現在，當我們已經能夠根本解決五穀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開始解決牧畜問題（這在現在真正迫切的問題），同時也可以開始解決原料植物的問題了。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照着解決五穀問題的方向做去。這就是說，用組織蘇維埃農場的方法（這是我們政策的基本點），逐漸改造現在小農牧畜和小農原料植物的技術基礎和經濟基礎。『牧牛業』，『牧羊業』，『養豬業』，『牛油牛奶託拉斯』，加上牧畜業集

---

★ 『根頭兒』是藤的一種，產在中亞細亞。

體農場原料植物方面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這就是解決當前問題的出發點。

二，繼續發展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建設的問題。用不着申說，這個問題是我們全部鄉村建設中的頭等問題。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到，農民根本的從舊制度轉向了新制度，從富農的奴役轉向了自由的集體農場底生活。再也不會回復到舊制度去了。富農的命運是必被消滅。留下來祇有一條路，集體農場的道路。集體農場的道路已經不是馬馬虎虎的東西。它們已經由農民羣衆自己千百次地試驗過和審查過了。試驗過和審查過，當它是新的東西，它能夠解放農民脫離富農的奴役，不至於貧乏，反能脫離黑暗。我們的成績就在這裏。

鄉村中的新運動將怎樣的繼續發展下去呢？蘇維埃農場繼續的前進，它是改造農村中舊制度的主要骨幹。許多的集體農場繼續的前進，它是改造農村中舊制度的主要骨幹。許多的集體農場，就好像農村中新運動的根據地，跟在蘇維埃農場後面前進。這兩種系統底統一的工作，造成了蘇聯各州完全集體化的條件。

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可注意的成績之一，就是它能夠從農民自身中間，順利的提出成千的集體農場的組織者和成萬的集體農場的鼓動者。現在已經不祇是我們熟練的布爾塞維克，而是集體農場中的農民自己，集體農場事業的成千萬的農民組織者和鼓動者來掌着集體化的旗幟前進。而農民的鼓動者是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好的鼓動者，因為他們

找得到特別的說法，使其他農民羣衆容易懂得，容易接受，這是我們熟練的布爾塞維克所夢想不到的。

有些地方喊出必須放棄統盤集體化的聲音來。這裏有材料，證明甚至於我們黨內也有這種『思想』的同情者。但是，祇有不自覺地或自覺地和共產主義底敵人打成一氣的人們，才能說這樣的話。統盤集體化的方法是必要的方法，沒有這種方法就不能夠完成全蘇聯各州集體化的五年計劃。若想不叛賣共產主義以及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利益，怎樣可以放棄這種方法呢？

這當然不是說，在集體農場運動方面，什麼都是『平安的』和『舒適的』。集體農場內部還要動搖。加入和退出還要發生。但是，這不能也不應該激怒集體農場運動的建設者。這更不能夠算是集體農場運動強大發展上的嚴重阻礙。像集體農場運動那樣健全的運動，當然是無論如何，不顧任何的和各別阻礙困難，總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的。

這裏的任務就是，準備力量，安排事業，使集體農場運動繼續發展。

三，使各機關盡量地接近各區和各鄉的問題。毫無疑義的，倘若我們不實行分區，我們是不能夠舉行改造鄉村經濟和發展集體農場運動底偉大工作的。擴大各鎮，把它改變爲區，消滅省，把它變爲比較小的單位（府），最後，成立州，作爲中央直接的根據地。這是分區的總形勢。分區的目的，就是使黨、蘇維埃、經濟機關和合作社

機關接近區和鄉，使它們能夠按時的解決鄉村經濟中、它的發展中、它的改造中的緊急問題。再說一遍，在這方面，分區對於我們全部建設有很大的幫助。

要使各機關真正的接近，認真的接近各區和各鄉，在這方面是不是已經什麼都做到了呢？不，還沒有都做到。現在集體農場建設的重心轉到區的組織去了。從這裏發出集體農場和鄉村中一切其他經濟工作的綫索，無論是合作社方面，蘇維埃方面，信用借貸機關方面，收買方面，都是這樣。

我們是否充分供給了必須的、必要的工作人員給各區的組織來舉行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工作呢？毫無疑義的，供給他們的工作人員是太不充分了。但有些什麼辦法呢？爲要改正這些缺點，保證各區組織內我們各部門工作中得有足量的必要工作人員，應該做些什麼呢？現在應該做兩件事情：（一）取消府，（鼓掌聲）它變了州和區之間沒有用處的中間物，從府裏解放出來的工作人員，用去加緊各區的工作；（二）各區組織直接和州（和邊疆委員會、民族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這就是澈底實行分區，澈底實行使各機關接近各區和各鄉。

在我說到取消府的前途的時候，大家鼓了掌。府當然應該取消。但是以爲因此我們便可以嘲笑府，好像有位同志在『真理報』上所幹的那樣，那就錯了。不應該忘掉，省區曾經負過很偉大的工作，起過很大的作用。（鼓掌聲）我們以爲過分着急地取消府，也是錯的。中央委員會

通過決議取消府。但中央委員會並不是以為這件事情應該立刻舉行。很明白的，在取消府之前應該進行必須的準備工作。

#### D 運輸方面

最後就是運輸的問題，用不着詳細來說運輸對於全部國民經濟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並且不僅對於國民經濟。大家都知道，運輸對於國防上也有很大的意義。運輸的意義雖然重大，可是運輸業以及運輸業的改造，還是落在一般發展速度的後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有一種危險，就是會把運輸變成國民經濟中的『窄路』，能够妨礙我們的前進，——這還需要證明嗎？還沒有到結束這種現象的時候嗎？

河上運輸的情形特別壞。事實是：伏爾加河輪船的運行，差不多不能達到戰前的百分之六十，第列泊爾河上達到百分之四十。達到戰前百分之六十和四十，這就是河上運輸所能寫入它的『成績』表上的東西。不必說，這是很大的『成績』。不是到了消滅這種可恥情形的時候嗎？（呼聲：『到了！』）

最後，這裏的任務就是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進行運輸業，推動它前進。

這就是黨的當前任務。

實行這些任務，需要些什麼呢？

首先，主要的，需要繼續在整個戰綫上發展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澈底進攻到底。

我們政策的中心點和基礎就在這裏。（鼓掌聲）

### 三 黨的問題

現在就來講黨的問題。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蘇維埃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多有的許多優點。已經說過在爲社會主義完滿勝利而鬭爭的事業中，蘇維埃制度給我們以莫大的可能。已經說過，如果沒有這些可能或不去利用這些可能，那我們是不能在過去時期中得到上述的各種成功的。

現在就發生一個問題：蘇維埃制度所給我們的一些可能，黨曾正確的利用了嗎？黨沒有把這些可能隱藏起來，以至妨礙了工人階級把自己全部的革命力量來發展到底嗎？黨曾由這些可能中，拿出一切力量來以擴大各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嗎？

蘇維埃制度給我們以莫大的可能，使社會主義能完全勝利。但可能還不是實際。要把可能變成實際，必須許多條件，這些條件中，黨的路綫和正確的執行這個路綫的作用是不小的。

舉幾個例子來說。

右傾機會主義者肯定的說，新經濟政策是保證我們社會主義勝利的——所以，可以不顧慮工業化的步驟，可以不顧慮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等等發展的步驟，因爲勝利的到來，反正是有了保證的，即是有了所謂『自流』的保

證。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而且是蠢笨的。假使這樣說法，那就是否認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否認黨對於這種建設所負的責任。列寧從來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社會主義的勝利。列寧祇說過，『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但是，可能還不是實際。要使可能變成實際，必須首先拋棄『自流』的理論，必須改造國民經濟，並向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作堅決的進攻。

右傾機會主義者肯定的說，在我們的制度中，沒有使工人階級與農民分裂的基礎——所以，可以不顧慮對鄉村各社會部份規定正確的政策，因為反正富農自己會生長到社會主義，而工人與農民的聯合，將『自流』的有保證。這也是不正確而蠢笨的。祇有不瞭解黨的政策（掌握政權的黨的政策）是決定工農聯合命運主要關鍵的人，才能這樣說；但列寧從來沒有認為工人階級與農民分裂的危險是完全沒有的。列寧曾經說，『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沒有隱藏着這種分裂的必然的基礎』，但是『如果在這些階級的相互之間發生着嚴重的階級上的糾紛時，那末，分裂將成爲不可避免的』。因此，列寧曾認為：

『我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全黨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留心考察各種能够產生分裂的情況，並提防這些情況，因為我們共和國的命運，畢竟是要看農民羣衆是否和工人階級一同走，保持與工人階級忠實的聯合，或者，還是讓新興資產階級去把自



己和工人們分離，和工人們分裂。』

所以，工人階級和農民兩者間的分裂，不是完全不會有的，但是這種分裂也不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在我們的制度中，埋伏着預防這個分裂，且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的可能。要使這種可能變成實際需要些什麼呢？爲要使預防分裂的可能變成實際，必須首先埋葬『自流』的理論，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根源，組織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且由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這樣看起來，必須把我們制度中所有的可能以及對於這些可能的利用，把這些可能變成實際，——這兩件事嚴格的分開。

這樣看來，很可以發生這樣的情形，就是勝利的可能是有的，但是黨看不見這些可能，或者是不會正確的利用這些可能，結果不能勝利而至於失敗。

還是那個問題：黨曾經正確的利用了蘇維埃制度所給我們的可能和優點嗎？黨曾經作了一切的工作，使這些可能變成爲實際，去保證我們建設事業的最大限度的成功嗎。

換句話說，黨和它的中央委員會，在過去時期中，是否正確的領導了社會主義建設呢？

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下，黨的領導怎樣才是正確的領導呢？

要使黨的領導是正確的領導，除其他一切外，必須黨

的路綫是正確的，必須羣衆瞭解黨的路綫的正確性，而且他們積極的擁護這條路綫，必須黨不僅祇規定正確的總路綫，而要它天天去領導這條路綫的實行，必須黨堅決的與脫離黨路綫的各種傾向和調和派作鬭爭，黨在這個反傾向的鬭爭中，必須能使自己的隊伍一致，並造成鐵的紀律。

黨和它的中央委員會爲了要實現這些條件，做了些什麼呢？

### 一 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一，黨在現在時期的根本立場，就是由經濟建設陣地上的各單個區域的進攻，轉變到整個戰綫上的總進攻，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村經濟方面，都是如此。第十四次大會，主要是工業化的大會，第十五次大會，主要是農業集體化的大會。這都是整個戰綫上總進攻的準備。第十六次大會的前一時期與過去的各階段底不同，是在於這個時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是在工業方面與農業方面加緊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第十六次大會，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綫上擴大進攻的大會，是消滅富農階級並實行統盤集體化的大會。

簡略說來，本黨總路綫的實質就是這樣的。

這條路綫正確不正確呢？

正確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黨的總路綫是唯一正確的路綫。（鼓掌聲）

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功與成績，就能證明這一點。不能說黨在過去的時期中，在城市和鄉村中社會主義

建設上所得的堅決的勝利，是一種不正確的政策的结果；這是從來沒有過，且是不能有的事。祇有正確的總路綫才能給我們這樣大的勝利。

近來我們的階級敵人、資本家和他的出版物、各式各樣的教師及神父、社會民主黨及『俄國』的孟塞維克阿布拉莫維支及但茵一流的人物，對於我黨政策的狂吠也是證明這一點。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既謾謗我們的黨，那就是說我們黨的總路綫是正確的。（鼓掌聲）

現在大家所知道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命運，也是證明這一點。托洛茨基營壘中的老爺們，曾經大叫蘇維埃政權的『墮落』，大叫『齊米圖爾』，大叫托洛茨基主義『必然勝利』等等。而事實上怎樣呢？事實上是托洛茨基主義破產了，完結了。你們都知道，一部分托洛茨基派已經在自己的許多申明書中宣佈了與托洛茨基主義脫離關係，宣佈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革命性。而另外一部份托洛茨基派，真正墮落成了標本式的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者，成了資產階級言論界上關於蘇聯共產黨各種問題的問事處。至於蘇維埃政權呢？按托洛茨基派的『預言』，本來應當『墮落的』（或者是已經『墮落了』），但是事實上，它却繼續的鞏固，建設社會主義，且順利的打破國內的資本主義份子和他的的小資產階級式的捧台脚的人。

現在大家所知道的右派的命運，也是證明這一點的。這班人曾經大叫黨的路綫底『倒台』，大叫蘇聯的『要破產』，大叫必須把國家從黨和它的領導底手裏『救出來』

等等的話。而事實上怎樣呢？事實上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都得到了莫大的成功，而右派這部份人，本來是想要『救』國的，後來却承認了自己的觀點錯誤，現在正坐在淺水灘上不能動作。

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日益高漲的革命積極性，千百萬勞動羣衆積極的擁護黨的政策以及工人和集體農場那種空前的、使蘇聯敵人和朋友都驚嘆不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精神，也都是證明本黨的路綫的正確。我且不說到工人羣衆對於黨的信仰之增高的事實，比方整個『一間』、一工廠的工人請求入黨，自第十五次大會到第十六次大會的期間內，黨員的數目增加了六十多萬人，僅就本年第一季中來說，入黨的就有二十萬人。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這些事實是說：數百萬的羣衆都覺悟到了我們黨的政策是正確的。

必須承認，假使我們黨的總路綫不是唯一的、正確的路綫，那就不會有這些事實了。

二，但是黨不能僅祇去規定正確的總路綫，它還應當每天去檢查這條總路綫在事實上的實行。它應當領導總路綫的實行，在工作的行程中去改良而且完成已經決定的經濟建設計劃，改正並提防錯誤。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於這件工作是怎樣做法呢？

中央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是使步驟加速，時期縮短，去改正並確定五年經濟計劃，檢查各經濟機關對於已經規定的計劃實行的情形。

現在拿中央委員會關於改正五年經濟計劃，使得建設加緊和執行時期縮短的幾個主要決議案來看看。

在黑色金屬方面：五年計劃祇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鐵的生產額為一千萬噸；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上認為這個數量是不夠的，且決定在五年計劃最後的一年中，鐵的生產應該達到一千七百萬噸。

在拖拉機的製造方面：五年計劃祇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使拖拉機的生產件數達到五萬五千；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却認為這個計劃是不夠的，且決定拖拉機在五年計劃最後一年中的生產件數應當達到十七萬。

在汽車製造一方面也是這樣，原定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祇生產十萬架汽車（運貨車和輕便汽車合計），而中央委員會決定在這一年內要生產二十萬架。

在有色金屬方面也有過同樣的現象，在這裏曾把五年計劃的原定增大了百分之百。農村機器製造方面，也同樣的把五年計劃的原定增大了百分之一百以上。

至於康拜因（割打機）的生產，是五年計劃中所完全未計算到的，這種機器，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至少要生產四萬架。

在蘇維埃農場的建設方面：五年計劃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末了時候，耕種面積擴大到五百萬海克脫；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却認為這個數量是不夠的，且決定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到五年計劃末了的時候要擴大到一千八百萬海克脫。

在集體農場的建設方面：五年計劃預備在五年計劃末了的時候，把耕種面積擴大到二千萬海克脫；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却認為這個數量太不夠了（祇就今年說就已經超過了這個數量），並決定在五年計劃末了的時候，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大體上應該結束，而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到這時候應該達到蘇聯全部耕種土地十分之九，而這些土地現在是由個人農民耕種的。（鼓掌聲）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舉出很多。

這就是中央委員會領導實行黨的總路線，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事業的一般情形。

或許有人說，中央委員會把原定的五年計劃變更得這麼大，這就是破壞計劃上的原則，削弱計劃機關的威信。但是祇有毫無希望了的官僚才能這樣說。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呢，五年計劃不是什麼一成不變和永不更改的東西；五年計劃對於我們，是像各種計劃一樣的，大體上規定了，但是根據地方上的經驗，根據實行計劃的經驗，必須使它精確，必須變更，必須完成。任何五年計劃也不能預先計算到我們制度中所包含的各種可能性，不能預先計劃到工作過程中，在工廠、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以及各區域中實行計劃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祇有官僚主義者才能這樣來想計劃上的事情，以為祇要計劃一經製定，工作便完結了。不知製定計劃僅祇是計劃事業的開始。真正對計劃的領導，僅是在計劃製定後，在各地方上把計劃實際審查後，在計劃實行和更正後才擴展的。

所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會同計劃機關，曾經認為必須根據經驗，在提高建設步驟和縮短執行時期一點上更正並改良五年計劃。

列寧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在討論國家電氣化的十年計劃時，關於計劃原則和計劃事業的領導，曾經這樣說：

『我們黨的政綱，不能祇是黨的一種政綱。這個政綱應該成爲我們在經濟建設上的政綱，如若不然，它就不能成爲黨的政綱了。這個政綱應該拿黨的第二政綱來補充，應該拿再造整個國民經濟工作和使這種經濟達到現代技術程度的計劃來補充…結果，我們應該採取一種相當的計劃。這種計劃，在通過的時候當然祇是大體上的一種規定。我們黨的這個政綱，不能和我們黨的真正政綱一樣，祇有在黨的大會上才可以變更。不是的，這個政綱，將在每一天、每一個工廠、每一縣去加以改良、加以審定，完成而且變更…應當留心地面上的科學與實際的經驗，要使計劃比原定時期更快的實行，以便羣衆能夠看見工業完全恢復的時期是可由經驗來縮短的。這件事要倚靠我們。我們大家來在每個工廠、每個火車修理場、每一部門把經濟改良起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時間縮短。而且我們已經在這裏縮短時間了。』（『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四二三——四二七頁）

這樣，你們就知道中央委員會更改並改良五年計劃，

縮短時期，提高建設的速度，是按着列寧指示的道路作去的。

中央委員會提高建設速度縮短五年計劃執行時期的時候，是依據什麼可能呢？它是依據我們制度中所包含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是在工作過程中才顯露出來的；它是依據改造時期所給我們的可能。中央委員會認為工業和農業技術基礎的改造，在生產的社會主義組織之下，給我們以很多的可能，使建設速度的提高成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夢想不到的。

祇有用這些條件，才能解釋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的生產量在最近三年來增加了兩倍以上的這件事實，而在一九三〇——三一年中，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量與今年相比較，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且同時，僅祇這個增加的數量就將等於戰前全部大工業的生產量。

祇有用這些條件，才能解釋蘇維埃農場的建設在三年內要超過五年計劃，而集體農場的建設已經在兩年內超過了五年計劃等等的事實。

有一種理論，說迅速的發展祇有在經濟的恢復時期內是可以的，而一經轉變改造時期，建設的步驟便應當一年一年的大加減低。這種理論是叫作『發展綫日益下降』的理論。這種理論，是一種以我們的落後來辯護的理論。它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理論，是要鞏固我們國家的落後性的。在過去與現在和我們黨有關係的人們的中間，祇有托洛茨基派、說



不定還有右派是主張並且宣傳這種理論的。

有一種意見，把托洛茨基派看成是一種超工業化派。但這種意見祇有一部份是正確的。祇是在恢復時期終結時候的問題上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候的托洛茨基派，的確主張過一種超工業化的空想。至於改造時期呢？在建設的速度上，托洛茨基派是一種極端的最小限度派和極偷懶的投降派。（全場大笑、鼓掌聲）托洛茨基派在自己的政見上和宣言上沒有拿出關於發展的速度和數目字的計劃來，他們祇唱了一些關於速度的空調。但是在一個文件中，托洛茨基派曾經拿數目計劃來敘述他們對於國家工業發展步驟的瞭解。我所指的是國家工業『恢復固定資本特別會議』上根據托洛茨基主義原則所寫成的一個報告。我們現在對於這個一九二五——二六年的文件不妨說幾句話，因為它完全可以表示出托洛茨基派的『發展綫日益下降』的理論。

根據這個文件，預定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投資於國家工業十五萬萬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為十四萬萬九千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為十三萬萬二千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為十萬萬零六千萬盧布（按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價格）。

這就是托洛茨基派的『發展綫日益下降』的情形。

而事實上，我們投了多少資本呢？事實上，我們投於國家工業的資本，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為十萬萬六千五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為十三萬萬四百萬盧布；

一九二八——二九年爲十八萬萬一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四十七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按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價格）。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的發展綫日益上升的情形。

根據這個文件，國家工業的生產量，在一九二六——二七年裏應該增加百分之三一點六；在一九二七——二八年裏應該增加百分之二二點九；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裏應該增加百分之十五點五；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應該增加百分之十五。

這就是托洛茨基派的『發展綫日益下降』的情形。

而事實上是怎樣的呢？事實上，工業生產量在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一九點七；在一九二七——二八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二六點三；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二四點三；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而在一九三〇——三一年裏，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的發展綫日益上升的情形。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曾在他的『向社會主義走還是向資本主義走』一書中，專門擁護那種發展綫日益下降的投降理論。他在這本書中直接了當的說，因爲『戰前工業的發展大體上是在於建築新的工廠』，而『在我們這時候，工業的發展在於比以前更多利用舊的工廠，使舊有的機器開滿工』，所以『自然，在恢復時期的過程完結的時候，發展的百分數要大大的減低』，同時，他主張『在最

近的幾年中，把工業發展的係數提高得比戰前的百分之六不僅祇大二倍，而且要大三倍，甚或大三倍以上』。

這樣，每年的工業發展便是三乘百分之六。每年一共要發展多大呢？每年一共是增加百分之十八。因此，按托洛茨基派的意見，國家工業生產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八，是改造時期中發展步驟加速的最高限度，應該把這個最高限度看成一種理想事業，力求達到其實現。試把托洛茨基派的這個『高明』理想拿出和我們最近三年中生產量實際上的增加（一九二七——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六點三；一九二八——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四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相比較，試把托洛茨基派的這種投降哲學拿來和國家計劃局對於一九三〇——三一年所預定的工業生產量增加的數目——百分之四十七（這種增加，大過於恢復時期中生產量增高的最大速度）相比較，那我們便能充分的看出托洛茨基派『發展綫日益下降』論的全部反動性了，便能看出托洛茨基派對於改造時期的可能性之相信是如何的深刻了。

這就是托洛茨基派現在和我們的右派沒有分別的地方。

毫無疑義的，我們假使不把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發展綫日益下降』論打得粉碎，那我們便不能擴大真正的計劃工作，便不能提高速度和縮短建設時期。爲要領導實行黨的總路綫，爲要更正並改良五年計劃的建設計劃，爲要提高速度並預防建設上的錯誤，必須首先打毀而且肅清

『發展綫日益下降』的反動學說。

中央委員會就是按我以上所說的進行的。

## 二 領導黨內生活的問題

或許有人想，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和實行黨總的路綫的工作，在黨內是平安無事，無須鬪爭和無須有緊張的意志的。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們的工作是在與黨內的各種困難作鬪爭，是在於與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問題方面各種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作鬪爭的。我們的黨，不是在一種沒有空氣的空間生存着和行動着的。它是在極複雜的生活中生存和行動的，因此就受着周圍環境的影響。而我們的環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種階級和社會集團所形成的。我們已經向資本主義份子作廣大的進攻，我們已經使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大步前進，我們已經擴大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建設。但是這些現象對於剝削者的階級不能一點影響沒有。這些現象通常引起苟延殘喘的資產階級破產，引起鄉村富農破產，引起城市各小資產階層的行動地盤縮小。凡此一切，都毫無疑義的不能不使階級鬪爭緊張，不能不使正在過着最後生活的階級加緊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假使認為這些階級的反抗不能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得着某種反應，那就是笑話。事實上，這種反抗，確是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取得了自己的反應。我們黨的隊伍中的各種離開列寧主義路綫的傾向，就是剝削階級反抗我們所生出來的反應。

要和階級敵人作勝利的鬪爭，是否可以同時不反對我

們黨裏的各種傾向、不打毀這些傾向呢？不可以的。因為假使在黨內有階級敵人的反應，假使在後方有不相信我們的事件並且千方百計要阻礙我們前進的人們，那我們便不能和階級敵人作真正的鬭爭。

因此，和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作鬭爭是黨的目前任務之一。

爲什麼右傾是現在黨內主要的危險呢？因爲右傾反映着富農的危險，而富農的危險在現在這時候，在擴大進攻和肅清資本主義根源的時候，是國內的根本危險。

爲了要打毀右傾，消滅『左傾』，肅清道路，使黨能盡可能的團結在列寧主義路線的周圍，中央委員會應該怎樣辦呢？

一，首先就應該結束黨內的托洛茨基主義殘餘，肅清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遺毒。我們把托洛茨基派已經是好久就打得落花流水了，驅逐了，它已經不成爲我們黨的反對派了。現在的托洛茨基派是反無產階級的和反蘇維埃的反革命派，他們拚命的把我們黨的事情告訴資產階級。但是托洛茨基理論的殘餘，托洛茨基主義的遺毒，却是還沒有完全從黨裏消滅。所以首先就要消滅這種遺毒。

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托洛茨基主義的實際，首先就在於它否認我們蘇維埃國內工人階級和農民用自己底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這是怎麼說法？這就是說，假使在最近的將來，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來幫助，那我們就應該對資產階級投降，爲資

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讓開道路。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否認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理論，不過有世界革命勝利等『革命的』詞句來掩蓋罷了。在這樣一種見解之下，能不能夠動員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起來作社會主義競賽，起來用模範隊的方法生產，起來作廣大的進攻以反對資本主義的分子呢？很明顯地，是不能夠的。假若以爲我們工人階級幹過了三次革命，還會爲着資本主義打基礎而去作社會主義競賽和用模範隊的方法生產，那是最蠢笨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勞動情緒所以這樣高漲，不是爲的資本主義而是爲的要在蘇聯完全埋葬資本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假使把我們工人階級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信仰力除掉，那就是消滅競賽、勞動情緒底高漲以及模範隊等等的基礎。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要提高工人階級的勞動情緒而發展社會主義競賽，並組織廣大的進攻，便首先就要埋葬託洛茨基派說在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理論。

托洛茨基主義的實際，其次就在於它否認吸引農民中的根本羣衆參加鄉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這是怎麼說法？這就是說，工人階級沒有能力領導農民，去使農民的個人經濟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就是說，假使在最近將來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來幫助工人階級，農民便要恢復資產階級的制度。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有力量和能夠領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不過有世界革命勝利等『革命的』詞句來掩蓋罷了。在這種見解之下，能不

能够動員農民羣衆起來作農業集體化的運動，組織羣衆起來進行集體化的運動，消滅富農階級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了要組織羣衆起來進行農民的集體農場運動而消滅富農階級，首先就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說連結農民勞動羣衆走上社會主義不可能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理論。

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最後就在於否認黨內鐵的紀律的必要，在於承認黨內有小組織存在的自由，在於承認組織托洛茨基主義黨的必要。就托洛茨基主義看起來，蘇聯共產黨應該不是一個統一的、團結很緊的戰鬥的政黨，而是一種許多小組織和小團體，各有自己的中央和自己的出版物等等的混合物。這是怎麼說？這就是宣佈黨內有小團體存在的自由。這就是說，黨內既有政治的小團體存在的自由，那在蘇聯國內就應該有各種政黨存在的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應該有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承認黨內有小團體的自由，直至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可有各種政黨存在的理論，不過有『黨內民主』、有『改良黨內統治』等等的詞句作掩蓋罷了。那種知識階級各小團體的派別鬭爭自由，這不是黨內民主，而黨所進行的廣大地自我批評和黨員羣衆的偉大積極化，才是真正的黨內民主的表現，——這都是托洛茨基主義所不瞭解的。在這種對於黨的見解之下，能不能夠保證黨內鐵的紀律，保證黨的一般的一致，以便和階級敵人作勝利的鬭爭呢？

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了保證黨的鐵一般的一致，並保證黨內無產階級的紀律，首先便當埋葬托洛茨基主義在組織上的理論。

總之，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就是它的實際內容是投降，它的形式是掩蓋和宣傳投降內容的『左』的詞句和『革命』式的冒險空談。

托洛茨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是反映着小資產階級破產地位的兩重性；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不能忍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壓制』，拚命企圖或者『一下』就跳到社會主義，以免得破產（由此就產生政策上的冒險主義和急性病），或者假使這個不可能，那就是對資本主義隨便作什麼讓步都行（由此就產生政策上的投降）。

托洛茨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就能說明爲什麼托洛茨基主義『激烈』攻擊右派，但結果總是同右派聯合，並和沒有假面具的投降派聯合。

黨內過去在集體農場運動方面的『左的』過火，又是什麼東西呢？這是在實際上復活托洛茨基主義的慣例，復活托洛茨基主義對於中農關係的某種企圖，固然這種企圖是不覺悟的企圖。這種『左的』過火，是列寧所謂『太用行政手段』一個錯誤政策的結果。這就是說，我們的少數同志，爲集體農場運動的成功所眩目，對於集體農場建設的問題，不拿建設者的眼光去看，而主要的是拿行政者的眼光去看，結果就做出許多大錯誤來。



我們黨裏有種人以爲不應該打擊『左的』冒失鬼。不當苛待我們工作的同志，不當妨礙他們的熱心，甚至因爲這個熱心以致發生錯誤，都不要去反對他們。同志們，這是笑話。祇有那些祇願意順水推舟的人們才能這樣說。這種人是永遠不能領會列寧主義路線的，因爲他們不知道當環境需要逆流而行的時候，當黨的利益需要逆流的時候，那時候，是要『逆流而行』的。黨所以能够把許多同志領回到正確的道路，黨所以能糾正錯誤，且達到許多成功，就是因爲它爲了實行黨的總路線，曾經堅決的起來反對當時的潮流。這就是實際上的列寧主義，是領導工作中的列寧主義。

所以我以爲如果我們沒有打破『左的』過火，那我們在集體農場運動中，便不會有如現在所得到的成功。

這就是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殘餘，並及其實際上的遺毒作鬭爭的情形。

以布哈林、李可夫與湯姆斯基爲首領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問題，却稍許有些不同。

在說到右派的時候，不能說他們不承認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他們是承認這種可能的，這就是他們與托洛茨基派不同的地方。但是右派的不幸，就在於當他們形式上承認一個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時候，他們却不願承認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須的鬭爭途徑和方法。他們却不願承認各方去發展工業，是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以改造全蘇國民經濟的中心任務。他們不願承認與資本主義分子作

不調和的鬭爭，不願承認向資本主義擴大社會主義的進攻。他們不明白這些途徑和方法是整個系統的辦法，若沒有這些辦法，便不能在我們國家內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他們以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情，可以是偷偷地、自流地，沒有階級鬭爭，不向資本主義的份子進攻。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的份子或者是不令人注目地自己死亡，或者將生長到社會主義。但是歷史上沒有這樣破天荒的事實，所以，右派實際上是走上否認我們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的觀點。

在說到右派的時候，也不能說他們否認吸引根本農民羣衆參加鄉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他們不否認，而是承認這種可能的，這也是他們與託洛茨基派的不同點。但是他們形式上承認這種可能，同時却否認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必須的一些途徑和方法。他們不願承認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是吸引根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主要方法和『大道』。他們不願承認假使不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便不能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改造鄉村。他們以為可以偷偷的，自流的，沒有階級鬭爭的，僅祇用一個供給和消費的合作社就能把鄉村領導着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他們相信富農自己會生長到社會主義。他們以為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工業發展的高的速度，也不是在於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而在於『開放』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並『去掉』對於鄉村個人經濟直至資本主義份子的『壓迫』。但因富農不能生長到社

會主義，而『解放』市場就是武裝富農和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所以，結果右派事實上是走上否認吸收根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

所以右派與托洛茨基派的公鷄式的鬭爭，結果常是右派與托洛茨基派在後台彼此間開聯合的談判。

右派機會主義的根本不幸，就在於它與列寧主義階級鬭爭的瞭解分裂了，而滾上了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觀點。

假若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勝，那無疑的就將完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而使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武裝起來，且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就要增大了。

右派不同意組織另一政黨的觀點，這亦是他們與托洛茨基派不同的地方。右派的首領們，曾經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且已在黨的面前屈服了。但是假使因此就以爲右派主義已經埋葬了，那是不對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力量，不是由這種情形來決定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力量，是在於一般資本主義份子方面對於黨的影響的力量，特別是富農方面對於黨的影響的力量。正因爲右傾是反映着垂死的階級各根本份子的反抗，所以右傾是我們黨裏現在的主要危險。

所以黨曾經認爲必須與右傾作堅決的不調和的鬭爭。

毫無疑義的，假使不與右傾作堅決的鬭爭，假使不使右傾底領導份子孤立，那我們就不能動員黨與工人階級的力量，動員貧農與中農羣衆的力量，以舉行社會主義的擴

大進攻，以組織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以恢復我們的重工業，並消滅富農階級。

這就是黨內『左傾』和右傾的各種問題。

現在的任務，就在於以後還要繼續兩條戰線上不調和的鬭爭，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過激主義的『左』派，同時，還要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右派。

現在的任務，是在於以後還要繼續與黨內的調和份子作不調和的鬭爭，因為這些份子不明白，或假裝着不明白在兩條戰線上堅決鬭爭的必要。

二，在講到反對黨內各種傾向的時候，如果不說一說黨內在民族問題方面所有的各種傾向，那末這幅圖畫是不完滿的。我所指的，第一就是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傾向，第二就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這些傾向是沒有『左』傾和右傾那麼現形和厲害的。可以把它們叫作是一種跛腳的傾向。但是，這還不是說這些傾向不存在。不是，這些傾向是存在的，而且主要的是這些傾向正在增長起來。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階級鬭爭一般的緊張局面，不能不使民族上的衝突也相當的緊張起來，而這種衝突在我們黨裏是有反映的。所以值得揭露這些傾向的面目。

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傾向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大俄羅斯愛國主義傾向的實質在於企圖不理會民族間語言文字和文化風俗的不同點；在於企圖準備消滅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在於企圖破壞民族平等的原則並輕視黨在

機關、出版物、學校以及其他國家和社會組織上民族化的政策。

有這種傾向的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出發點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之下，各民族應該聯合成爲一個，而它們的各種語言文字，應當變成大家統一的語言文字，所以現在到了可以消滅民族間的各種不同點的時候，應該放棄幫助從前被壓迫的各民族發展自己的文化的政策了。他們這樣主張，好像是根據列寧所說的話，但是他們把列寧的話引用得不正確，並且，有時候簡直是曲解列寧和侮辱列寧。列寧說過，在社會主義之下，各民族的利益是聯合成一個的，是不是可以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消滅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的時候到了呢？列寧在一九一三年同猶太工會派辯論的時候，曾經說民族文化的口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口號，——是不是可以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消滅蘇聯各種民族文化的時候到了呢？列寧曾經說過，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界限，在社會主義之下是要消滅的，——是不是可以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放棄估計蘇聯各民族特點的政策而採取民族同化政策的時候到了呢？由此類推下去，還可設許多問題。

毫無疑義的，因民族問題中的這個傾向有國際主義和列寧的名字作假面具以掩蓋自身的面目（這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最精巧處），所以它是最危險的一種形式。

第一，列寧從來沒有說過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社會

主義還未在全世界勝利以前，各民族間的不同點應當消滅，而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應該合而為一個大家共同的語言文字，恰恰相反，列寧曾經說：『各民族間和國家間民族和國家的不同點，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久很久的存在。』（『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七八頁）假如忘記了列寧這個根本的指示，那末，怎能引證列寧的話呢？

不錯，有一個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而現在是叛徒、是改良派的考茨基先生，他有一種說法，是和列寧告訴我們的完全相反。考茨基肯定的說，如果上世紀中葉在奧大利和德意志統一的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那末，結果就要形成一個共同的德國話，並使捷克人和德國化，因為『僅僅從束縛下解放出來的交換的力量，僅僅德國人種所帶來的現代文化的力量，就足夠使捷克人的小無產者、農民和無產者變成德國人，而這些小資產者農民和資產者自己的民族是什麼東西也不能給他們的』（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德文版的序言）這種『主張』，很明顯是與考茨基的社會愛國主義完全相符合的。我於一九二五年在東方民族大學的講演裏，就曾反對考茨基這種觀點的。難道德國社會愛國派考茨基那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胡說，對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願意始終為國際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還能引起某種同情不成嗎？誰是對的，考茨基還是列寧？如果考茨基是對的，那末，怎樣解釋這一事實，就是比落後的民族，如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他們對大俄羅斯人

比捷克人對德國人還要接近，爲什麼他們不因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結果而俄國化，反而復興且發展成了獨立的民族呢？又如土爾克敏、基爾基茲、烏茲別克、塔齊克等等民族（且不說格魯精、阿爾緬、阿席罷尙及其他），雖然是落後的，但不僅沒有因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而俄國化，反而復興且發展成了一些獨立的民族，——這件事實又怎樣解釋呢？傾向於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人，爲着要達到『十足的』國際主義，却是落到了考茨基的社會愛國主義，這還要證明嗎？這些有傾向的人，歡喜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蘇聯的範圍內，有一個共同的語言，他們實際上就是企圖恢復以前佔過統治地位的語言的特權，就是大俄羅斯文化的特權，這還不明白嗎？這與國際主義又有什麼關係？

第二，列寧從來沒有說過民族壓迫的消滅和各民族利益合而爲一就等於消滅民族間的各種不同點。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的壓迫。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的特權，並建立了民族的平等。我們已經消滅了舊時代的國界，消滅了蘇聯內部各民族間的國家界綫和稅關等障礙物。我們已經建立起蘇聯各民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利益的一致。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就消滅了各民族間的不同點，即民族語言、文化風俗等等的事情呢？很明顯的，沒有消滅。但是各民族間的不同點（語言、文化、風俗等等）既還存在，那末在現在的歷史時期，要求消滅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就是一種反動的要求，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利益的要求，——這

難道還不明白嗎？這些有傾向的人，明白不明白現在消滅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就是使蘇聯內部千百萬民衆，不能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受得教育，不能有自己語言的學校、法庭、辦事機關、社會的和其他的組織，以及不能接近社會主義的建設呢？這些有傾向的人，爲了要達到『十足的』國際主義，却落到了反動的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者手裏，忘記了並完全忘記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文化革命的口號，即對於蘇聯內所有的民族，無論是大俄羅斯人或非大俄羅斯人具有同樣意義的口號，——這還不明白嗎？

第三，列寧從來沒有說過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是反動的口號。恰恰相反，列寧常說，要幫助蘇聯各民族發展它們自己的文化。在列寧指導之下，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曾經草就並通過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中說：

『黨的任務，是在於幫助非大俄羅斯民族的勞動羣衆，趕上已經往前發展的俄國中心地點，幫助他們：（一）發展並鞏固他們的蘇維埃政權，它的形式要符合於這些民衆的風俗等條件；（二）發展並鞏固他們用自己語言文字所有的法庭、辦事機關、經濟機關、政治機關，這些機關應由本地明白地方民衆心理和風俗的人員組成之；（三）發展他們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創辦的刊物、學校、戲院、娛樂事業以及其他一切的文化教育機關；（四）用他們的語言文字開辦並發展一般科學的教育，並帶着職業和技術性質的教



育。』

這樣，列寧是完全主張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發展民族文化這個口號的，——這難道不是明顯的事實嗎？

否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就是否認提高蘇聯內部各種非大俄羅斯民族文化程度的必要，就是否認對於這些民衆實行一般的強迫教育之必要，就是把這些民衆交給反動的地方民族主義者在精神上去奴役他們，——這難道還待證明嗎？

列寧確實曾經把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族文化的口號看作是反動的口號。但這難道不是正確的嗎？試問在民族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麼東西？內容是資產階級的，而按形式是民族的文化，它的目的是拿民族主義的毒藥去蒙蔽羣衆，去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試問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麼？內容是社會主義的，而按形式是民族的文化，它的目的是拿國際主義來教育羣衆，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假使不與馬克思主義分裂，怎能把這兩種原則上不同的現象混爲一談呢？列寧反對資產階級制度下民族文化的口號，這是打擊民族文化的資產階級內容，而不是打擊它的形式，——這難道不是明顯的事實嗎？假使以爲列寧曾經把社會主義文化看作是一種不帶民族色彩沒有任何民族形式的文化，那是錯誤的。猶太工會派確實曾經有個時候給列寧戴上了這麼一頂大帽子。但是從列寧的全集中，可以看出列寧曾經堅決的反對這種污衊，並且痛斥這種說法的不正確性。難道我們中間那些有

傾向的人也想學一學猶太工會派的樣子不成？

把上面一切講過之後，那些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的人還有什麼理由可說。

除了裝模作樣的大搖國際主義的旗幟和污蔑列寧以外，沒有別的。

傾向於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人是很錯誤的，因為他們以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是民族文化崩潰和消滅的時期。事實上却是相反。事實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正是民族文化發揚的時期，這種文化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而形式上是民族的。他們大概是不懂得民族文化的發展因為用本地文字規定並實行初等普遍強迫教育的關係將更有力量<sub>的</sub>伸張起來。他們不明白，祇有在民族文化發展的條件之下才能真正使落後的民族一同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他們不明白，這就是幫助並擁護蘇聯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列寧政策的根本所在。

或許有人以為很奇怪，我們是主張來把各種民族文化聯合成爲一個文化（既是照形式又是照內容），並是用一種語言文字的，而爲什麼同時，在現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却又主張發揚各種民族的文化。但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要給各民族文化發展和伸張起來，顯出它所含的一切可能，以便造成他們聯合成爲一個總文化，用一個總語言文字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發展那照形式是民族的而照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各種文化，以便當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勝利時，而社會主義成爲風俗習

慣的時候，把他們聯合成爲一個總的社會主義的（照形式而又照內容）文化，用一個總的語言文字，——這就是在民族文化問題上列寧主義觀點的辯證方法的所在。

或許有人以爲這種觀點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難道在國家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同樣的『矛盾』嗎？我們是主張國家死亡的。但是我們同時又主張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直到如今，許多國家政權中之最強有力的一個政權。國家政權的高度發展，爲的是要準備條件，以便使國家政權死亡，——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自相矛盾』嗎？是的，這是『自相矛盾』的。但這種矛盾，是生活的矛盾，這正完全反映着馬克思的辯證法。

再，譬如在民族有自決權（一直到分立權）的問題上，列寧的觀點。列寧有時候把民族自決的問題，寫成這麼一個簡單的公式：『爲了聯合而分開』。你們試想一想——爲了聯合而分開。這簡直像一種怪話。但是這個『矛盾』式的公式，却反映着馬克思辯證法的日常真理，布爾塞維克由這個辯證法而得到了攻破民族問題方面許多最堅固的砲台的可能。

關於民族文化問題的公式也是這樣：在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中，發展民族文化和語言文字，爲的是要準備條件以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時期消滅各種文化，而使他們聯合成爲一個總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和一個總的語言文字。

誰不瞭解我們過渡時候的這個特性和『矛盾性』，誰

不瞭解這種歷史過程的辯證規例，那照馬克思主義看來，他就是一個死了的人。他們那些有傾向的人們的不幸，就是在於他們不瞭解而且不願瞭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這就是關於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傾向底事情。

不難明白，這種傾向，是反映以前有過統治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中正在過着最後殘喘的階級要恢復自己已經失掉底特權的企圖。

由此，便可以知道大俄羅斯愛國主義是黨內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在於他們企圖閉關在自己民族的家裏，在於企圖抹殺自己民族中所有的階級矛盾，在於企圖用離開社會主義一般建設事業的方法保護自己以反對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在於企圖不看見使各民族勞動羣衆接近並聯合的蘇聯，而祇看見能够使各民族彼此隔離的現象。

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是反映着從前被壓迫民族中正在死亡的各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不滿意，反映着這些階級要起來形成自己民族的國家，並在這個國家裏設立自己階級底統治的企圖。

這個傾向的危險，在於使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復活起來，削弱蘇聯各民族中勞動羣衆的一致，並幫助國外武裝干涉的冒險家。

這就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

黨的任務，是在與這種傾向堅決的鬭爭，以保證在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中實行國際教育所必須的條件。

這就是我們黨內一切政策方面『左傾』與右傾的情形，以及民族問題方面各種傾向的情形。

這就是我們黨內的狀況。

現在當黨爲總路綫而鬭爭得了勝利的時候，當我們黨的列寧主義路綫在各方面得勝的時候，許多人大概都忘記了那些有各種傾向的人給我們的工作所造成的困難。不僅是這樣，還有少數帶有市儈情緒的同志，一直到現在，都還想可以與那些有傾向的人不作鬭爭。這些同志，不用說是處在很深的迷途中。祇要回憶一下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藝術，祇要回憶一下在過去時期中與各種傾向作鬭爭的歷史，便不難明白這種黨內市儈情緒的無聊。毫無疑義的，假使我們不鎮壓那些有傾向的人並在公開的戰鬭中把他們擊破，那我們便不能得到今天我們黨所可以自豪的一些勝利。

我們的黨，是在與離開列寧主義路綫的各種傾向作鬭爭的過程中長大的。在這個反對傾向的鬭爭中，黨把自己的行列鑄成了列寧主義的一致。現在誰也不能否認一件不容爭論的事實，就是我們的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鞏固的團結在自己的中央周圍。大家都不能不承認，現在的黨比任何時候都要一致和團結得鞏固，第十六次大會是我們黨少有的一次大會，因爲在這次大會上，沒有形成了團結而一致的、能够把自己的路綫拿來與黨的總路綫對立的反對派。

爲什麼黨能夠得到這樣大的成功呢？

黨所以能得到這樣偉大的成功，是因爲它在反傾向的鬭爭中時時執行着原則上的政策，什麼時候也沒有做過台後勾當和外交把戲的事情。

列寧說過，原則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所以在反傾向的鬭爭中能取得勝利，就是因爲我們很忠實而澈底的執行了列寧底這個遺囑。（鼓掌聲）

× × ×

同志們，我現在要講完了。

一般的結論是怎樣呢？

我們在過去時期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都得到了許多偉大的成功。我們所以能夠得到這些成功，是因爲我們曾高舉着列寧的偉大的旗幟。我們如果想要勝利，以後還是應該高舉着列寧的旗幟，保持它的純潔。（鼓掌聲）

這就是一般的結論。

我們打着列寧的旗幟，在十月革命戰鬥中得了勝利。

我們打着列寧的旗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鬭爭中得了偉大的成功。

我們打着列寧的旗幟，也定能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得到勝利。

列寧主義萬歲！（繼續很久的鼓掌聲。全場歡呼。）

## 結 論

同志們！在討論了中央底報告之後，在大會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底發言表示了態度之後，我在自己的結論裏就沒有多的話可說了。

我在自己的報告中已經說過，黨的第十六次大會是我們黨史上少有的一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沒有多少已經形成了的反對派能夠提出自己的路綫來，並用它與黨的路綫對抗。你們看見了，實際上果然是這樣。在我們這次大會上，在黨的第十六次大會上，不但沒有已經形成的反對派，甚至就沒有一小部份人或幾個單個的同志，認為自己應該跑到這個台上來說黨的路綫是不正確的。很明顯的，我們黨的路綫是唯一地正確的路綫，而且它的正確性竟這樣的明顯和無可爭論，就是，連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也認為在自己的發言中應該毫不動搖地指出黨一切政策底正確性來。

既然這樣，很明顯地，就用不着再講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些事情底正確性。沒有這樣的必要，因為黨的路綫顯然正確，現在用不着在這次大會上再進一步的去擁護它了。但雖是這樣，我却沒有拒絕作結論，這就是因為同志們寫到主席團來一些紙條子，我想，簡單的回答一下並不

是多餘的，然後再關於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底發言說幾句話。

大部份的條子，都是關於一些次要的問題。譬如：爲什麼在報告中沒有講到養馬問題，——可不可在結論中講幾句話；（笑聲）爲什麼在報告中沒講到建築房屋的問題，——可不可在結論中講幾句話；爲什麼在報告中完全沒講到農村電氣化的問題，——不能在結論中關於這個問題講一點嗎？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應該對這些同志說，我在自己的報告中不能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問題都包括在內。不僅是不能，並且我也沒有這個權利，因爲我沒有權去侵犯古培錫夫和亞可夫烈夫報告的範圍，他們應該向你們報告工業和農村經濟的各種具體的問題。實際上，假如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把所有的問題都講到了，那末在關於工業和農村經濟報告裏，報告人應該講什麼呢？（台下喊：『對呀！』）

特別是關於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條子，我應該指出來，寫這條子的人自己有些不正確的地方。他認爲我們已經『完全走到了』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期，認爲人民農業委員部是不讓這個事業發展，認爲列寧對這個問題，曾有另一種想法等等。同志們！這完全不對。不能說我們『完全走到了』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期。假使我們真已經完全走到了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就必已經有了十個或十五個有電氣化的農村經濟生產的區域。可是你們都很知道，我們的情形還完全不是這樣。現在關於農村經濟



電氣化的問題，祇能說我們的電氣化還正在實際研究的階段上。列寧也是這樣看這件事情，他獎勵農村經濟電氣化的試驗。有些同志以為拖拉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是由拖拉機過渡到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代了。這當然是空談和妄想。還應當把這樣同志教育一下。人民農業委員部正是這樣對付這些同志。因為寫這個紙條的同志，對人民農業委員部的不滿意，不能認為是有根據的。

第二種條子是關於民族問題的。其中有一個問題我認為是最有趣味的。一個同志把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關於民族語言問題的言論拿來和我一九二五年在東方勞動大學的報告中的言論對比，並找出這裏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須要解釋。紙條上寫着說：你當時曾反對過在社會主義時代（在一國裏）消滅各民族的語言和創造一個共同的語言底理論（考茨基的理論），但現在，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在自己的報告裏却說，共產主義者讚成把各民族的文化和語言鎔化成為一個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時代），——這裏不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嗎？

我想這裏沒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沒有任何的矛盾。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我在自己的報告中曾反對過考茨基底民族愛國主義的理論。根據他這個理論，上世紀中葉奧大利德意志聯邦中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必定要使各民族鎔化成為一個德意志民族，共同用一個德意志語言，並使捷克民族德意志化。我曾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後國內生活中的事實，——推翻這種理論的事實，反對了這種反馬克

思主義和反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且我現在還是反對這種理論，這從我在這次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裏便看得很明顯。我反對這種理論，因為這種把各民族鎔化起來，例如把蘇聯鎔化成一個統一的大俄羅斯民族，用一種統一的大俄羅斯語言的理論，是民族愛國主義的理論，是反列寧主義的、是和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矛盾的理論，列寧主義的原則，認為民族的區別在最近時期中不能消滅，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還要存在很久。至於講到各民族的文化 and 各民族的語言更遠的前景，我歷來都堅持並現在還繼續地堅持着列寧的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勝利的時期，當社會主義穩固起來並深入於生活中的時候，各民族的語言不可避免地要鎔化成一種統一的語言，這種語言當然不會是大俄羅斯的，亦不會是德意志的，將是某種新的語言。關於這點，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在自己的報告中已經很確定地講過了。

這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還有什麼需要解釋呢？

很明顯地，寫這個紙條子的人們，至少自己未十分瞭解兩件事情。

首先，他們自己沒弄清楚一件事實，就是我們蘇聯已經走入了社會主義時期，但是，雖然我們走入了這個時期，各民族却不但不衰亡而反到發展和興旺起來。實際上，我們是否已經走入了社會主義時期呢？我們這個時期通常都叫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他就被叫做過渡時期。當時列寧在他的有名

的文章『左派幼稚病』裏，首先分析了這個時期和它的經濟生活底五種結構。現在，一九三〇年，這些經濟結構中有幾個已衰老而走向滅亡了，而其中有一種，就是工業和農村經濟間的新結構，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發展着，這個時期還叫做過渡時期。能不能說，這兩個過渡時期是一樣的，根本上彼此沒有差別呢？很明顯地是不能。在一九一八年裏，我們國民經濟的狀況怎樣呢？當時所有的是被毀壞了的工業，焚毀了的東西，沒有大批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城市『新興』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的生長。但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有恢復起來的和改造了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有極多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他們所耕種的地面，祇按春耕面積就佔全蘇聯底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城市裏有垂死的『新興』資產階級，鄉間有垂死的富農。那時是過渡時期。現在也是過渡時期。可是，他們中間有天淵之別。誰也不能否認，我們正在開始消滅最後一個厲害的資產階級即富農階級。很明顯地，我們已經走出了從前所說的那種過渡時期，走進了直接的在整個戰綫上發展着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很明顯地，雖然離建立成社會主義社會和消滅階級區別的時期還遠，但因為現在社會主義部分已經握住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切經濟命脈，所以，我們是已經走進社會主義的時期了。雖是這樣，但各民族的語言不但不衰亡和不鎔化成一個統一的語言，而恰恰相反，各民族的文化和語言却發展和興盛起來。因此，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擴大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時期，在一個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各民族語言的衰亡和鎔化各民族的语言成爲一個統一的語言底理論是不正確的，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第二，寫這條子的人們不瞭解，各民族語言的衰亡以及將他們鎔化成一個統一的語言底問題，並不是一國內部底問題，也不是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勝利的問題，而是國際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的問題。寫這條子的人們不瞭解，不能把社會主義在一國裏勝利和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的勝利混爲一談。列寧說過，民族的區別，當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的範圍內得着勝利以後，還要存在很久，這話是很有意思的。此外，還要注意與蘇聯許多民族有關係的一種情形。蘇維埃聯邦裏有個烏克蘭，但別個國家裏又有一個烏克蘭。蘇聯有個白俄羅斯，但別個國家裏也有個白俄羅斯。他們是否想不估計到這些特殊條件便能解決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語言問題呢？再來看沿着蘇聯南方邊界居住着的民族，從阿席爾罷特尙到哥薩克斯坦和布拉特蒙古。他們都和烏克蘭、白俄羅斯的情形一樣。很明顯地，這裏也要注意這些民族發展的特殊條件。還不明白嗎，這些類此的、與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語言的問題有關係的問題，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蘇聯的範圍內，是不能解決的？

同志們，這就是一般的民族問題，特別是對於上面所講的紙條上所問的民族問題。

現在讓我來對於右派過去的首領們的發言講幾句話。

大會向右派過去的首領所要求的是什麼？是要他們自己捶胸頓足地自己悔恨自己嗎？當然不是！我們黨和我們黨的大會任何時候也不會要求黨員們怎樣地降低自己的身分。大會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要求三件事：第一，他們自己應當深刻瞭解，黨的路綫和他們所擁護的路綫中間有一條鴻溝，他們所持的路綫，客觀上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底勝利而是走向資本主義底勝利；（台下喊：『對啊！』）第二，要他們指出來這個路綫是反列寧主義的路綫，並要他們公開地和誠懇地脫離他；（台下喊：『對啊！』）第三，要他們起來脚跟脚地同我們共同的反對一切的和各種的右傾份子。（台下喊：『對啊！』激烈地鼓掌）

這就是大會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所要求的。

在這些要求裏，有沒有什麼會使那還想成爲一個布爾塞維克的人們感覺得是降低身份的地方呢？

很明顯地，這裏沒有並且也絕不會有什麼降低身份。每個布爾塞維克，每個革命家，每個自愛的黨員都可懂得，祇有他公開地誠懇地承認那些明顯的、無容爭辯的事實，他在黨的面前才得被人器重，才得進步。

因此我想起湯姆斯基所說的話，他說別人想把他送到大戈壁沙漠去，強迫他吃蝗蟲和野蜜，這簡直是鄉下耍把戲的人信口開河所說的笑話，根本一點革命者的價值都談不上。（笑、鼓掌）

有人會問，爲什麼大會又重新向右傾反對派提出這些要求來？這些要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曾對他們提出過一次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當時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曾接受了這些要求，放棄了自己的路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承認了黨路綫的正確，應許與黨一起和右派奮鬥，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是的，真有這些事實。那末，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事情就在他們沒有履行自己的允許，他們沒有完成，並現在也沒有完成七個月以前自己所約定的義務。（台下喊：『對啊！』）烏格蘭諾夫在自己的發言中曾說，他們沒有完成自己向十一月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所允許執行的義務，這話是完全對的。

這就是他們在這次大會上不受人信任的原因。

因此大會才重新向他們提出自己的要求。

李可夫、湯姆斯基和烏格蘭諾夫三位在這裏訴冤，說大會對他們不信任。但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他們自己的罪過。誰不盡自己的義務，誰就不要想被人相信。

他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有沒有過可能和機會來履行自己的允許和把過去的一切完全停止呢？當然有過。但他們在這七個月裏，利用這些可能和機會作了些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作。

不久以前，李可夫曾參加了烏拉爾的大會。這自然是他糾正自己的錯誤最好的機會。可是怎樣？他不去公開地和堅決地拋棄自己的動搖，却在那裏詭辯和耍手腕。當然，烏拉爾的大會不能不給他一個打擊。現在試把李可夫

在烏拉爾大會上的演說詞和他在第十六次大會上的演說詞拿來比較一下。兩者之間有一條鴻溝。他在那裏詭辯和耍手腕，與烏拉爾的大會宣戰。在此地他却想公開地、大聲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企圖與右傾反對派決裂，允許幫助黨來和各種傾向鬭爭。這樣的變化是那裏來的，並怎樣解釋呢？很明顯地，這就是因為在黨內為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造成了一種可怕的局面。因此，一點也不奇怪，就使大會得了這樣一個確定的感想：若不逼迫這些人一下，從他們那裏就什麼都得不到。（哄堂大笑。繼續不斷的鼓掌。）

烏格蘭諾夫有沒有過可能來完成他對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全體會議的允許呢？是的，有過。我要說的就是不久以前，他在莫斯科電氣工廠的一個非黨大會上的演講。可是，怎樣呢？他不像一個布爾塞維克在那裏發言，而對黨的路綫長吁短嘆起來。當然，他因為這個緣故，從工廠支部那裏得到了應受的打擊。現在試把他那次的演講和他在今天『真理報』上所發表的聲明書來比較一下，就看見兩個當中有一條深淵相隔。這種變化是什麼緣故呢？這同樣是因為在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一種威嚇他們的環境。如果大會從此得出一個教訓：是因為沒有逼迫這些人，所以從他們那裏就什麼都得不到。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全場大笑。鼓掌）

或者，譬如湯姆斯基吧。不久以前，他曾在替夫利斯參加了高加索的大會。當然，在那時候他有機會來贖自己

的罪過。可是怎樣呢？他在自己的講話中，講到了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協作社、文化革命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可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關於他自己在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中的機會主義工作，他却一字不提。這就叫做執行他對黨所應盡的義務！他曾想欺騙黨，但不知道有幾百萬隻眼睛在監視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誰也欺騙不過的。現在請把他在替夫利斯的報告，和他在這次大會上直接地、公開地承認他指導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的機會主義錯誤的演說詞比較一下，就看見它們中間也有一條鴻溝。這種區別將怎樣解釋呢？這同樣是因為在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周圍，形成了一種威嚇他們的環境。因此，如果大會設法好好地強迫他們一下，使他們能完成自己的義務，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鼓掌。哄堂大笑。）

這就是大會對這些人還不相信的原因。

爲什麼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有這種比奇怪還奇怪的行動呢？

爲什麼在過去這個時期中，他們從來不會想不要用外面的壓力而自願地來完成自己的義務呢？

這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他們還不完全相信黨的路綫是正確的，於是便輕巧巧地幹一點小組織的工作，暫且等待着，候着一個適當的機會，好重新出來公開地反對黨。他們在招集小組織的會議討論黨的問題的時候，總是推延：等到春天，或者黨的播種運動要失敗，——那時，我們再好好地打擊它一



下。可是，春天並沒給他們一點好處，因為播種運動進行得很順利。於是他們又從新推延：且等到秋天，黨的收買糧食的工作或者失敗，那時，我們再好好地打擊中央委員會一下。可是到了秋天，他們又大失所望。但因為每年都有一個春天和一個秋天，於是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便繼續的等候着，不是希望春天就是希望秋天。（全場哈哈大笑）

這樣坐着等候一季又一季，企圖等到一個適合的機會打擊黨，自然他們就沒能盡自己的義務。

最後，第二個原因，就是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不瞭解布爾塞維克的速度，不相信這種速度，並簡直是一點都不承認有什麼東西可以超出漸漸發展底範圍和自流以外。再，我們布爾塞維克的速度，改造時期裏發展底新道路，階級鬭爭底劇烈化和這個劇烈化底結果等，使他們陷於恐慌、失措、畏懼、驚駭。因此很明顯地，他們見到一切與我們黨底最激烈的口號有關係的事物便退却了。他們和有名的契訶夫小說『囊中人』的英雄、希臘文教員比里可夫所害的病相同。你們記不記得契訶夫的小說『囊中人』？你們都知道，這位英雄不管天氣冷熱，總是不離套鞋、棉大衣和雨傘。有人問他：『請教，為什麼在七月這樣熱的天氣裏，你還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他回答說：『以防萬一。恐怕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呢！假如忽然寒冷起來怎麼辦？』（全場大笑。鼓掌）他怕一切新的和出乎常人底灰色庸凡生活的常規以外的東西，如同怕瘟疫一

般。人家新開了一個飯堂，比里可夫立刻就驚慌起來：『有個飯堂固然不錯，可是看罷，恐怕發生什麼意外。』組織了戲劇研究組，設立了讀書室，比里可夫又驚慌起來：『爲什麼要這些戲劇社和新讀書室呢？看罷，要有什麼意外發生，怎麼辦！』（全場大笑）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就是這樣。大家還記得把高等技術大學轉交給人民經濟委員會的一段歷史嗎？我們曾想把兩個高等技術大學轉交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照說，這是一回小事。可是我們卻遇到了右傾份子方面拚死命的反抗。『把兩個高等技術大學轉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嗎？爲什麼這樣幹？等一等不好嗎？看罷，從這個花樣裏生出什麼意外來怎麼辦。』現在我們所有的高等技術大學都交給各經濟的人民委員會了。可是並沒有什麼意外，我們還是活着。再舉個例子，譬如，關於用非常手段來對付富農的問題。大家還記得，右傾反對派底首領們爲這件事曾如何的向我們發神經病啊？『用非常的手段來對付富農麼？爲什麼要這樣幹呢？對富農採用自由的政策不更好嗎？看罷，從這個花樣裏生出意外來怎麼辦。』可是現在我們進行着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假如把反對富農的非常手段，同這個政策比起來，那簡直是件小事。可是並沒有什麼意外，我們還是活着。再譬如關於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問題。『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嗎？要它們作什麼？我們忙什麼？看罷，要因爲這些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生出什麼意外來怎麼辦。』諸如此類的很多很多。

這就是怕新的，不會用新的方式對付新的問題，這樣的驚慌——『發生意外怎麼辦』——正是囊中人的特點，這種特點阻礙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真正地與黨一致。

特別是困難當前、天空中現出一小朵烏雲來的時候，囊中人的這些特點，便更由許多滑稽的樣子表現出來。祇要我們那裏發現一些困難和障礙，他們便馬上慌張起來：發生意外怎麼辦。祇要聽見了一個章螂叫並且章螂還未能全身爬出洞來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嚇得向後逃走了，驚心碎膽地哭喊起大禍臨頭和蘇維埃政權滅亡來。（全場哈哈大笑）我們安慰他們，並盡力地向他們解釋，說這一點危險也沒有，這祇不過是一個章螂，用不着害怕。但是這不中用！他們還是繼續的哭着說：『這怎是章螂呢？這不是章螂，這是成千成萬的猛獸啊！這不是章螂，這是深淵，這是蘇維埃政權的末路。』於是就找隣人來評判…。布哈林關於這個問題寫了一個提綱，並且把他送給中央委員會。他肯定地說，中央的政策使國家走到了滅亡的地步，蘇維埃政權一定滅亡，如果現在不滅亡，那末至多不過一個月就要滅亡。李可夫同意布哈林這個提綱，可是他與布哈林却有極大的分歧，這種分歧就在於據他的意見，不是經過一個月而是經過一個月零兩天，蘇維埃政權才會滅亡。（全場大笑）湯姆斯基同意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見，但他又反對他們，說他們沒有能夠不用提綱和不用文件，以後還要為這些提綱和文件負責：『我向你們說過許多次，你們願意怎樣幹就怎樣幹，可是，不要留下文件，不要留

痕跡。』（全場哈哈大笑。不斷地鼓掌）是的，經過一年以後，到傻子都明白了章螂的危險連一個空蛋殼都不值的時候，右傾份子才開始蘇醒過來，鼓起勇氣，甚至還吹起牛來說，他們從來沒有怕過任何的章螂，章螂不過是一個一點力氣沒有的甲蟲。（笑聲。鼓掌）但這要經過一年。可是在這一年中却要與這些不果決的人打麻煩。

同志們，就是這些情形阻礙了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與黨的領導底核心接近並和他們團結到底。

這樣，究竟怎樣辦才好呢？

祇有一個方法：把過去的一切澈底的拋棄，按照新的方式把自己重新武裝起來，並與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結成一團為布爾塞維克的發展速度而奮鬥，與右傾奮鬥，其他的方法沒有。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能夠作到這一點那就很好。假如不能的話，那他們就祇有抱怨自己了。（全場不斷地鼓掌，歡呼，全體起立，唱『國際歌』）

#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  
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詞

同志們！你們大會的工作快要完了。現在你們將要通過決議案。我相信這些決議案必會一致通過。你們在這些決議案裏（這些決議案我知道一些）讚同一九三一年的標準數字，並說要負起完成他們的責任。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慎重的。布爾塞維克已養成了有言即行的習慣。但到底什麼叫做負起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標準數字的責任呢？這乃是說，保證工業生產品總共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這實在是很大的任務。但這還不够。負起這個責任，就是說你們不僅應許在四年中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件事已經決定了，再用不着任何的決議案了，——這乃是說你們應許在主要的、基本的工業部門中三年完成他。

大會應許完成一九三一年的計劃，應許三年中完成五年計劃，這很好。可是我們已經受過『苦經驗』的教訓了。我們知道，應許並不是永遠都能履行的。一九三〇年

初，也曾應許過完成全年的計劃。那時應該將我們工業的生產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可是這個應許未曾完全執行。實際上一九三〇年工業生產量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今年不能又重覆這種現象嗎？我們工業中的指導者，工作人員們，現在應許在一九三一年裏將工業生產量提高百分之四十五。但什麼可以保證這個應許能夠完成呢？

需要有什麼條件，才能完成標準數字，使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不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而在基本的、主要的部門中三年便完成他呢？

這需要兩個根本的條件：

第一，這需要有實在的，或像我們常說的，『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需要有願望和才幹來指導我們的企業，使這些可能化爲實際。

去年我們有沒有完全完成計劃的『客觀』可能性呢？是的，有。許多不可爭辯的事實，能證明這一點。這些事實便是，去年三月和四月裏工業生產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但要問，爲什麼我們未曾完成全年的計劃呢？受了什麼阻礙？什麼東西不夠呢？利用已有的可能性的能力不夠。正確的指導工廠、製造廠、礦井等的能力不夠。

我們當時有第一個條件：完成計劃的『客觀』可能性。但我們的第二個條件——指導生產的能力——却不十

分充足。就是因為指導生產的能力不夠，結果計劃才未完成。生產未能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自然，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這已經很多了。在一九三〇年裏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生產的增加，並且，現在也沒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毫無例外，生產都曾猛烈的低落。在這種條件之下生產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但我們當時可以增加得更多。那時我們有一切必需的『客觀』條件。

那麼，有什麼保障可以保證不重新發生意外，保證計劃完全完成，保證我們能適當的利用已有的可能，保證你們的應許很大一部份不祇留在紙上呢？

在各國的歷史中，在軍隊的歷史中，曾有過這樣的情形，即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都有，但這些可能性却空費了，因為指揮的人未看見這些可能性，未能利用他們，而軍隊失敗了。

我們有沒有完成一九三一年標準數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是的，我們有這些可能性。

首先便需要國內有充足的天然財富：鐵礦、煤、石油、糧食、棉花。我們有沒這些東西？有。我們所有的比任何國家都多。譬如拿烏拉爾來講吧，沒有任何國家裏可以找到這樣財富齊全的地方。礦產、煤、石油、糧食——烏拉爾是應有盡有。我們國裏什麼東西都有，或者說，除

了樹膠。但過一二年，樹膠我們自己也有了。從這方面，從天然財富這方面講，我們有充分的保障。實在有的比較我們需要的還多。

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有一個政權，這個政權要有願望和有能力來設法使這些廣大的天然財富為人民所利用。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政權呢？有。不錯，我們利用天然財富的工作，並不是永遠遇不到我們工作人員的抵抗的。譬如去年關於創立第二個煤炭五金根據地（沒有這個根據地，我們就不能再向前發展）的問題，蘇維埃政權不得不進行一點鬭爭。但我們已經克服了這些阻礙。並很快我們便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需要這個政權能得到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援助。我們的政權有沒有這種援助呢？有。在全世界你們再也找不到另一個政權，像我們蘇維埃政權一樣，能得到工農的那樣援助。我不要講社會主義比賽的發展，模範隊運動的升漲，迎接工業財政計劃運動等等事實。在這些事實裏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千百萬羣衆對蘇維埃政權的援助，這些事實是誰都知道的。

還需要什麼才能完成和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標準數字呢？

還需要有一種沒有資本主義那些不可救藥的病症，而比資本主義制度有許多優點的社會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廣大羣衆的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不可救藥的病症。我們的制度沒有這些病症，因為政權在我們手裏，在



工人階級手裏；因為我們有計劃地經營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財富和正確地按國民經濟部門來分配他們。我們沒有資本主義那些無救的病症。這便是我們與資本主義的分別，這便是我們超過資本主義的可決定一切的優點。你們看一看資本家想怎樣走出危機。他們盡量地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地減低原料和食品的價格。但他們却不願意怎樣鄭重地來減低工業製造品的價格。這就是說，資本家企圖在商品的主要消費者工農的身上打算盤，企圖在生產原料及食品的那些國家的勞動者身上打算盤來救濟危機。資本家騎枝砍樹。不但不能走出危機，而反將使之加深，積累起新的條件來促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點便在於我們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我們沒有並不會有幾百萬失業者，我們的生產中沒有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是按着計劃來經營經濟。但這還不够。我們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便是說，我們能够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來建立我們的工業，並因此而保證有空前的勞動生產率，空前的積累速度。從前我們的弱點在於這個工業是建築在散漫的和小的農民經濟上。但這是從前的事，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明天，或者一年以後，我們便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農村經濟的國家。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他們都是大經濟的形式——今年，便已經供給了我們商品穀類的二分之一。這便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的制度，使我們有迅速前進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能够幻想得到。

還需要有什麼，才能一日千里的前進呢？

需要有一個十分團結和十分一致的政黨，來把工人階級最優秀份子的一切力量向一個目標瞄準，又要有充分的經驗，以便不致遇困難而倉慌失措，並有系統地來執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政策。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黨呢？有。他的政策正確不正確呢？正確，因為他收到了極大的成效。這現在不僅工人階級的朋友，就連他的敵人也知道了。請看天下聞名的『可愛的』先生們——美國的費喜，英國的柴爾吉利，法國的普恩凱賽等怎樣的發瘋反對我們的黨。爲什麼他們發瘋反對呢？因爲我們黨的政策正確，因爲這個政策屢屢收效。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容易完成一九三一年標準數字的那些可能性，他使我們有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的可能，而在最主要的部門中並可三年完成。

因此，完成計劃的第一個條件——『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有的。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利用這些可能性的能力呢？

換句話說，即是我們的工廠、製造廠、礦井等等有沒有正確的領導呢？這些事是否都很妥當呢？

可惜，在這方面，並不是都很妥當，我們既是布爾塞維克，說話就該爽快、公開。

什麼叫做指導生產？我們這裏不是什麼時候都用布爾塞維克的觀點來觀察指導企業的問題。我們這裏時常有人

想，指導——這就是在紙上簽字。這很可痛心，但這是事實。有時使你不知不覺地便回憶起舒欠得林所描寫的頑固人來。你們記得，老頑固教訓小頑固說：不要研究科學累壞腦袋，不要研究事情，讓旁人去幹這些事吧，這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指導，在紙上簽字。很可恥的，我們也當承認，在我們布爾塞維克中間，還有不少人是用紙上簽字的方法做指導工作的。至於講到深入事務，學會技術，成爲事業的主人，——在這一點上却絲毫沒有。

怎樣能夠發生這種事情呢？我們布爾塞維克已經作了三次革命，在國內的血戰中得到了勝利，解決了建立工業這個最偉大的任務，領導農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而指導生產時却祇玩弄紙條呢？

原因就是紙上簽字比指導生產更輕便。因之就有許多經濟工作人員走了這條阻礙最少的道路。這裏我們中心也有罪過。十年前曾提出這樣的口號：『因爲共產黨員還未能好好的懂得生產的技術，因爲他們還需要學習管理經濟，所以就讓老技師、老工程師、專門家進行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不要干與技術方面的事情，可是，雖然不干與，但要學習技術，要不住手地學習管理生產的科學，以便後來與忠實的專門家共同成爲生產的真正指導者，成爲真正管事的主人翁』。這就是那時的口號。但結果怎樣呢？結果把這個公式底第二部份棄去了，因爲學習比紙上簽字更困難，而這個公式的第一部份却被庸俗化了，把不干涉解釋成爲不學習生產技術。結果落得莫明其妙。這種

情形是非常有害和非常危險的，越能趕快消滅他越好。

生活本身曾屢次報信給我們，說在這件事上有些不妙。煤礦案件便是第一次信號。煤礦案件告訴我們，黨的組織及職工會沒有充分的革命警備心。它證明，我們的經經工作人員在技術方面落後得太不成體統了，證明有些舊工程師和技師，做工作毫無監督，很容易走上賊害行動的道路，況且國外敵人不斷的用『提議』來鼓動他們。第二個信號便是工業黨的案件。

自然，賊害行動的基礎是階級鬭爭。階級敵人當然要極力地反抗社會主義的進攻。但祇拿這一點來解釋賊害行動的如此發展，這是不夠的。

賊害行動為什麼能擴張到這樣大的範圍。這是誰的罪過？這是我們的罪過。如果我們曾把指導經濟的工作變更一下，如果我們能夠更早的開始學習技術，學會技術，如果我們更能勤快、更靈敏的干涉經濟指導的工作，——賊害份子或者不能賊害得這樣多。

應該自己成為專門家，成為事業的主人，應該注意技術知識，——實際生活已把我們推到這裏來了。可是無論第一次信號，或甚至第二次信號，都還未能保證我們得到必需的轉變。已到時候了，早已到注意技術的時候了。已經到了丟棄不干與技術這個過時的老口號的時候，而應該自己成為專門家，成為懂事的人，成為事業的全權主人翁了。

常有人問，為什麼我們沒有專責制？我們什麼時候不

學會技術，甚麼時候便沒有專責制，並且也不會有。我們布爾塞維克中間沒有足量的人很熟習技術、經濟和財政等等問題，我們便不能有真正的專責制。你們儘可盡量地寫決議案，隨便作甚麼應許，可是若不懂得工廠、製造廠和礦井上的技術、經濟和財政，——便沒有意義，便沒有專責制。

因此，任務便在於自己學會技術，自己管事。祇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計劃能夠完全完成，而專責制能完全實行。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但這完全是可以辦到的。科學、技術、知識，——這都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沒有，明天就可以有。最要緊的就是要有布爾塞維克的熱烈的願望來學會技術，學會生產的科學。祇要有熱烈的願望，便能夠達到一切，能夠克服一切。

有時有人問，不可以減低一點速度，阻止一下運動嗎？不行，同志們！不能減低速度！正相反，按着已有的力量和可能性，還應該提高速度。我們對蘇聯工農所負的責任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責任要我們這樣做。

減低速度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但我們不願意挨打。我們絕不願意！然而俄國在古代的歷史中，却正是因為他落後而挨了人家的打。蒙古的『可汗』曾打過他。土耳其的『拜』（地主——譯者）曾打過他。瑞典的封建諸侯曾打過他。波蘭和立陶宛的『潘』（貴族——譯者）曾

打過他。英法資本家會打過他。日本的爵士會打過他。差不多人人都因為他落後，而打過他。這是因為他軍事上落後，文化上落後，國家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他們打他是因為他們既有利，而又無罪。你們還記得革命前一個詩人的話：『母國俄羅斯啊！你既貧困，你又富裕，你既強大，你又無力』。這些先生們把這位老詩人的話學得很好。他們一面打一面申斥道：『你富裕』——就可以靠你生活了。他們一面打一面申斥道：『你貧弱』——這就可以欺侮你，掠奪你，而不受罰了。打落後的和軟弱的，——這已經是剝削者的法則了。資本主義狼子的法則。你落後，你軟弱——那麼你就不對，就可以打你，壓制你。你強大，——那麼你就對，就應該對你小心。

這就是我們不可再落後的原因。

從前我們沒有過祖國，且也不能有祖國。現在我們既然打倒了資本主義，我們的政權是工人的，——我們便有了祖國，我們要保持他的獨立。你們願意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征服，並使之失去獨立嗎？如果不願意，你們就應該在最短的期間，消滅他的落後，並在他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發展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速度。別的办法沒有。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時就說：『或者死，或者趕上和趕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的國家落後了50年——100年。我們應該在十年之內趕上這個路程。我們不能這樣，便將被人蹂躪。

這就是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應盡的責任。

但我們還有許多更嚴重和緊要的責任。這便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應盡的責任。這些責任，是與第一種責任相符合的。可是我們把他們看得更高。蘇聯的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我們不僅是靠着蘇聯工人階級的努力而得了勝利，並且還有賴世界工人階級的援助。沒有這種援助我們早被毀滅了。人家說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突擊隊。這話講得很好。但這給我們加上了許多極嚴重的責任。國際無產階級爲甚麼援助我們，我們爲什麼值得這樣援助？就是因爲我們最先與資本主義作戰，最先建立了工人的政權，我們最先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並因爲我們所作的事，如果成功了就可翻轉全世界，和解放整個工人階級。但怎樣才能成功？就要消滅我們的落後，發展建設工作中很高的布爾塞維克的速度。我們應該前進，使全世界工人階級看着我們，能夠說：他真是我的先進隊伍，他真是我的突擊隊，他真是我的工人政權，他真是我的祖國，——他們做自己的事業，就是做我們的事業，很好，——我們來幫助他們反對資本家，來鼓動世界革命事業。我們應否滿足世界工人的期望呢，應否在他們面前盡我們的責任呢？是的，如果我們不願意有奇恥大辱，我們就應該這樣做。

這就是我們的國內和國際的任務。

你們看見，他們一定要我們用布爾塞維克的速度來發展。

我並不是說，我們在指導經濟方面任何成績都沒有

的。有成績，並且還很多。我們將工業的出產量增到了戰前的兩倍。我們創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農村經濟生產。但如果我們在這個期間真正努力地學會了生產，學會生產的技術，學會生產的財政和經濟方面，那麼我們還能夠得到更多的成績。至多在十年中我們必要趕上我們落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後面的路程。我們一切『客觀的』可能性都有。祇是真正的來利用這些可能性的能力不夠。而這却要靠着我們。祇有靠着我們。到了我們學習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到了拋棄不干涉生產的腐敗意見的時候了。你若是工廠的經理，——就什麼事都干涉，甚麼都研究，一點也不放鬆，學習了再學習。已經是布爾塞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而經濟工作人員若不願意學習技術，若不願意學會技術，這就是蠢才，而不是經濟工作人員。

有人說技術很難學會。這話不對。沒有布爾塞維克攻不下的城寨。我們解決了許多極困難的任務。我們打倒了資本主義。我們奪到了政權。我們建立了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推動中農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從建設的觀點看來，最重要的事我們都作了。所剩的不多了：學習技術，學會科學。等到我們辦到這一層的時候，那時我們前進的速度將是我們現在所不敢設想的。如果我們真想到這點，那我們就能作到！



# 關於布爾塞維主義歷史 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親愛的同志們！

我堅決地反對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發表斯路茨基底『布爾塞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這篇反黨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

斯路茨基斷言，列寧（布爾塞維克）輕視了德國的以及一般戰前的社會民主黨內中派主義的危險，即是說，輕視了暗藏的機會主義底危險，輕視了對機會主義調和底危險。換言之，照斯路茨基底意見，列寧（布爾塞維克）沒有與機會主義作不調和的鬭爭，因為輕視中派主義，實際上就是放棄與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鬭爭。這樣就是說，列寧在大戰之前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或者甚至在這次大戰告終時，才成了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斯路茨基在他的論文中就是這樣揚言的。而你們不但

沒有把這個新出台的『歷史家』當作誹謗家和偽造家來咒罵他，反來同他爭論，給他一個說話的講台。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反對你們雜誌上發表斯路茨基底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因為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列寧是否曾與機會主義著名的形式——中派主義——作了原則上不調和的鬭爭的問題，列寧是否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問題——這種問題不能變成爭論的東西。

你們在十月二十日致中央的『申明書』內承認編輯部發表斯路茨基底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是犯了錯誤。這自然很好，雖然該『申明書』發現得很晚。可是你們在自己的申明中又犯了新的錯誤。『申明書』內說：『編輯部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篇幅上繼續考究布爾塞維克與戰前第二國際的相互關係的一切問題，這在政治上是很切要而必需的。』這就表示你們想把布爾塞維主義這個無可爭辯的定理，從新拿來加以討論。這就表示，你們重新想把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由定理變成需要『繼續考究』的問題。為什麼呢？根據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列寧主義是在與各種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鬭爭中產生、長大和強固起來的，這裏自然也包括與西歐（考茨基）的中派主義，與俄國（托洛茨基等）的中派主義的鬭爭。這一點甚至布爾塞維主義底仇敵也不能否認。這是定理。而你們把我們拉向後退，企圖把定理變為尚須『繼續考究』的問題。為什麼呢？根據什麼呢？或者是因為不知道布爾塞維主義底歷史？或者是為着腐敗的自由主義，要使斯路茨基和托洛

茨基其他的信徒不得埋怨人家不給他們以說話的自由？好奇怪的犧牲布爾塞維主義底切身利益的自由主義……。

究竟編輯部認為斯路茨基底論文中有什麼值得爭論的東西？

一，斯路茨基說，列寧（布爾塞維克）沒有與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採取斷絕和分裂的路綫。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斯路茨基這個托洛茨基主義的提綱。但是這裏有什麼爭論的東西呢？斯路茨基簡直誹謗列寧，誹謗布爾塞維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誹謗須要加以咒罵，而不要將它變為爭論底對象。

凡是布爾塞維克（倘若他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都知道，列寧遠在大戰以前，大約從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起，那時俄國剛形成了布爾塞維克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初次顯露，——這時列寧就已決定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並在那裏與『第二國際』，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的路綫。凡是布爾塞維克都知道，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布爾塞維克在那時候（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就已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隊伍中間獲得了『分裂者』和『破壞者』的頭銜。但是，倘若社會民主黨左派在『第二國際』，首先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面，自己還是很薄弱和沒有勢力的派別，組織上尚未形成，思想上尚未鞏固，甚至還害怕說出『斷絕』、『分裂』的字眼，那末，

列寧又能怎樣？布爾塞維克又能怎樣？不能夠要求列寧、要求布爾塞維克從俄國替左派造成西歐黨內的分裂。我更不必說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薄弱不僅是社會民主黨左派戰前時期的特點。大家都知道，左派這個缺點就在戰後都還保存着，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在大戰開始兩年多以後，寫了一篇『論尤尼烏斯』底小冊子（尤尼烏斯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首領盧森堡），這篇著名的論文，對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有了估計；列寧在這裏批評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說到『德國一切左派底弱點，就是他們還被考茨基底虛偽、學究氣和對機會主義者的「友善」所籠罩着』。他說『尤尼烏斯所尚未完全脫掉德國的，甚至害怕分裂，害怕說出澈底的革命口號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環境」。』

在『第二國際』一切派別中間，俄國布爾塞維克依自己組織上的經驗和思想上的堅定是當時唯一能與自己『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堅決分裂的派別。

所以如果斯路茨基甚至不企圖證明，而祇是簡單地設想列寧和俄國布爾塞維克，沒有利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來與機會主義者（普列哈諾夫、馬爾託夫、唐恩）分裂並驅逐中派主義者（托洛茨基和其他『八月聯盟』底擁護者）——那末，關於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和布爾塞維克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尚有爭論的餘地。可是，問題就在這裏，斯路茨基之流連提都不敢提到這種無理的設想。他們所以不敢，正因為他們知道，俄國布爾塞維克在

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間與各種各色的機會主義者採取了堅決的分裂政策，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實，這些事實會起來反對這種設想。他們所以不敢，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第二天就會受衆人的唾罵。

試問一問：俄國布爾塞維克遠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如果不同時決定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的路綫，他們能否與本國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的調和派實行分裂？

誰能够懷疑，俄國布爾塞維克曾經認爲自己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政策，是西歐左派政策底模範？誰能够懷疑，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曾經竭力推動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與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呢？要是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尚未成熟，不能效法俄國布爾塞維克，那就不是列寧和俄國布爾塞維克底過錯了。

二，斯路茨基責備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說他們沒有堅決地和不屈不撓地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左派，說他們祇在嚴格的附帶條件之下幫助了它，說小組織的關係妨礙了他們澈底幫助左派，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無根據和完全捏造的責難。可是這裏有什麼可以爭論的東西呢？斯路茨基在這裏玩手腕，妄行責備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藉此來掩飾德國左派立場上實際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麼？布爾塞維克正因德國左派在布爾塞維主義和孟塞維主義之間動搖不定，所以如果要幫助他們，便一定要有嚴格的條

件，嚴格批評他們的錯誤，否則便是背叛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這難道還不明白嗎？狡猾的手腕須要加以咒罵，而不要將它變成爭論底對象。

是的，布爾塞維克祇是在一定的、嚴格的條件之下幫助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同時批評他們半孟塞維克的錯誤。但這正要歡迎，而不應加以責難。

有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呢？

我們現在看一看歷史上更顯著的事實。

(一) 一九〇三年俄國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關於徵收黨員的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布爾塞維克關於黨員資格的提案，想在組織上限制非無產階級份子混入黨內。因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非無產階級份子混進黨內的危險，當時非常嚴重。俄國的孟塞維克，則堅持相反的立場，對非無產階級份子大開入黨之門，因為俄國革命的問題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重要，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決定參與這個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左派領袖怕吾斯和盧森堡也參與了這個問題。怎樣呢？他們兩個人都反對布爾塞維克。大罵布爾塞維克為極端集中主義和布朗基的傾向。後來這些卑鄙的和市儈式的語句被孟塞維克所利用而散佈於全世界。

(二) 一九〇五年俄國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關於俄國革命性質問題發生了分歧。布爾塞維克堅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工農聯合的思想。布爾塞維克斷言，必要達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便在鄉村貧農援助的保證之

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刻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孟塞維克否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領導權的思想，否認工農聯合的政策，他們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採取妥協的政策，宣佈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與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是反動的布朗基主義者的觀點。『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怕吾斯和盧森堡對於這個爭論的態度怎樣呢？他們撰出一種烏托邦的和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的公式（不正確地演繹馬克思的革命公式），充滿了孟塞維克否認工農聯合政策的精神，並把這個公式和布爾塞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公式相對立。後來，這個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論的公式又為托洛茨基（馬爾托夫也部份地）所抓住，而變為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三）大戰時期『第二國際』政黨前面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被壓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解放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與帝國主義鬭爭道路的問題，推翻帝國主義之道路的問題。布爾塞維克為着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和包圍帝國主義起見，提出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援助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底解放運動的政策，並發揮了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革命及解放運動統一戰綫的觀點。因此各國機會主義者，各國社會國家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立刻就團結起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將布爾塞維克當作瘋狗似的攻擊。當時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站了什麼立場呢？他們發揮了半孟塞維克的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排斥了馬克思主義對民族自決

(直到脫離和組織獨立國家爲止)的原則，他們反對關於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解放運動具有嚴重革命意義的提綱，他們反對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有締結統一戰綫可能的提綱，並把這個一貫輕視殖民地民族問題的，半孟塞維克的東西拿來與布爾塞維克底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相對立。大家都知道，這種半孟塞維克的東西後來爲托洛茨基所抓住，並用來作爲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這是世人共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錯誤。

我更不用講到德國左派其他的在列寧的文章中所批評過的錯誤。

同樣更不用講到他們估計布爾塞維克十月革命時期的政策時所犯的錯誤。

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在戰前的歷史中所犯的這些錯誤，難道不正是證明社會民主黨左派雖然左傾，可是還未脫出孟塞維克的思想麼？

自然，德國左派不僅有嚴重的錯誤。他們還有很大的和嚴重的革命事業。比如在對內政策問題上，尤其是在選舉鬭爭問題上，在國會和國會以外的鬭爭問題上，在總罷工，戰爭，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有許多的功績和革命的言論，正因爲如此，布爾塞維克才認爲他們是左派，並且幫助他們，推動他們前進。但是，這並沒有消滅，也不能夠消滅這個事實：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自己同時帶有許多極嚴重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錯誤，他們尚未脫出孟塞維克的觀點。因此還需要布爾塞維克方面



極嚴重的批評。

現在，請你們自己評判一下，要想不背叛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想不背叛革命的利益，要想不背叛共產主義，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能否不帶嚴格的附帶條件，對他們的錯誤不作嚴格的批評，就來幫助西歐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呢？

斯路茨基拿他應該歡迎（如果他是布爾塞維克的話）的地方來非難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豈不顯然是澈底揭破自己是半孟塞維克、是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嗎？

斯路茨基竟推測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對西歐左派的估計是以自己小組織的關係為出發點，這就是說，俄國布爾塞維克為着自己小組織的利益而犧牲世界革命偉大的事業。難道還需要證明，這種推測比什麼都更卑鄙齷齪。再沒有比這更卑鄙的了，因為甚至孟塞維克中間那些毫無廉恥的人都開始瞭解：俄國革命不是俄國人底私事，恰巧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底事業，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再沒有比這更齷齪的了，因為甚至『第二國際』底那些專門造謠中傷的人也開始瞭解：布爾塞維克澈底的和革命到底的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模範。

是的，俄國布爾塞維克，第一步就提出了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如關於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國會的和國會以外的鬭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民族自決、關於被壓迫民族

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關於援助這種運動的政策等等的問題。他們提出了這些問題作為檢驗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革命堅定性的試金石。他們是否有這種權利呢？有的。不僅是有這種權利，並且應當這樣做。他們之所以應當這樣做，因為所有這些問題同時就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布爾塞維克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策略也就是服從於世界革命之任務的。

所以應當這樣做的，是因為祇有這些問題才可以真正檢查『第二國際』各種派別底革命性。試問，這裏俄國布爾塞維克底『小組織性』在什麼地方，這與『小組織的』作用又有什麼關係呢？

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在自己『做什麼』的小冊子上寫道：『歷史在我們的前面提出了一個極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各國無產階級一切急迫任務中最革命的，』『實現這個任務，不僅破壞歐洲的而且破壞亞洲的反動勢力最強大的基礎，將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出版以來，已經三十年了。誰也不敢否認，這時期的事變完全證明了列寧底話之正確。但是從這裏難道不應當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曾經是（現在仍是）世界革命底樞紐嗎？不應當說，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曾是（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嗎？

祇有根據這樣的根本問題才可以真正檢查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革命性，這難道不明顯嗎？

把這些問題看作『小組織』問題的人們，——豈不顯

然澈底揭破自己是卑鄙腐化的人嗎？

三，斯路茨基說還沒有找到充分的正式文件足以證明列寧（布爾塞維克）堅決地和不調和地作了反對中派主義的鬭爭。他拿着這種官僚式的提綱作為強固的理由，來證明他所謂列寧（布爾塞維克）輕視了『第二國際』中派主義底危險。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這種毫無意識的廢話，反對這種卑鄙的巧言。可是，這裏有什麼值得爭論的東西呢？難道不明顯：斯路茨基藉口於文件掩飾自己的所謂立論的拙劣與虛偽麼？

斯路茨基認為現有的黨的文件還不够。為什麼？根據什麼？難道所有關於『第二國際』方面，以及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鬭爭方面衆人皆知的文件，尚不足以明顯地證實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在他們反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鬭爭中的革命的不調和性嗎？斯路茨基是否看過這些文件？他還需要什麼文件？

我們就假定除了已經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了一堆其他的文件，例如布爾塞維克再次論及必須消滅中派主義的決議案。但這種紙上文件的存在，難道就足以表示布爾塞維克對中派主義真正的革命性和真正的不調和性嗎？除了不可救藥的官僚之外，誰能祇是根據紙上的文件？除了書獃之外，誰不懂得審查政黨和首領，首先要根據他們的行為而不祇是根據他們的宣言呢？歷史上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在任何革命的決議上都可以簽名以避免批評。可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執行了這種決議。其次，歷史上有不

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竭力要求其他國家的工人政黨幹出最革命的行動。可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在自己黨內，在自己本國，不在機會主義者面前，不在資產階級面前屈節逢迎。列寧不是正因此而教訓我們審查革命的政黨、派別和領袖，不要根據他們的宣言和決議而要根據他們的行為麼？

倘若斯路茨基真的想審查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對中派主義的不調和性，他應該不以個別的文件和二三封私人的信件爲自己論文底基礎，而要根據他們的行為，根據他們的歷史，根據他們的動作來檢查布爾塞維克，這難道不明顯麼？難道在我們國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沒有機會主義者、中派主義者麼？難道布爾塞維克沒有與所有這些派別進行堅決的和不調和的鬭爭麼？難道這些派別在思想上和組織上與西歐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沒有聯繫麼？難道布爾塞維克沒有克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這種克服，世界上更有那個左派做到了？有了這些事實以後，怎樣可以說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輕視了中派主義底危險呢？爲什麼斯路茨基抹煞這些對於批評布爾塞維克有決斷意義的事實？爲什麼他不用更可靠的方法，根據他們的行為，根據他們的行動來檢查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呢？爲什麼用不可靠的方法，在偶然彙集起來的紙堆中去尋找呢？

因爲利用更可靠的方法，根據他們的行為來審查布爾塞維克，則斯路茨基底整個立論立刻就會倒台。

因爲根據他們的行為來檢查布爾塞維克，就會表示布

爾塞維克是世界上澈底撲滅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並將他們驅出黨外的唯一的革命組織。

因爲一講到布爾塞維克真正的行爲和真正的歷史，這就會表現斯路茨基的導師——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在俄國培植中派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派別，他們爲着這個目的，成立了專門的組織如『八月聯盟』作爲中派主義的主幹。

因爲根據行動來檢查布爾塞維克，就會完全揭破斯路茨基是我黨歷史底偽造家，他企圖誣衊列寧及布爾塞維克，說他們輕視了中派主義底危險，這樣來掩飾托洛茨基主義底中派主義。

編輯同志們，斯路茨基和他的論文底問題就是這樣。

你們看，編輯部允許與我們黨史底偽造家舉行爭論，這是犯了錯誤。

編輯部爲什麼會走上這條不正確的道路呢？我想，它之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爲現在腐敗的自由主義在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中間有相當的流行。有些布爾塞維克這樣想：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底派別，固然是錯誤的派別，犯了不少愚蠢的錯誤，甚至有時犯了反蘇維埃的錯誤，但總還是共產主義底派別。由此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托洛茨基那樣的思想家就發生相當的自由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採取這種觀點，其深刻的錯誤和害處是無須再加以證明的。實際上托洛茨基主義早已不是共產主義底派別了。實際上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

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鬭爭中的先鋒部隊。

誰供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以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精神上的武器，如在我們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提綱，如布爾塞維克必然腐化等等的提綱呢？這個武器是托洛茨基主義供給他們的。蘇聯境內一切反蘇維埃的集團都引證托洛茨基主義關於我們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關於蘇維埃政權必然腐化，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恢復的著名的提綱，作為自己必然要與蘇維埃政權作鬭爭的根據，這件事實決不是偶然的。

誰供給了蘇聯境內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發動的嘗試？這個武器是企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反蘇維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供給他們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反蘇維埃的行動振起了資產階級底精神，幫助了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底危害工作，這是事實。

誰供給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組織上的武器，如企圖建設秘密的反蘇維埃機關？這個武器是組織反布爾塞維克的秘密派別底托洛茨基主義者供給他們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反蘇維埃的秘密工作幫助了蘇聯內部一切反蘇維埃集團組織上的形式，這是事實。

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先鋒部隊。

因此對托洛茨基主義，雖然是被打破了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這是近於罪惡與背叛工人階級的昏聩。

所以某些『歷史家』和『著作家』企圖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廢物偷運到我們的文壇上來，這種企圖應受到布爾塞維克底堅決的打擊。

因此不能容許與託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舉行爭論。

我認爲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家』和『著作家』現在企圖經過兩條路綫來進行自己的偷運事業：

第一，他們企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輕視了中派主義的危險，這裏使沒有經驗的讀者可以這樣揣測：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祇有在大戰之後，當他在托洛茨基底幫助之下『改換武裝』以後才成爲真正的革命家。這類偷運家標本式的代表就是斯路茨基。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像斯路茨基及其同流的人，是不值得同他們長久周旋的。

第二，他們企圖證明，列寧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這裏使沒有經驗的讀者可以這樣揣測：列寧在那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祇有在大戰以後，當他在托洛茨基底幫助之下『改換武裝』以後，他才開始瞭解這個轉變之必要。這類偷運商的標本式的代表，就是『聯共簡史』的作者瓦羅瀉維赤。的確，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寫道：『我們立刻就開始從民主革命轉變，恰恰是隨着我們底力量程度，隨着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程度，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住在半路上』。的確，這類事實和文件可以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很多。但是

列寧生平和行動中的這些事實與瓦羅瀉維赤有什麼相干呢？瓦羅瀉維赤底著作，爲的是在布爾塞維克的染色之下偷運自己反列寧的私貨，謾謗布爾塞維克和假造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

你們這裏看到，瓦羅瀉維赤之流與斯路茨基之流是一樣的東西。

這是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底『道路和歧路』。

你們自己都知道把報紙篇幅送給這類『歷史家』以成就其偷運行爲，這不是編輯部底事情。

照我的意見，編輯部底任務，是要把布爾塞維主義歷史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研究我們黨史的事業推上科學的、布爾塞維克的軌道，並加緊注意力，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及所有其他我黨歷史底偽造家，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

這一點之所以更需要，因爲甚至有些我們的歷史家——我這裏指的是沒有括弧的歷史家，我黨布爾塞維克的歷史家——也沒有免除錯誤。這種錯誤，替斯路茨基和瓦羅瀉維赤助長聲勢。可惜，這裏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是例外，在他編的『聯共黨史』上，雖有它的優點，却也包含着許多原則上和歷史上的錯誤。

此致共產主義的敬禮！